

目 录

发刊词	〔 1 〕
“七七”事变纪实	何基沣 邓哲熙 戈定远 〔 5 〕 王式九 吴锡祺
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	戈定远 〔 34 〕
韩、石叛冯和阎、冯联合反蒋的经过	邓哲熙 〔 45 〕
一九三七年访问英、德和苏联的回忆	翁文灏 〔 57 〕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	施乐渠 〔 65 〕
晋军概况和“铁军”、“同志会”的内幕	楚溪春 〔 68 〕
关于改组派的一鳞半爪	罗方中 〔 80 〕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	梁漱溟 〔 87 〕
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	金汉鼎 〔 100 〕
清末赎回京汉铁路的经过	叶恭绰 〔 124 〕
洪宪遗闻	张国淦遗稿 〔 132 〕
对《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 一文的意见(补充·订正·质疑)	阎宝航 〔 86 〕

附 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工作办法	〔 147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征集文史资料参考题目	〔 149 〕

附注

对《洪宪遗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二九〇页

发 刊 詞

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會議閉幕之后，周恩来主席曾在招待六十岁以上的委員的一次茶会上，号召大家将六、七十年来看到的和亲身經歷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几十年来所积累下来的知識、經驗和見聞掌故，自己写下来或者口述讓別人記下来，传給我們的后代。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周恩来主席这一指示，設立了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来負責計劃、組織和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历史时期中各种历史資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几个月来，政协委員和各方面有关人士，响应周恩来主席的号召，撰写并送交本会的史料稿件已逾二百万字，其中有不少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資料。在这个基础上，本会决定編印《文史資料选輯》，陸續出版，以便更好地保存和积累所征得的資料和进一步推动資料撰写工作的开展。

从清朝末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中国社会經歷了无比深刻的巨大变化。这六、七十年来，历史的主流虽然是清楚的，但是其中許多历史事件的錯綜复杂的演变过程，許多历史人物的丰富生动的事迹，現有的真实可靠的文献資料都还远远不够完备。因此，迫切需要从各个方面广泛地进行資料的撰写和征集的工作。过去在旧社会具有丰富閱历的人們，特别是那些曾經参与过各次历史事件的老年人們，及时地把他們的亲身經歷和見聞，把他們

所最熟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秉笔直書地写出来，就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样，就可以为我們的历史科学工作者提供有利的条件，就可以大大地丰富我們祖国的近代的历史。同时，老一辈的人們把他們丰富的生活經歷纪录下来，对于沒有体验过旧社会的种种苦难和艰辛的青年一代來說，也是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的。毛主席教导我們說：“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所以周恩来主席的号召是十分正确、十分及时的。

我們征集和編印稿件所要求的，是第一手的眞实的历史資料，也就是作者根据他們的亲身經歷和見聞所写的具有历史价值的資料。我們認為，历史資料不同于历史；前者只是为后者的編写来提供眞实詳尽的素材。因此，我們不要求作者對他們所提供的資料內容一定要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評價。我們所要求于作者的，只是眞实和具体的事实，主要在于作者把亲身經歷过的和亲自聞見的史实毫无顧慮地、如实地反映出来。撰写稿件可以不限体裁，不論是筆記、回忆录、短篇叙述或长篇記載，只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們一律欢迎。对于同一历史事实而所述有出入的，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强求一致。即使某些資料內容同已有的文献記載互有參差，但只要是眞实的，是亲身經歷过的和亲身聞見的，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上反映历史的某些側面，从而也是具有一定的資料价值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将会运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和方法，来对各种不同的历史資料进行綜合分析，考証異同，辨別眞偽，并从而得出比較全面的正确的結論来。同时，我們更欢迎閱者也以他們的亲身經歷和見聞同本刊所輯录的資料互相參証，提出补充和訂正，俾史料內容更臻于翔实全面。

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都在为建设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勇前进。生活在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老人们当然也不例外，他们也都精神奋发，热情洋溢，以积极的行动来响应党的号召。他们有的亲自执笔，有的口述让别人纪录，有的还把自己收藏多年的珍贵资料送给本会，借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到自己所能尽的一分力量。几个月来，大家已经写出了不少历史资料，使得本刊能够出版，就是一个明证。我们在此谨向作者致以谢意。为了更好地开展历史资料的撰写工作，我们希望更多的政协委员和各方面有关人士响应周恩来主席的号召，踊跃投稿，共同努力来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七七”事变纪实

何基澧 鄧哲熙 戈定远 王式九、吳錫祺

一

日本帝国主义者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又在一九三三年以武力侵占我热河省以后，暂时改变了对我国的侵略方式。它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屈辱外交，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①和《何梅协定》②，以攫得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主权；另一方面，积极扶植汉奸亲日派进行拼凑伪组织的活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便把这一地区完全地、直接地控制在它的掌握之内。

在《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之后，特别是冀东伪组织出现以后，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已经一步步地走向所谓“特殊化”。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进一步使“特殊化”的范围不断扩大，“特殊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正在这个时候，萧振瀛经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同意，进行了倒黄（黄郛）拥宋的活动。

宋哲元在任察哈尔省主席期间，由于日寇的挑衅行为，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间发生了察东事件（详附录一），同年六月间又发生了张北事件（详附录二）。在亲日派何应钦之流看来，宋哲元如果继续主持察政，对于贯彻他们的屈辱外交政策是极为不利的。当时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在张

北事件发生后，日寇有意将問題扩大，何为謀解决这一問題，曾赴南京商討对策，并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建議，以宋在察省不断与日人发生摩擦，迟早終須易人，与其待日人提出而被动地撤換，不如由我主动撤換为宜。汪接受了这个建議，于六月十九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所遺察省主席一职，由察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純暫行代理，同时，并准备将二十九軍調离华北，以免与日寇发生冲突。宋事前对此毫无所聞，以事出意料，得悉之后，頗为愕然，当立即于二十日离张家口返回天津寓所。宋到津后不数日，蔣介石电召宋去重庆（蔣这时在四川視察），宋因免职事对南京頗怀怨望，故称病不往。

-
- ① 一九三三年二月底日寇侵占热河后，又大举进攻长城各口，我国驻长城沿綫各部队曾进行抵抗。但由于蔣介石忙于进行“剿共”內战，不派主力部队北上援助，不久，日寇經灤东等地进逼平津。何应欽与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員长黄郛遵照蔣介石指示，派熊斌于五月三十一日和日方代表岡村宁次簽訂《停战协定》五款于塘沽。根据这一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認了日本占有东三省及热河省，划綏东、察北、冀东为日軍自由出入的地区，并且把整个华北都置于日軍監視之下，为日本进一步控制华北、策动华北“特殊化”准备条件。
- ②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天津駐屯軍參謀长酒井及日本大使館武官高桥，以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軍孙永勤侵入非武裝区域、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华北的統治权，并由东北調遣大軍入关，威胁平津。六月九日，日本华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正式向北平軍分会代理委員长何应欽提出强硬《覚書》。何应欽根据国民党中央电令，于七月六日复函梅津，全部承認日本要求。这个协定規定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駐河北省的中央宪兵、中央軍和东北軍，撤換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撤消北平軍分会政訓处，取消河北省的反日活动。这个协定为后来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等一系列的丧权辱国事件扫清了道路。

萧振瀛是一个颇有野心的政客，由于他对二十九军的建立和发展曾经出过力，故深得宋哲元的信任。这时，他正营谋在华北取得一个市长的位置（他的目的是北平市或天津市），宋既被免去察省主席职务，而二十九军又将撤离华北，这就直接影响了他的活动。他希望二十九军留在华北不动，但又不能违抗南京的命令。适于此时，在六月二十八日，北平城突然遭到汉奸白坚武便衣队的袭击（詳附录三），引起了北平当局的惊慌失措。萧振瀛乃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利用他的北平军分会委员的身分，以北平兵力单薄、防务空虚为词，向军分会建议将二十九军之一部移驻北平，以巩固城防。经军分会负责人鲍文樾同意后^①，萧即以电话通知了张家口二十九军军部。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得到开拔命令后，立即以紧急行军的动作，在数小时内就由察省开驻北平四郊，控制了北平市。萧振瀛造成了这一既成事实之后，就为他的进一步展开在华北的活动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他又意识到，由《何梅协定》造成的华北驻军的限制，如果不与日本方面妥协，二十九军在华北仍然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就采取了假借日寇驻华北军人的声势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法，借以为宋哲元要求更高的名义，为二十九军索取更大的地盘。他一方面逕电蒋介石，申说日寇内侵，因见二十九军拚命抵抗，有所顾忌，才肯停战，如

① 这时何应钦已与日寇签订了《何梅协定》，逃回了南京，蒋介石赖以在华北维持其血腥的法西斯反动统治的工具——中央军黄杰部第二师、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已撤离了北平；曾扩情主持的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蒋孝先部宪兵第三团和河北省及平津两市的国民党省市党部等，也都随之滚出了华北；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均被撤职；东北军于学忠部五十一军也被迫撤离平津；北平军分会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行。

將軍隊撤走，華北豈不斷送；并說黃郛甘心賣國，絕不容許，要保華北，必去黃郛。另一方面，他又由漢奸陳覺生的介紹，在天津與日本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及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取得聯繫，說明前此相見以兵，彼此均系執行國家任務，現既簽約言和，便當蠲棄前嫌，化敵為友；并說，黃郛不過是一個空頭政客，遭到軍人反對，他亦不能解決問題。日方亦知拉一黃郛，于事無濟，不如利用宋、蕭作為其統治華北的工具，遂同意支持蕭的主張。

蔣介石聞宋、蕭有聯日活動，即派親日分子張群以“局部妥協，不如全面妥協”為詞，游說日本駐華大使有吉，要求日方壓迫宋、蕭接受撤軍的命令。蕭得此消息后，立即找酒井、土肥原要他們警告有吉拒絕張群。有吉接到警告后，即不再與張群見面。蔣見計不獲售，乃又派何應欽帶同熊式輝、陳儀分途北上。何、熊先到北平，陳取道天津，向日駐屯軍聯繫，仍企圖實現張群的計劃，又遭日軍拒絕，不得已始由熊式輝、陳儀同往会晤宋、蕭。蕭對熊、陳表示：“黃郛不去，一切都談不到”，并說：“中央如能相信我們，我們就可支撐這個危局，決心死守華北，一切听命中央。”同時，蕭并建議改組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宋哲元代替黃郛為委員長，并按照該會原來建制，轄華北五省三市。熊等看到勢已至此，別無解決途徑，乃携蕭方案向何復命，經何請示蔣介石后，縮小範圍，只轄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北平、天津兩市，并更名為冀察政務委員會，任命宋哲元為委員長。同時并任命宋哲元兼河北省主席，張自忠為察哈爾省主席，秦德純為北平市市長，蕭振瀛為天津市市長（后蕭被宋免職，天津市長由張自忠接替，劉汝明接替察省主席；以后宋又讓出河北省主席，由馮治安接替）。

冀察政委会虽然在名义上仍然隶属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但是，用人行政的权利完全掌握在宋的手里，在财政方面，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会截留支配，并且用这些收入来扩充军队，购买军械，实质上已经成了变相的自治。事后曾有人问萧：“华北情况复杂而危险，决非长治久安之局，你们造成这个局面的目的究竟何在？”萧答：“我们的目的是名利双收，有了地盘，大家就有官可作，有财可发，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压迫我们，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起来抗战，这就是名。”冀察政委会就是在这样投机取巧、行险侥幸的思想支配下产生的。

冀察政委会既然是在当时内外矛盾复杂交错情况下的产物，因此冀察政委会的本身和宋哲元的思想和行动也就表现了各种矛盾。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宋哲元对日寇的态度，是既有妥协的成分，又有不妥协的成分。他的对付日寇的办法，是“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他的口号是“不说硬话，不作软事”。他对依附于日寇的汉奸亲日派，是既不倚重他们，又不得罪他们，而是用羁縻笼络的办法，防止他们捣乱。表现在对内关系上，他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是既要保持隶属的关系，又要行使自治的实权，而一旦遇到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时，便又推到南京去解决。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虽然一贯反共，但不赞成“剿共”，他的看法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成不了大事，但主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杀中国人”。他对于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虽不表示反对，不主张对游行的学生采取血腥镇压的办法，但也不同意在冀察范围内举行游行示威，认为游行示威不能救国，反而会招来麻烦。因此，他最初对学生

游行示威也曾采取过捕人、打散等方式，但不久就转变为包围封锁和派人劝导的方式。

宋哲元为了使冀察这个局面能够在矛盾重重的环境中存在，他就不可能站稳坚定的政治立场，不可能表示鲜明的政治态度，不可能确定明确的政治方向，因而也就不可能决定应付非常局势的决策；他的思想情况，始终是矛盾的、动摇的。当然，他的这种态度也就遭到了日寇的极大不满，认为他没有与日本亲善合作的诚意。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冀察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就是向日寇投降，要么就是与日寇决裂，敷衍是行不通的，更是不能持久的。

当时的矛盾情况也反映到冀察政委会内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一小撮汉奸亲日派，如齐燮元、潘毓桂、张璧、陈觉生等人，在日寇的唆使下，尽力使冀察进一步地伪化，并且挑拨、分化二十九军内部的关系，从二十九军上层寻找可被利用的对象，作为效忠日寇主子的资本。他们窥伺到张自忠在一些名义、地位、权力等问题上对宋有所不满，于是乘机包围张自忠，并且在张与日寇之间拉上了关系，这就使得张自忠一步一步地陷入了他们的圈套，成了被他们利用的工具。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二十九军绝大多数官兵都是有爱国思想的，特别是由于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他们都有着不愿意当亡国奴和抵抗日本侵略的情绪和要求。但是，其中又有程度上的不同。在上层人物中，有的人虽然也有爱国思想，也要抗日，但是他们又留恋于个人的名义地位，他们的抗战意志并不坚决。惟有二十九军的中下层，抗日情绪的表现最为明显，他们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在日寇面前从来没有表示过畏缩和退让，他们

曾經和日本軍隊發生過不少次大大小小的衝突。

總的說來，冀察這個局面，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特殊的局面。它既不同于一般国民党的行政区域，又不同于当时在日寇卵翼下的冀东伪組織。因而它的政治态度和行动上的表現，有它一定的特点。

所有这一切，正是冀察当局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对抗战問題搖擺不定，終至因循坐誤，造成軍事上重大失敗的历史根源。

冀察政委会成立后不久，汉奸潘毓桂、张璧等在日寇的唆使下，拟出一个所謂“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旗帜图样，送給宋哲元，宋看过后立即焚毀。日寇看到这条計策行不通，以后就着手进行經濟上的压迫，陸續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經濟方面的問題，如：修筑津石鐵路（天津到石家庄）問題、开发龙烟鉄矿問題、修改海关稅則問題、开辟航空綫路問題、收購华北棉花問題、长蘆余盐出口問題，等等。宋对于这些問題，既不敢明确地拒絕日寇的要求，又不敢悍然地出卖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利益，于是就采取了敷衍推諉的办法：首先是拖，到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就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請示，借以減輕自己的責任。如对长蘆余盐出口問題，就是經過南京財政部批准的。有的問題是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如对于設立航空公司的問題，經過长时期的反反复复磋商，才委派了张允荣为“惠通航空公司”的總經理負責筹备工作，直至“七七”事变发生，亦并未正式开办。在收購棉花問題上，还引起了日寇的不滿。日寇企图在压低收購价格的情况下，对华北棉花实行垄断。当时天津商品檢驗局向宋建議发放大量棉农貸款，以抵制日寇的賤价收購。这对于日寇的垄断政策，当然是不利的。此外，如开矿、修路等問題，因关系更为重大，都是一再推

說須向南京請示后方能进行。以上这些問題，均系日寇以口头向宋提出而进行商談的。宋对这些問題，是在既不敢拒絕、又不能同意的情况下，以模稜两可的态度把問題摆在那里。而日寇的企图是不达目的不止的，宋的这种做法，招致了日寇的責难。于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間，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田代統一郎向宋提出了書面的所謂“經濟提携”的条款。

当时日寇向宋提出这个条款的經過是这样的：某天，汉奸陈觉生来見宋，謂田代司令官邀宋赴宴，但并未說明商談任何問題，宋即偕陈前往。宋到后，田代已預先备妥繕就的“經濟提携”条款，請宋签字。宋看到当时情形已成实逼处此情势，于是就在这个条款上签了字。宋归后，在接見他的高級將領和幕僚时，神色異常，心情沉重。他說：“我們負有軍事責任的人，今后如赴日方的邀約，必須預先作好发生意外由何人来接替任务的准备，以免遭到要挟。”并說：“日本人提出这个条款，在被迫的情况下签字，是完全无效的，我們对付的方法，就是拖而不办。”宋当时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报告了这一事实的經過。这个所謂“經濟提携”的主要內容，都是过去已經提出过的問題，即修路、开矿、关税、通航和收購棉花等問題。这次日寇提出的目的，就是把問題用書面的形式使之条約化，迫使冀察当局不得不履行这个条約。条款提出之后，日寇即不断地逼促实现，特别是对修路、开矿两个問題催促更急。宋不敢自作主张，即派戈定远向蔣介石請示。蔣的答复是：“如万不得已时，矿可开，路不能修。”第二次又派李思浩前往見蔣，蔣的答复仍然是：“矿可开，路不能修。”宋因无法应付日寇的要求，而日寇对宋又愈逼愈紧，于是宋在穷于应付的情况下，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避往山东乐陵

原籍，借以拖延一时，徐图应付之策。

二

在冀察政委会成立后，日寇对冀察当局不仅实行以上的压迫，而且在军事上也实行步步进逼。一九三五年冬，日寇指使刘桂堂匪部由察东向河北省窜扰，企图在房山县一带建立盘据的据点，以威胁北平的安全。经我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击溃，向南逃窜。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日寇步兵一个中队在丰台演习，在中途与我军相遇，因让路发生争执，遂起冲突。经双方派员前往调停结果，我驻军由丰台撤出。事态虽未扩大，但日军竟以此为借口，增兵进驻丰台，并且进一步要求在丰台至芦沟桥的中间地带修筑营房及机场，均被拒绝。一九三七年二月，日寇又指挥冀东“民团”宁雨时部三千余人，企图通过昌平、南口之线向西活动，又由我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包围歼灭，并捉获日人三名，供出他们企图包围北平西面和北面的阴谋。

在“七七”事变发生以前，北平外围的形势是：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寇军队驻防；北平的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寇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敌伪军；在西北面，有日寇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等土匪队伍。仅有北平的西南面，尚为我二十九军部队所防守。

当时，北宁铁路沿线既为日寇所控制，而位置在平汉路的芦沟桥就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在军事上，我军掌握了这个据点，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一旦为敌人所掌握，则北平就变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死城。所以芦沟桥这一战略据点，就成为军事上

必爭之地。

日寇在当时的企图是：伺机占领蘆沟桥，截断平汉路，使北平陷入四面包围的形势，以便加深冀察的“特殊化”，然后以平、津作为后方，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軍事侵略。

这时，二十九軍共轄四个步兵师、一个騎兵师和一个特务旅，并且把地方保安部队編成两个保安旅，作为正規軍訓練使用，总兵力不下十万人，分駐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各部队駐防的位置是：一四三师刘汝明部駐察哈尔省及平綏铁路沿綫（河北省境內）。一三二师赵登禹部駐河北省任邱、河間一带。三十八师张自忠部駐天津附近韓柳墅、小站、廊坊、馬厂和大沽各地，并以一部駐南苑。三十七师馮治安部，师部駐西苑；何基澧旅駐西苑、八宝山、蘆沟桥和长辛店一带，刘自珍旅駐北平城內，陈春荣旅駐保定、大名等地。二十九軍特务旅孙玉田部駐南苑，以一团駐城內。騎兵第九师郑大章部，师部和騎兵一团駐南苑，其余两团分駐固安、易县等地。石友三和阮玄武的两个保安旅，分駐于黄寺和北苑。

由于宋哲元一貫抱着与日寇相安无事、維持現狀的幻想，在軍事上始終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在《田中奏折》中确定了灭亡中国的国策，并且于一九三六年八月間，在日本首脑集团會議上又通过了一个叫作“基本国策”的文件，其中指出日本的意向是：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新的进攻，并且很快地就实行了国家規模的战时动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寇对冀察的压迫也就一天比一天加紧。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以后，建立了全国抗日民族統一战綫，鉴于冀察形势的严重，对二十九軍上中层也积极进行抗日爭

取工作。当时二十九軍内部有不少人与北平中共地下組織建立了工作联系，如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二十九軍副參謀长张克侠等，当时均与中共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积极推动二十九軍抗击日寇。宋哲元这时的处境，一方面是日寇对他施加种种压力，一方面是人民以民族大义对他进行督促，虽然他对抗战并没有决心，但形势逼着他不能不作抗战的准备。有一天（時間約在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間），宋召集幕僚研究对日的对策，并要參謀人員提出方案。二十九軍參謀长张樾亭（与南京接近）根据国民党的主张，提出了一个“必要时撤出北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的方案。副參謀长张克侠即向中共組織报告了此事的經過，中共組織立即决定由张克侠出名提出了“以攻为守”的方案，其主要內容是：

（一）日本进占华北、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国策，早已确定（詳《田中奏折》），現正大量調集軍隊，准备向华北进军，我們除了抗战与投降二者择取其一而外，别无他法可以挽救我軍之危机，应付只能是暫时的，决无法滿足日寇之欲望。（二）我們的处境非常危險，日寇进逼，中央（指蔣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以下同）不管。蔣介石并令关麟征、黄杰等部集結新乡一带，扼守黄河北岸，意在与日寇夹击，消灭我軍。如果我們撤退，将退到哪里去呢？黄河以北既由中央軍駐守，不会叫我軍退到河南；山西的閻錫山向来閉关自守，也不会讓退到山西；綏远的傅作义也是如此。我軍如果撤出平津，只有在保定、石家庄平原地区挨打受气，軍民怨恨，后援不济，势必形成日寇、蔣軍夹击之势，我軍将不打自潰，这是最危險不过的。（三）我軍爱国教育，素不后人，抗日士气，极为高涨。喜峰口之役，痛击日寇，被誉为

抗战之民族英雄。现平津各界及全国军民，均希望我们能奋起抗战，为国争光，此我军报国立功之良机，决不可失。为今之計，不妨暫与日寇委婉应付，但必須作积极抗战之准备，必要时以攻为守，一举攻占山海关，縮短防綫，扼守待援，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如此必能振奋士气，得到全国人民之同情和支持。中央在全国军民憤激情况之下，决不敢袖手旁观，不予支援，其夹击消灭我們之企图，必将不售。在我們发动抗战后，只要能坚持一个时期，最后就是失败了也是我們的胜利。如馬占山在东北之抗战，十九路軍之淞沪战役，虽敗犹荣。在全国人民支援之下，我們还有重整旗鼓之可能。如不此之图，不战而退，必为全国军民所痛罵，将士离心，軍心涣散，群情激憤，后援无济，我军此时将退无可退，守无可守，战不能战，和不能和，他人乘我之危，分化瓦解，將何以自存，此最危险不过之下策。

宋对此方案极表贊成，即命张克侠本此方案积极作抗战的准备工作。张即根据中共組織的指示，提出了如下的建議：第一，加强抗日思想教育。当时二十九軍在南苑的軍事教导团还講授四書五經一类的課程，張建議在此非常时期，应加强抗日思想教育和国际时事教育，經宋同意，即聘张友漁（中共地下黨員）和溫健公（进步教授）担任教导团教官，他們的講課，受到學員的热烈欢迎。同时，教导团內还有馮洪国、朱軍（中共地下黨員）等作組織工作，所以当时南苑的抗日空气极为浓厚。此外，中共組織还发动了一批进步的大学生（包括共產黨員和党領導的民先隊員）参加了在西苑举办的軍事集訓。大学生軍事集訓由何基澧負責，何对学生講話表示抗战决心，有时講的声泪俱下，全体学生抗战情緒极为高涨。第二，加强情报工作。当时宋对敌情了解

很少，張建議成立情報處，深入敵後，到東北、熱河等地了解敵人兵力的部署及其動向。經宋同意後，即派靖任秋（中共地下黨員）任情報處長，積極進行情報人員的派遣工作。第三，爭取偽軍反正。當時遼西、冀東、熱河及察、綏等地，有不少偽軍到處活動，有的還想乘機反正，應派人聯繫，積極爭取。此項建議，亦得到宋的同意。

所有以上這些措施，還是宋到冀察後第一次採取的在政治上、軍事上有積極作用的活動。後來，宋在一個座談會的場合，曾對他的將領和幕僚表示：“我們要好好訓練隊伍，充實力量，加強裝備，等到國際戰爭爆發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用一支兵力由察省向熱河出擊，拊敵側背，以主力從正面打出山海關，收復東北失地，我們要在這裡豎起一座高高的紀念碑。”宋之所以發出這樣的豪言壯語，並不是無因的。惜為時已晚，不久“七七”事變發生，原計劃即被打亂。

中共北平地下組織爭取二十九軍積極抗戰的活動，除了通過二十九軍內部人員直接地影響二十九軍上層人物的抗戰情緒外，並且發動和組織廣大群眾掀起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當時在中共領導下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東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等團體，時常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機，展開抗日救亡的宣傳鼓動工作，他們响亮地高呼“擁護二十九軍保衛華北”的口號，對二十九軍表示大力的支持。他們還經常乘着二十九軍部隊演習的機會（當時日寇駐東交民巷的部隊經常出城進行示威性的演習，二十九軍部隊亦不示弱，就在日兵演習的第二天在原地演習），派代表前往慰問，並講述抗日的重要意義。這些愛國青年的熱情，更加激發了

二十九軍官兵的抗日情緒。

我国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形成，我国内部和平統一的实现，我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空前高涨，使得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遭到可耻的失败。但是它决不容許中国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它要断然地实行它的“国策”，迅速地发动对我国的全面的軍事进攻。特别是当它得到了德、意法西斯主义者的支持以后，就越加暴露了它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疯狂面目。

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激昂。

蘆沟桥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时，二十九軍駐蘆沟桥的部队为三十七师何基澧旅的吉星文团，另一团駐八宝山一带，旅长何基澧的指揮所設在西苑。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日寇駐丰台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县城在蘆沟桥北端）到长辛店地区演习，我駐軍不許，相持达十余小时，至晚始退去。七日我軍接到报告說：日軍今日出外演习，枪炮都配备了弹药，与往日情况不同。旅长何基澧当据以报告了正在保定的三十七师师长馮治安，并促其速返。馮立即赶回北平，听取了何基澧的情况报告，并与何布置了应战的准备。是日夜間，日軍在蘆沟桥附近演习，十一时左右，忽有枪声数响发于宛平县城的东方，我城内守軍当即加以严密的注意。夜十二时，日使館武官松井以电话向我冀察当局声称：“有日本陸軍一中队，頃間在蘆沟桥演习，仿佛听見由駐宛平城内之軍隊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現象，結果失落日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兵。”我方因其所称各点不近情理，显系别有企图，当即拒絕了他的要求。少頃，松井又来电话，声称：我方如

不允許，彼方將以武力保卫前进，又为我方所拒絕。同时得报：謂日軍对宛平县城已取包围形势。我軍政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当与日方商定，双方立即派員前往調查阻止。我方所派为河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專員兼宛平县长王冷齋、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員會專員林耕宇及冀察綏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等三人，日方所派为冀察綏署顧問日人櫻井、日軍輔佐官寺平和秘書齋藤等三人，于八日晨四时許到达宛平县署。寺平仍坚持日軍入城搜索失兵，我方不許。正交涉間，忽聞东門外枪声大作，頃刻間，西門外大炮机枪声又起。我軍为正当防卫，乃奋起抵抗。我二十九軍司令部立即发出命令，命令前綫官兵坚决抵抗，并有“蘆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之語。在战斗开始不久，我平汉綫的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等处曾被敌人攻占，至八日下午，我軍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齐向敌人反攻，并与敌实行白刃战，复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处夺回。

二十九軍官兵由于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当时党领导下的北平各救亡团体慰劳和鼓励的影响，他們深刻地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当前最凶恶的敌人，不把这个敌人打败，全中国人民就有当亡国奴的危险。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中共地下組織即领导北平各界組織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援助二十九軍抗战，并派人与吉星文团取得联系，鼓励他們英勇抗战，益加增强了他們至死不退的决心。因此，我軍官兵在劣势装备的不利条件下与敌作战，士气旺盛，人人皆以大无畏精神頑强抵抗，有不少受伤官兵坚持不下火綫。某天夜間，敌人以坦克向我陣地冲来，我軍以一連的兵力，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冲锋前进，終于将敌人的九輛坦克全部打退。附

近居民看到自己的軍隊英勇殺敵，在中共領導下的各救亡團體的發動下，紛紛地冒着敵人的炮火，參加救護工作，把受傷官兵送到醫院，送水、送飯、搬運彈藥的群眾，更是往來不絕。有的群眾，看到我軍傷兵，就感動得落下眼淚。長辛店鐵路工人為了協助軍隊作戰和固守宛平縣城，很快地就在城牆做好了防空洞和槍眼。所有這些生動感人的事跡，益加振奮了前線的軍心。

我軍對日寇的堅決回擊，是出乎日寇意料之外的。他們見勢不妙，乃謊稱失蹤日兵業已尋獲，向我方提出和平解決的要求（實際是緩兵之計）。經雙方談判，於十一日商定停戰辦法三項：（1）雙方立即停止射擊；（2）日軍撤退到丰台，我軍撤向蘆溝橋以西；（3）我方城內防務，除宛平原有保安隊外，另由冀北保安隊（即石友三部）派來一部協同擔任城防。但在協議成立之後，日寇並未撤退，仍不時以炮兵轟擊宛平縣城及其附近地區，城內居民傷亡頗重，團長吉星文亦負傷。敵人並於是日占領大井村、五里店等處，截斷了北平至蘆溝橋的公路。

為了加強蘆溝橋一帶的兵力，乃於九、十兩日先後將駐保定的陳春榮旅之一團、東北軍五十三軍萬福麟部之騎兵團及鋼甲車兩列開到長辛店一帶，計劃在十日夜間襲擊丰台之敵。九日晚七時左右，張自忠以電話詢問何基澧前線情況後，對何說：“你們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來，有兩方面高興：一方面是共產黨，符合了他們的抗日主張；另一方面是國民黨，可以借抗戰消滅我們。帶兵不怕沒有仗打，但是不要為個人去打仗。”何答以“現在的情況，不是我們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們。”張感到何的意志堅決，不易說服，而自己又不是何的直接長官，於是就叫軍部給何發布命令，嚴令“只許抵抗，不許出擊”。

本来何已經商得馮治安的同意，決定乘敵人大部兵力尚未開到的時候，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出其不意，予平津之敵以殲滅性的打擊，軍部命令到達後，這一計劃未能實行。從此，蘆溝橋的戰事和其它方面一樣，就完全陷於被動。

三

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立即向全國發表了号召抗戰的宣言。宣言中說：“全國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抵抗，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國同胞們！我們應該贊揚和擁護馮治安部的英勇抗戰，我們應該贊揚和擁護華北當局與國土共存亡的宣言。我們要求宋哲元將軍立刻動員全部第二十九軍開赴前線應戰。我們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實援助第二十九軍，並立即開放全國民眾的愛國運動，發揚抗戰的民氣。立即動員全國陸海空軍準備應戰，立即肅清潛藏在中國境內的漢奸賣國賊分子和一切日寇的偵探，鞏固後方。我們要求全國人民用全力援助神聖的抗日自衛戰爭。我們的口號是：武裝保衛平津華北！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接着，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開了有全市共產黨員和革命機關工作人員參加的緊急會議。毛澤東主席号召：“每個共產黨員與抗日革命者，應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戰前線。”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這些号召，大大地激勵了全國軍民敵愾

同仇、坚决抗战的信心，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坚决抵抗日本的进攻。从抗战开始的第二天起，北平中共地下組織立即动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鋒队、北平学联等救亡团体，組織战地服务团，出动到前綫救护伤员；組織劳軍团，携带大批的慰劳品，分赴前綫及医院慰问；并进行了支援抗战的各方面工作，如募集麻袋供作防御工事等等。在这一时期，冀察軍政当局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声援抗战的电报和信件；还有许多社会团体和个人汇来一批批的款項，作为支援抗战和慰劳前綫作战官兵之用；有不少国民党的将领发出通电，要求开赴前方参加抗战；海外华侨团体也紛紛电請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保卫祖国。蘆沟桥的炮声，已經激起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民族义憤。

正当全国广大爱国人民一致声援二十九軍、要求发动全面抗战的时候，在北平、天津的一小撮汉奸也大肆活动起来。在他們看来，这正是为他們的主子日寇効忠的大好时机。汉奸齐燮元（过去齐曾建議宋哲元恢复北洋軍閥政府时代的五色国旗）亲到北平市市长秦德純寓所劝降，他对秦說：“如果与日方进一步地合作，就可以化戈干为玉帛。”汉奸潘毓桂、张璧、陈觉生等，并且乘此机会秘密进行拥戴张自忠、逼走宋哲元、使冀察进一步伪化、以遂其卖国求荣之愿的阴谋活动。

这时，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和妥协投降政策的蔣介石，由于看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团结救国的主张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由于在西安事变时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又由于日寇对中国的不断进攻日益威胁着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因而英、美帝国主义也希望中国对日作战，他感到在这内外形势的逼迫下，如果再公然地反对抗战，就不能繼續維持自己的

統治地位。所以在七月十五日中共派代表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廬山會議之后，蔣介石即于十七日发表了对日态度比較強硬的談話。但是他仍然是動搖的，不堅定的，仍然表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溝橋事件的解決”，並沒有真正的抗戰決心。他在談話中還表明了和平解決需要固守的四點最低限度的立場，即：

(1)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3)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4)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就是在這幾點最低限度立場的涵義中，也仍然為和平談判留有余地。

蔣在廬山發表談話之后，先派熊斌到北平見宋，說明他的意圖，隨後又召戈定遠傳達命令給宋，大意都不出蔣在廬山談話的範圍，表示了对宋的信任和支援。至于是否準備抗戰，在軍事上應作如何布置，特別是對於正向保定方面開動的孫連仲與原駐保定的萬福麟兩部應如何與二十九軍配合作戰等具體問題，却一字未提。他依然抱着屈辱求和的幻想，一直到了非應戰不可的時候，才被迫抗戰。

當時宋哲元的态度，同樣也是由祈求“和平”而發展到被迫抗戰的。當他在樂陵原籍接到張自忠、馮治安、張維藩（二十九軍總參議）、秦德純等報告事變發生情況的电報時，雖然表現了驚訝與不安，但是他却認為事態不至擴大，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他在答复張等的电報中，說明必須鎮定處之，相機應付，以挽危局。張、馮等在發出給宋的电報之后，并請鄧哲熙前往樂陵，促宋速返，主持一切。宋對鄧表示：日前日本還不至于對中國發動全面的戰爭，只要我們表示一些讓步，局部解決仍有可能。這時，南京方面主張宋應先赴保定，看情況發展如何，再決定是否

回平。但是，宋几經考虑之后，还是偕同邓哲熙等先到了天津。当然，他去天津的目的，不是抗战，而是求和。

宋于七月十一日到达天津。这时，日寇因后續部队 尚未調齐，故在宋未到津之前，他們已向北平的軍政負責人提出了四項要求，与我方进行談判，借以摆出和平解决的姿态，作为緩兵之計。这四点要求是：(1)华軍撤离蘆沟桥；(2)严惩华方肇事官員，正式向日方道歉；(3)取締抗日活动；(4)厉行反共。談判的結果，于十一日双方協議撤兵，恢复和平状态。所以宋到天津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情势似已趋向和緩，于是宋就在祈求“和平”的思想支配下，于十二日发表了如下的談話：“此次蘆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尙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順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認清自己的責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不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負責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則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宋到天津后，二十九軍副參謀长张克俠接到何应欽自南京給宋打来的电话，何在电话中說：“日方增兵，我方应有准备，現在已命令孙連仲、万福麟率部北开”等語。张克俠向宋报告后，建議集中兵力，断然采取主动的攻势作战，經宋同意，张即将作战計劃拟出。张自忠适于此时由平到津，并发表談話說：蘆沟桥事件已和平解决，战事不至再起。故张克俠所拟計劃未能下达实行。这时，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田代业已去职，接替田代的香月清司于十二日到津。宋为了对香月进行一些“摸底工作”，于是

派张自忠偕同邓哲熙往見香月。会面时，香月对当时华北的問題不表示意見，只是由他的高級參謀和知以傲慢的态度对张等說：

“看看你們的历史，北平从来没有駐过兵”，意在威吓我方撤退北平的軍隊，以實現他們的侵略計劃。十八日宋偕张自忠与香月作初次的会面，归后对人表示：“和香月見面，談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問題。”实际上宋的“摸底工作”是失敗了的，他受了日寇的愚弄。日寇真正的“底”是等待援軍开到、部署就緒后，即展开大举进攻，并且在进攻的同时，迫使宋哲元离开冀察，并排除冀察內部一切不肯当汉奸的爱国分子，然后把冀察这个局面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組織。但是，宋哲元却把問題看得很简单，他認為既然香月已經表示了态度，和平解决总不至有問題。不过他对汉奸包围张自忠的情况已耳有所聞，所以在他离津回平之前，叫张留在天津，不讓他去北平。

宋于十九日回平后，看到北平城內通衢各要路口均設有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当命令立予撤除，將关闭数日的各城門也完全开启，并且在返平后的次日又发表了書面談話，其內容是：“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蘆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望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讓，彼此相信，彼此推誠，促进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福祉。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請大家勿信謠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靜听国家解决。”这时，各方已陸續汇来大批的抗战劳軍捐款，由于宋認為和平解决已有可能，竟通电表示謝絕。

宋回到北平后的开始几天，尽量在言論上和行动上制造緩和的气氛，似乎战事不至再起。实际上，情况却在急剧地向恶化的

方面发展。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况是：七月十一日，日首相近卫文麿觐见了日皇，并且举行了紧急閣議。十六日即調派陸軍十萬來華。十七日，東京五相會議，又決議動員侵華日軍四十萬。日本帝國主義早已確定了迅速實現它的滅亡整個中國的“國策”，一時的所謂和平談判，不過是掩護軍事行動的煙幕。因此，在中國方面，縱然不惜以重大的犧牲條件，來換取所謂和平的解決，但已經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從事變發生起，北平鐵路每天都有絡繹不斷的兵車自東北開進關內（北平路局長是漢奸陳覺生，在運輸上是完全為日寇服務的），同時還有從海運而來的大批敵軍由塘沽登陸，熱河省的敵軍也經由古北口開至北平近郊。在敵空軍方面，除了集結在天津東局子飛機場的飛機以外，還在塘沽附近修築了空軍基地，在這一時期內，每日派出飛機多架，輪番在北平上空和平漢路沿綫進行偵察。當日寇援軍調齊之後，復於二十一日炮擊我宛平縣城及長辛店一帶駐軍。二十五日晚間，廊坊敵人以修理軍用電話為借口，與我軍發生衝突，隨即向我軍射擊，我軍立即予以還擊。二十六日晨，敵軍以飛機十餘架和猛烈的炮火向我廊坊駐軍轟炸。二十六日晚，在北平廣安門外有三十餘輛汽車滿載敵軍，企圖冲進城內，因我軍奮勇抵抗，敵入城企圖未逞。二十七日，冀東偽組織的保安隊張硯田、張慶余率部反正，並將漢奸殷汝耕捉獲（詳附錄四），於是立即遭到敵軍大部兵力的圍攻。敵軍并于同日向我南苑、北苑進攻，並且在當天的上午，在以軍事進攻的壓力下，向我冀察當局提出了最後通牒，限我三十七師（即馮治安師）於二十八日正午以前自北平附近退盡。當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持通牒往見宋哲元時，宋派張維藩代為接見，張將通牒送交宋哲元看

过后，宋立即命张予以拒绝，并将通牒退还松井。同时，宋将情况报告了南京，并且表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随即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电文是：“自哲元奉命负责察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的原则下，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以谋华北地方之安宁，此国人所共谅，亦中日两民族所深切认识者也。不幸于本月七日夜，日军突向我卢沟桥驻军袭击，我军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十一日协议双方撤兵，恢复和平。不料于二十一日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于二十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驻军猛烈攻击，继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于二十六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二十七日早三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均在激战中。似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推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伏乞赐教，是为至祷。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叩感。”同时，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派张维藩为城防司令，并配备了城防部队，准备固守北平。在这天晚間，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等督师北上，协同作战。

二十八日，敌军大举向我南苑进攻。当时，二十九军军部已移驻北平城内，驻在南苑的部队共有四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兵力约七千人左右。这时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已由河间、任邱北调，向北平增援。宋于二十七日派赵登禹为南苑方面的指挥官。赵于二十七日傍晚到南苑指挥部，以一三二师后续部队已过永定河，拟俟全部到达后再变更部署，不料敌军于二十八日拂晓即由西、南两面向南苑开始进攻，另以一部切断南苑至北平的公路，同时以飞机数十架低空轮番轰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南苑由

于事先未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仅以营围作掩体，在敌人空军的轰炸扫射之下，部队完全陷于不能活动的地步，且通讯设备又被炸毁，各部队与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完全断绝，指挥失灵，秩序混乱。敌人从营围东面冲入之后，南苑遂告失守。我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向城内撤退时被敌人截击，相继阵亡。

当日寇节节向北平进攻的时候，我驻天津附近的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和旅长黄维纲等的策划下，进行了作战的部署，因师长张自忠去北平未回，故尚在待命出击中。至二十八日，得到日寇大举进攻南苑的消息，同时看到报纸发出二十九军克复丰台和通州保安队张砚田、张庆余两部已反正的号外，随后又接到宋哲元发出的守土自卫的通电，于是，李文田、刘家骥（天津警备司令）和馬彦祥（天津市府秘书长）等，一面发出通电，响应宋的号召，一面调集天津保安队配合三十八师各路部队分向海光寺日寇兵营、北宁路天津总站、天津东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日寇进攻，自夜一时开始，先后与敌接触。此时忽接张自忠由北平发来电报，谓和平有望，但是各处已在激战中，亦无从制止。这时天津的战况是：海光寺已被我包围，因工事坚固，急切难于攻下；天津总站已经克复；天津东站，将敌人包围在一个仓库中；东局子飞机场仅攻占一部分。指挥部自接到张自忠电报后，即停止军事进攻，至二十九日晨，各方面进攻部队均纷纷撤退，敌军开始反攻，海光寺之敌以炮兵轰击河东，敌骑兵闯进南开大学校，将校舍全部焚毁。是役，我军民死伤极众，至午后战事始停。

当宋哲元初回到北平的时候，虽然抱着和平解决的幻想，但是，由于日本国内的大规模军事动员，由于日寇对二十九军不断

的挑衅和进攻，由于二十九軍内部中下层抗战情绪的高涨，由于广大人民的全民抗战的强烈要求，由于全国舆论对他的激励和督促，他的态度逐渐地由主和转变为摇摆不定，终至转变为决心固守北平。当他在摇摆不定的时候，一方面仍然希望战事不至扩大，以便继续维持冀察这个局面；另一方面，又感到局势的严重性，不能不作应战的准备，但仍然表现了犹豫不决，当他对部队发布命令的时候，并没有作出全面的作战计划。而且在要求部队“积极备战”的同时，还提出了“尽量避战”的附加条件。他虽然最后表示了守土自卫的决心，但是在仓猝应战的混乱情况下，已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步。

宋哲元在通电表示了守土自卫的决心之后，一方面进行了守城的军事布置，一方面催促孙连仲、万福麟两部迅速北上。这时，孙、万两部已开至保定以北，先头部队且已到达距北平不远的良乡一带。在这个时机，如果采取紧急步骤，进行统一部署，集中兵力，相机出击，犹能予敌以重创。但是，冀察内部的矛盾，又引起了一个突然的变化。

七月二十五日，宋哲元忽然接到张自忠来平的报告，甚为愕然，并说：“我叫他留在天津，他来北平干什么？”张到平后，受到汉奸张璧、潘毓桂等的包围，很少与外界接触，忽于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许前往见宋，并对宋表示：“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至此，宋已明白了张的意图，于是立即决定离平，并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宋于当日夜间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离平赴保定。

在宋决定了固守北平的时候，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决定发动群众协助守城，当即通过张克侠向宋提出建议。因宋于这天晚间离

开北平，这个发动群众守城的计划亦未能实行。

张自忠在宋离平的第二天，即到冀察政委会就职，将原冀察政委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石友三、周作民等免职，并用冀察政委会名义派张璧、张允荣、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邹泉蓀等为委员，同时发表潘毓桂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张就职后，日寇即直接指使潘毓桂、张璧等办事，而对张自忠则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紧接着，张又得到了三十八师在天津与日寇作战的消息，始知大势已去，全局皆非，乃立即隐置于东交民巷，旋即化装逃出北平。从这时起，他才清醒地认识到受了日寇和汉奸的愚弄，对日寇恨之入骨，后来终于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以身殉国。

二十九军驻平各部队及保安部队，在宋离平之后，均陆续经门头沟向南撤退。因宛平至八宝山之线是掩护门头沟这条交通线的阵地，故驻在这一线的何基沣旅，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之后，方于三十日晚间与当地人民群众洒泪而别，撤退到长辛店。从这一天起，整个北平就完全陷入敌人之手，天津市亦于同日淪陷。

卢沟桥的烽火，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全面的抗日战争便从此开始。

附 录 一

一九三四年冬，热河省伪军一部侵入察东独石口，我驻军刘自珍团当即将其击溃，并缴获步枪三十余支、子弹千余发。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热河日军飞机突向我龙关、赤城一带驻军投掷炸弹。十五日，黑河汛日军司令森一郎又向我赤城驻军提出警

告，要求我龍門所駐軍撤退。我軍尚未答復，日軍竟于十六日向
我軍進攻。因我軍防守得力，敵未得逞。這時，熱河境內大灘一
帶駐有日軍千餘名、偽軍兩千餘名，並有一部向察東移動。宋哲
元當即將情況報告給駐北平的何應欽，請其向日方交涉制止。二
十四日，偽軍兩營向沽源縣推進。因情況日趨嚴重，宋又分報北
平和南京，候令辦理。二十八、二十九兩日，日機又在獨石口、
沽源一帶散發傳單，威吓我軍撤退。經宋派蕭振瀛、秦德純在北
平與日方交涉，日方提出雙方在大灘會商解決辦法。我方提出會
商地點應在北平或張家口，日方則堅持在大灘會商。最後，終於
接受了日方的要求，于二月二日在大灘舉行了會商。我方所派為
三十七師參謀長張樹亭、沽源縣縣長郭育愷及察省府科長張祖德
等三人；日方所派為日軍第七師團十三旅團長谷實夫、第二十五
聯隊隊長永見俊德及中佐松井等三人。會商在上午十一時舉行，
并口頭約定解決辦法如下：察東事件原出于誤會，現雙方為和平
解決起見，日軍即返回原防，二十九軍亦不侵入石頭城子、南石
柱子、東欄子（長城東側之村落）之綫及其以東地區。所有前此
二十九軍所收繳之步槍三十七支、子彈一千五百粒，准于本月七
日由沽源縣長如數送到大灘，交與日方。

附 錄 二

察省當局曾與日方商定，凡日人由熱河省前來察哈爾省的，
須持駐張家口日領事館所發護照，經我方復驗并加蓋省府印信后
始可通行。一九三五年六月某日，有多倫特務機關日人一名，三
菱公司日人三名，經沽源縣到張北縣，我城門衛兵以其并未持有

此項護照，不許通過。日人竟欲強入，雙方發生爭執，守軍即將其送往一三二師司令部。經師部詢明來歷并電省府請示後始放行。該日人認為曾被侮辱，竟由駐張家口日領事橋本向我方提出抗議，并故意將事態擴大，更由天津日駐屯軍士肥原和日使館武官高橋向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提出無理要求。宋當即將情況報告何應欽，并經秦德純與日方談判多次。日方要求：（1）處罰事件責任者，撤換一三二師參謀長及軍法處長；（2）張北等六縣（張北、寶昌、寶康、商都、沽源、興和）駐軍撤出，以地方保安隊維持秩序；（3）撤去察省國民黨黨部；（4）禁止排日行動。南京國民政府令何應欽以通知方式答復日方，謂要求均辦到，逾此，如再有要求，請向中央政府交涉。

附 錄 三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晚，由天津開往北平的火車駛抵丰台車站時，有匪徒百餘人下車，于二十八日零時四十分匪徒突將車站占據，把守電報電話，聲言組織“正義自治軍”，推白堅武為總司令。匪徒嗣即脅迫停于該地的鐵甲車向北平開動，一時許抵永定門東缺口，企圖闖入城內，為城防部隊所阻。匪徒即向城內發砲十餘响，經城內及南苑駐軍夾擊，匪向通縣方面退去。

附 錄 四

冀東偽保安隊張硯田和張慶余兩部，原為河北省主席于學忠的兩個團，在冀東偽組織成立以前，即在通縣一帶駐防。冀東偽

組織成立后，于学忠有計劃地将該两部留駐原地。于学忠与宋哲元为換譜弟兄，私交甚厚，于是张硯田、张庆余又通过张树声（与宋为西北軍老友）帮会关系介紹前往見宋，宋勉勵他們好好訓練队伍，候有机会时再为国家出力，并發給每人两万元。后来他們看到日寇大規模的向北平进攻，故于七月二十七日在通县反正，杀了不少日人，并将汉奸殷汝耕捉送北平。不料二十九軍已經撤退，情况已变，他們即率部撤退到西山一带，后轉移南下。

二十九軍和冀察政權

戈 定 远

一、二十九軍的成立

一九三〇年，閻錫山、馮玉祥与蔣介石的战争結束，閻、馮失敗，馮部在河南一带的，如孙連仲、梁冠英、吉鴻昌等，都紛紛投降蔣介石，只有零星部队退入山西境內，散駐晉南一带。这时蔣介石把华北交給张学良負責，张学良以陆海空軍副司令的名义，由沈阳进驻北平。退到晉南一带的西北軍，以张自忠，赵登禹、刘汝明等部比較整齐，其中又以张自忠部的人数較多，有几千人。宋哲元、孙良誠也都退到山西，他們已經沒有直接掌握的部队了。张自忠等的資望浅，而且他們和东北軍方面向无淵源，联系不上；宋哲元和孙良誠在西北軍中間資望較高，但都已失去实力。在这种形势之下，张自忠就成了举足輕重的人物，他如拥护宋，宋就可以有軍隊做資本；他如拥护孙，孙便可以挟以自重。

在这里要叙述一个同二十九軍的成立和发展有着极重要的关系的人物，就是萧振瀛。他是吉林扶余县人，民国初年在家乡經商，但并无多大資本，只是买空卖空。后因币制贬价，萧經營的商业因亏空太大停业，无法偿还債務，遂溜之大吉，逃进关內依

附在西北軍当高級軍官的吉林同乡門致中和石友三門下。西北軍的士兵和官佐，大多数是直、魯、豫的人，关外人当將領的很少，文職人員也不多。蕭由于門、石二人的推荐，在一九二四年当了临河設治局局长。等到一九二六年南口战役，西北軍被張作霖和吳佩孚联合击败以后，蕭随門致中到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一九二六年秋，馮玉祥在五原誓师北伐时，蕭振瀛被任为包临道道尹，在后方筹餉。以后蕭随宋哲元当幕僚，到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間，宋任陝西省主席时，他曾任西安市市长。当一九二六年西北軍由南口撤退的时候，閻錫山在大同抄西北軍的后路，西北軍因而大败，紛紛向包头一带潰退。这时石友三和张自忠曾一度降閻，等到馮玉祥由苏联回国以后，石、張又复回到馮处。在此期間，石和張发生仇恨。后来北伐进行順利，馮玉祥率部到达郑州，張自忠当了馮的总司令部副官长，石友三带兵当軍长。石恐怕張自忠不忘前仇，在馮面前陷害他，就托蕭振瀛代表他到郑州，送“兰譜”給張自忠，結为兄弟，以示和好。因此，蕭和張也发生了較深的关系。

这时宋哲元和孙良誠都在晉南，他們凭借各人的旧关系，拉攏張自忠和赵登禹。宋、孙二人都想用張、赵做資本，来向張学良請求收編。替孙良誠在張学良方面奔走的是郑道儒（天津人，在馮玉祥西北边防督办署的外交处做过事，在蔣介石由大陆潰逃台湾的时候，做过国民党經濟部部长）；替宋哲元奔走的，是蕭振瀛。蕭先从張自忠处取得拥宋的初步同意后，就来到北平走張学良的門子。他利用关外同乡的关系，找到了从前就認識的一个張学良的承启官（传达事务的人）。蕭对他大加拉攏并送了他一千元錢，請求他讓自己僉先見到張学良，而对于孙良誠的代表郑

道儒，則希望他托詞阻擋，不讓鄭先見張。由於這個承啟官的協助，蕭很快見到了張學良，收到了先入為主的效果。張學良允准宋哲元負責改編晉南的西北軍為一個軍，轄兩個師。等到孫良誠的代表進見張學良時，宋哲元擔任軍長的命令早已下達，成為事實了。

宋編軍之時，張自忠是主力部隊，當然編為一師，由張當師長。還有一個師長，張自忠力主由馮治安擔任，這其間又有一段經過。一九二六年馮玉祥由蘇聯回國後，對張自忠已不加信任，後來由於馮治安的力保，張自忠才慢慢地又得以重新帶上隊伍。馮治安在一九三〇年馮玉祥中原大戰失敗的時候，全軍在河南被繳械，這時正在北平閒居。張自忠為了拉攏好友，擴大自己的勢力，同時又因為馮治安是宋哲元的嫡系，容易得到宋的同意，就竭力主張把馮治安由北平叫去當師長。馮治安并無一兵一卒，他和趙登禹過去關係很好，於是就將趙登禹編在他的部下，作為一個旅，由趙當旅長，另外再撥一些隊伍，編成一個師。二十九軍成立了，宋哲元任軍長，張自忠任三十八師師長，馮治安任三十七師師長。這時晉南的西北軍，還剩下劉汝明一部分，劉的資格僅次於宋哲元，但劉自己沒有別的出路，就依附於宋，後來通過張學良的允許，劉以暫編師師長的名義，隸屬於二十九軍。

二十九軍的軍部，設於山西的陽泉，實際掌握兵權的，為張自忠、馮治安、趙登禹、劉汝明等人。通過蕭振瀛的秘密拉攏，他們商量決定，大家永遠一致擁護宋哲元為“頭兒”，張自忠為“二頭兒”，依次以下，為馮治安，為趙登禹，為劉汝明。劉汝明的資望本來比張、馮、趙高，但是因為這次編成二十九軍，由於張、趙擁宋出力最多，而劉汝明則是最後出于無奈，才依附

二十九軍的，因此，刘的名次落在赵后。他們大家商定，以后如有发展，除开宋哲元永远是首領以外，一定按照张、馮、赵、刘的次序，依次“升官”，决不变更。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二十九軍在阳泉站住了脚，从事休整。

二、二十九軍由山西到北平

二十九軍既在阳泉得到立足之地，但是餉少兵多，經常鬧穷，于是由萧振瀛出馬，向蒋介石方面找路子。当时宋子文为財政部部长，孔祥熙为实业部部长。宋子文最当权，但是他喜欢留学英美的人，誰不会說英語，誰就得不到他的欢心。因此，萧振瀛对于宋子文的門路走不进去，只好走孔祥熙的門路。孔祥熙在一九二四年以后，曾跟着王正廷在馮玉祥处做过門客；北伐以后，孔和馮的往来更密。他和西北軍的人都有些熟識，而且这时他在蒋介石处沒有宋子文吃香，也很想和外边带兵的將領勾搭勾搭，作为他的政治資本，好在蒋介石面前挟以自重，增加身价。这样，萧走孔祥熙的門路就自然比較容易走得通了。二十九軍很穷，但是为了走門路，特地挪借了两万元錢，买了些貴重物品送給孔祥熙。孔大为高兴，就在蔣面前說說宋哲元的好話，因而蔣对宋哲元就有了較好的印象了。但是，二十九軍虽然有时候由蔣拨給几万元的補助費，仍旧解决不了問題。萧振瀛揣摩蒋介石的心思，知道蔣最恨閻錫山，因为历次华北反蔣活动，閻錫山总是操縱其間，而且閹閉关自固，蔣的軍隊开不进去，因而对山西无法直接加以控制。萧于是向蔣献策，表达宋哲元拥蔣的忠誠，并說明西北軍与閻是世仇，官兵恨閻入骨，宋愿意率領部屬，以阳泉做根据地来監視閻錫山，替蔣效忠。蔣听到此話，大加賞識，馬上下

条子拨給二十九軍五十萬元，并增加每月的軍餉。二十九軍得到這項接濟，如同久旱之遇甘霖，从此添購軍械，擴充隊伍，一天壯大一天；宋哲元在華北的地位，也漸漸重要起來。

“九一八”事變以後不久，張學良離開北平，何應欽受蔣命到北平主持華北局面。這時蔣介石正在竭其全力對付在江西的人民武裝力量，不肯把自己的嫡系部隊開駐華北，同時，蔣賣國求榮，怕日本人不願意、也不敢開軍隊到華北來。這時原來駐在華北而戰鬥力稍好一點的隊伍，就只有二十九軍了，於是一部分的二十九軍，就由何應欽從山西調到北平附近，駐防通縣、薊縣一帶。

二十九軍的一部分調駐平東以後，宋哲元跟着部隊離開山西，經常駐在北平。一九三三年春天，日軍在攻打熱河得手以後，向長城各口進軍，二十九軍擔任喜峯口方面的防務。日軍從“九一八”以來，侵略中國從未遭到中國軍隊的抵抗，簡直如入無人之境，氣餒極高。攻喜峯口的日軍，它的前頭部隊就在口外不遠的地方扎營。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間，旅長趙登禹帶着少數部隊突襲日營，日軍再也沒有想到二十九軍竟敢在夜間襲擊，出其不意，倉卒潰退，死傷甚多。由於蔣介石以主力在江西對工农紅軍作戰，華北兵力單薄，不久日軍就突破長城各要隘，兵臨北平城下。何應欽簽訂了臭名遠揚的《塘沽協定》。從此宋哲元就以“抗日英雄”的姿態，出現在華北，當了察哈爾省的主席，而趙登禹也升為師長。這時二十九軍轄四個師，師長是張自忠、馮治安、劉汝明和趙登禹。

三、二十九軍取得冀察地盤

一九三三年間，在宋哲元當察哈爾主席的時期，馮玉祥由山

东泰安北上到张家口，和共产党人合作，組織“民众抗日同盟軍”，抗击日寇。宋哲元对于此事，左右为难，軟硬不得。一方面，宋对同盟軍在他的地盘內抗日，内心是不贊成的，因为蔣介石不愿抗日，同盟軍若是在别处抗日，与他无关，現在偏偏在张家口发出号召，这一定会招致蔣介石对他的不滿，在他看来，这不是替他惹祸嗎？但是另一方面，馮玉祥是宋的老长官，宋是由馮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們之間的封建关系极深，而且宋部下的重要軍官，全是馮的旧部，他們对馮表面上都甚为尊敬，所以宋又不敢公开地制止馮的行动。于是宋只好避居北平，而叫他的二十九軍副軍长佟麟閣在张家口代理主席，与馮敷衍。蔣介石通过他的駐北平代理人何应欽，几次叫宋哲元約束馮的行动，不許馮在张家口抗日，宋始終拖延搪塞。后来何应欽一面叫宋哲元不要过問此事，一面命令駐北平附近的第四十軍軍长庞炳勛（庞曾受过馮玉祥的指揮，馮反蔣失败后，庞投降蔣介石，这时駐軍北平附近），率部攻打张家口的同盟軍。何应欽答应庞，只要他打下张家口，驅逐馮玉祥，便发表他为察哈尔主席。庞欣然受命，整軍待发。但是，这事如果实现，二十九軍就会失去察哈尔的地盘，所有全軍的粮餉就会馬上发生問題，这是关系二十九軍生存的大事。于是就由宋部的师长馮治安出面，向庞警告，如果庞敢打张家口，二十九軍就帮馮玉祥打庞。这时二十九軍有四个师，人数在二万以上，而庞只有几千人，战斗力远不如二十九軍，因此庞吓得不敢动兵。同时，宋向何应欽表示，請何不要派庞去打馮玉祥，由宋保証馮离开张家口。由于二十九軍的軍隊駐在平綏路一带，直接控制着北平附近的形势，何应欽虽然不滿意宋的做法，但仍不能不答应他的要求。在何应欽方面，只要馮玉祥离开张家口，同盟

軍不活動，日本人不逼他，也就如愿了。就在这种情形之下，由宋請馮停止軍事行動，离开张家口，护送他仍回泰安居住，此事遂告一段落。

这时，日軍在《塘沽协定》之后，对华北加紧侵略，勾結汉奸，伪造民意，派出所謂代表，向何应欽要求华北自治，吓得何应欽連夜逃回南京，北平軍分会由办公厅主任鮑文樾負責。鮑眼看北平沒有兵，无法維持秩序，他束手无策，只好商請宋哲元調一部分軍隊到北平駐防。宋得此机会，就把他二十九軍的主力部队，迅速全部南开，控制了北平、天津的形势（經過詳見“七七”事变紀实一文），于是平津一带，就成为二十九軍的势力范围了。何应欽在北平呆了几年，很惧怕日軍，而蔣介石的主力部队正在江西对紅軍作战，所有原来駐在华北的中央軍关、黃两师和东北軍也在《何梅协定》后調离了华北，因此，那时候除了一些零星部队外，华北力量最大的駐軍，就算二十九軍了。蔣介石自己在华北不能立足，只得叫宋哲元当平津卫戍司令，而由宋推荐他的副軍长秦德純任北平市长。不久，蔣介石在北平設立冀察政务委員會，轄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任命宋哲元为委員長。这个委員會，就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随后，平津卫戍司令部改組为冀察綏靖公署，由宋哲元兼任主任，原来的二十九軍軍长，仍由宋兼任。

宋哲元取得冀察政权后，以张自忠为察哈尔省主席，以蕭振瀛为天津市长，秦德純仍为北平市长，而由宋自兼河北省主席。所有华北較大的稅收机关，如統稅、關稅、鹽稅等等，都由宋哲元一一派人接收过来，提用稅款。南京政府管不了华北的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讓出稅收，因此冀察的軍政各費，不愁

支絀。

宋哲元在冀察政委会和冀察綏靖公署里，設置顧問、參議、諮議等一二百人，每人每月送車馬費一、二百元不等，還有送得更多的，凡是居住平津兩地的政客和下台軍閥以及依附日軍的漢奸之類，差不多都網羅在內。宋哲元的意思，以為這樣每月花點錢養着這批人，讓他們有飯吃，有官做，不至於再去勾結日本人來反對他。這完全是採取收買的方法。但是事實上，宋這樣做法只有助長這些人的氣焰，讓他們可以拿着官的頭銜，來更方便地投靠日本人。

宋在軍事方面，將二十九軍所轄的四個師大加擴充，購買槍械，增募兵額，陸續把四個師擴充到五萬人以上，另外還增編騎兵師、保安部隊和獨立旅等等。日本人也賣些陳旧的槍械給二十九軍，二十九軍也從歐洲國家買些槍械。至此，宋哲元攫取地盤、擴充兵力的野心，已經如願以償了。

這時擺在宋面前最緊迫的問題，就是對付日本人的問題。關於此事，最初是由秦德純、蕭振瀛秉承宋的意思，和日本人接觸，而用漢奸陳覺生做翻譯。後來日本人扶植陳覺生，陳就當了北平鐵路局局長。從此以後，日本人通過陳覺生直接和宋接觸，但秦德純還是參與其事。至於蕭振瀛，則由於張自忠的反對，迫得離開華北，到國外去遊歷。蕭的天津市長，由張自忠接任，另由劉汝明接任察哈爾主席。此外，宋把他自兼的河北省主席讓給馮治安。於是，二十九軍四個師長中，三個師長都有了地盤。

由於二十九軍的編軍，是在張學良手中辦理的，所以宋哲元對張學良甚表恭順。宋在冀察一段時期里，對於張學良留下來的東北軍的軍政人員，盡量予以維持。從前何應欽北平軍分會的辦

事人員，都是张学良的旧底子，宋哲元組織冀察政委会和冀察綏署，接收了軍分会，把东北軍的軍政人員全部容納下来。当时东北軍的刘哲（后来曾任国民党監察院副院长）在冀察政委会任常委，帮着宋办事，富占魁（現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任冀察綏靖主任公署參謀长，而莫德惠則經常往来于西安、北平之間。宋哲元和张学良之間的关系，保持得很好。张学良在西安发动双十二事变时，宋接张通电，感到惊異，复电中有“国事由国人解决”及“請保障委座（指蔣介石而言）安全”之語。宋不贊成张学良如此做，但沒有显明地反对他。

四、冀察政权的內閣

上面說过，二十九軍在山西阳泉成軍的时候，內部帶兵官张自忠、馮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四人，曾經有过“分脏名次”的商定。大家約好，这四个人中間，無論何人，功劳再大，也必須按照这个次序，分別先后，享受“好处”。等到二十九軍到了冀察以后，有了地盘，势力也扩大了，这时候，由于沒有完全依照从前規定的“分脏名次”来办事，內閣就由此而起了。

冀察局面刚刚成立，在軍隊編制方面，就发生了問題。二十九軍扩充队伍，拟定每师編制为六个团，但是张自忠自以为是“二头儿”，主张他这一师要多編两个团，就是要編八个团的兵力。馮、赵、刘三个师长都不愿意张的势力特大，但又不便面对面加以反对。由于这个“分脏名次”从前是由萧振瀛通过宋哲元的同意而向他們四人宣布規定的，萧是原来的經手人，因此，由刘汝明出面找萧，說明他和赵、馮等都不同意张自忠师多編两个团，但他們不便自己提出，希望萧在参加宋所召集的师长會議的时候

提出反对，打消这个办法。結果，萧提出四个师应当一样編制的主张，就把张的企图給打消了。本来张自忠从前并不是宋哲元的嫡系，宋也不愿意张的势力太大，所以萧一提出四个师編制平等的主张，宋也就同意了。会議以后，张自忠以为这是违背“分脏名次”，不尊重“二头儿”，对萧振瀛非常愤恨，認為萧从前捧他为“二头儿”，是在愚弄他。不久，张自忠用其他理由，向宋提出撤換萧振瀛。宋向来对张有所顧忌，张每有要求，宋总是敷衍照办的，于是宋就把萧免职，萧随即出国去了。

二十九軍的軍部，設在北平的南苑，馮治安的一师，駐在北平附近一带，宋哲元有时去天津（宋的母亲住天津），就叫馮代理軍长，这也是使张自忠不快的原因之一。因为张总是認定自己是“二头儿”，軍长应当由他来代理，現在宋叫馮代理，看来还是嫡系吃香，因而大为不滿。后来宋又把河北省的主席讓給馮治安，张更不高兴，因为在冀察的两省、两市范围内，河北省的位置似乎居于首位，张当时任天津市长，天津虽然重要，但是地面小，不能和河北省比，从此张对宋更加不滿了。

天津有日本租界，是华北汉奸政客和下台軍閥集中之地，这些人想捧张自忠弄点好处。特别是汉奸們知道宋哲元不得日軍的欢心，他們就凭藉日本人的势力，包围张自忠，要抬他起来和日本人更妥協地办事。当时张虽有代宋之意，而力量不够，宋还有其他几个师长的拥护，他一个人推不倒宋。汉奸們如潘毓桂（曾任伪政权的天津市长，日本投降后被逮捕入獄）、张璧（已死）、齐燮元（汉奸，已处决）等等，和张的左右亲信互相勾結，打算仿照曹錕、吳佩孚的办法（曹当巡閱使时，諸事不大过問，全由吳孚佩主持，曹不过当傀儡而已），叫宋在名义上当冀察的負

責人，而實際上由張自忠主持一切，總攬大權。他們曾經將此辦法，由齊燮元、張璧借端向宋試探，宋置之不理。同時，張自忠也知道宋的個性剛強，不是甘於當傀儡的人，因而不敢貿然從事。但張不甘心久居宋下，他明白當時的南京國民黨政府管不了宋，只有日本人，宋才有所顧忌，於是他便墜入漢奸的奸計，加緊和日本人聯繫，並應日本的邀請組織赴日參觀團，由張自忠任團長，到日本參觀，拜訪日本當局。因此，當時天津親日的空氣異常濃厚，特別是在“七七”事變前幾個月，那時張自忠已成為日軍心目中的華北中心人物了。“七七”事變後，二十九軍戰和不定，主要就是因為張自忠掣肘。後來在日軍發動全面進攻的緊急情況下，張自忠竟勾結日軍逼宋哲元退出北平，由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委會委員長。不久，日本人以瓦解二十九軍的目的已達到，就踢開張自忠，將平津和冀察直接控制起來，成為向中國內地侵略的後方。

韓、石叛馮和閻、馮聯合反蔣的經過

鄧 哲 熙

一

韓復榘與石友三，都是馮玉祥當十六混成旅旅長時候的營長。那時，馮部下有中下級軍官十三人（劉汝明、孫連仲、孫良誠、韓復榘、石友三、閻承烈、過之綱等都在內），都是馮的親信，頗為活躍。這十三個人，遇到有事，常常越過本管長官而直接找馮，馮也喜歡直接抓他們，好直接抓兵，從而控制全軍。因此，這十三個人在馮面前炙手可熱，大家稱他們為“十三太保”。韓復榘、石友三就是其中的二人，他們是馮的基本嫡系人物。韓復榘、石友三在馮部下，由士兵升到官長，隨着團體的發展，水漲船高，一直跟着往上升。當一九二六年馮部由北京撤退到察哈爾、綏遠一帶，和張作霖、吳佩孚在南口相持的時候，韓、石已經當了師長。由於山西的閻錫山看見馮部在北京已經站不住腳，他就乘機在馮部通向后方的命脈——京綏鐵路上，在大同、天鎮一帶，腰擊國民軍，企圖壓迫國民軍西撤，退出察哈爾、綏遠，由山西派軍隊接管。馮部因為後路一斷，勢必全軍覆沒，於是幾次猛攻大同、天鎮，但未能攻下，僅僅把山西軍隊壓迫退到大同、天鎮的城內，使他們不能夠再出來騷擾鐵路，而京綏路可以

保持通行，不致受阻。韓、石二人在攻打大同的戰役中，表現勇猛，韓尤為突出。後來南口不守，國民軍全部沿京綏鐵路向西潰退，打算經包頭、五原退往甘肅根據地（馮部將領劉郁芬在一九二五年率部進入甘肅，代理甘肅督辦，占據該省為國民軍的根據地）。這時，馮已在幾個月前離開部隊去蘇聯，部隊交由張之江、鹿鍾麟等率領。南口敗退後，軍隊損失甚大，給養軍費，絲毫無着，而向西撤退，沿途都是荒涼貧困之地，前途極為困難。韓、石兩部兵力損失不太大，行至綏遠、包頭一帶，不肯再往西撤，而與駐在大同方面的山西將領商震取得聯繫，投降山西，由山西供給糧餉，以資維持。不久，馮氏由莫斯科回國，經庫倫到達五原，收拾殘部，就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這一天，在五原誓師，率部響應北伐。馮把南口戰役潰敗的責任，全部推在張之江、鹿鍾麟的身上，重新樹立自己的威信，對於韓、石二人的投降山西，聲言那是在張、鹿負責時期的事情，現在他本人回到軍中，既往不咎，盼望韓、石仍舊回來，一同北伐。那時韓、石兩部，還在包頭、綏遠一帶，和山西方面勾勾搭搭。馮在五原誓師後，親自到了包頭，見到石友三，叫他西開。韓此時在綏遠，逗留不前，馮親自和商震通電話，請他催韓西開。馮一直等到韓、石兩部向西開動後，才離五原赴寧夏。韓、石一度降晉，後來雖然跟馮北伐，但彼此之間，在精神上始終有隔閡之感。

北伐時，韓、石於一九二七年五月間在豫東打垮張宗昌、褚玉璞、孫傳芳等人的隊伍，使蔣介石的軍隊得以奪取徐州。一九二八年春間，在豫北彰德一帶與張學良的精銳部隊激戰獲勝，韓部出力最多，乘勝北追，直到北京。此時，蔣介石已採取以閹制馮的策略，把河北省和平津兩市都給了閻錫山，叫馮的軍隊退出

北京（只由馮保荐了一个北平市长）。韓攻克北京，滿以为这次总可以得到河北省的地盘了，不料馮遵蔣令叫他退回河南，他空手而返，很不高兴。后来馮把自己所兼任的河南省主席讓給韓做，并派他为河南剿匪总指揮，但又把韓所兼任的二十师师长开了缺，而命石敬亭接任二十师师长。河南省的主席，本来是由民政厅长邓哲熙代理，韓当主席后，各厅厅长都还是馮兼主席时期的原班人馬，韓不能随便撤換，只不过当了一个空头主席而已。二十师是韓的基本部队，韓丢了二十师的实力，而当了一个空头主席，頗不愉快。同时石敬亭接任二十师师长后，曾对官兵講話，痛罵該师紀律不好，說：“韓复榘把你們二十师带成土匪了”，等等。韓听了这些話，极为憤恨，又因石敬亭当时在馮面前很为吃香，韓对石无可奈何。后来韓叛馮后，曾对人說过：“我的离馮，是石敬亭逼的”，云云，可見韓恨石敬亭之深。

韓当河南省主席后，因为省府全班人馬都是直接給馮办事的人，他不能为所欲为，所以經常不問省府之事，常常出外巡視，又常在何其慎家中玩乐。何其慎是河南人，这时当河南省的民团司令，住在开封，韓瞞着馮常到何家，嫖賭玩乐，又在出巡的时候在許昌娶了一个戏剧演員紀甘青为妾。馮对待部下向来是一套封建家长制，他的高級將領都是由他一手从士兵提拔起来的，故而馮对待他們也是毫不客气，与对待士兵一样，見面叫名字，沒有叫号的，动不动就罰跪。馮对嫖賭玩乐，禁令极严。韓的行动慢慢地被馮知道，馮甚为震怒，但对韓又不好处分，遂借故把何其慎押了起来，又在將領士兵大集会的时候，大罵嫖賭玩乐之人，隱隱指韓而言。韓当时亦在場，甚为难堪。

北伐战事停止以后，孙良誠、韓复榘都当了主席（孙是山东

省主席），連个沒有带兵、沒有立战功的石敬亭，也代理过山东省主席，而石友三始終沒有当上主席，因此石常对人发牢騷。

北伐时，韓、石自負战功甚高，但馮每逢表揚战功，总是把孙良誠放在第一位，称孙为常胜將軍，称孙所带的部队为铁軍。馮的这样做，最为韓、石所不滿。

韓、石降过山西，总怕馮不忘前事，对付他們。在战事进行的时候，大家集中精力，一致对付敌人，彼此都顧不到这些事情，这种恐惧还不太突出。到了北伐战事停止以后，韓、石二人就都心怀不安，慄慄自危了。

以上所述的种种，可以說是韓、石叛馮的远因。在这里应当說明的，就是韓的为人胆大敢干，石則比較胆小而多疑，因为二人都当过降將軍，同有內愧，因而彼此关系密切，石的行动，差不多唯韓的馬首是瞻。叛馮之时，由韓带头首倡，石友三追随韓后，采取一致行动。韓之所以敢于带头叛馮，那是种因于他在武汉見到蒋介石的时候。

自从編遣會議之后，四集团軍李宗仁酝酿反蔣。一九二九年的春天，李打发代表溫乔生到河南輝县的百泉見馮。这天馮与溫見面，适逢邓哲熙由开封到百泉找馮。馮見邓来到，就叫他参加密談，在座的除溫、邓二人外，沒有他人。溫向馮陈述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思說，蔣介石拿編遣的名义，压迫二、四集团軍（馮是二集团軍），李、白决定打蔣，約馮一同动作。馮当时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一定也打蔣，但布置軍隊，需要時間，希望李、白发动后，能够撑持两个星期，到时他一定响应云云。溫回武汉后不久，李宗仁、白崇禧发动反蔣，馮派韓复榘带兵駐武胜关待命。这时，馮一方面恨蔣（主要是由于蔣把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給予閻

錫山，并在編遣會議中蔣聯閻共同压制馮），想要乘此机会反蔣，另一方面又想夺取武汉，拿到湖北省地盘，把河南与湖北連成一片，既能控制长江形势，又可增加财政收入。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之下，馮意图取巧，就采取了卞庄刺虎的办法，打算坐观虎斗，一举而得两虎。不料李明瑞倒戈，沒有几天功夫，李宗仁的部队全部潰退，战事迅速結束。事出意外，馮的計劃完全失敗，只好通电討李，命韓迅速向武汉进兵。蔣介石获得全胜，很快地到了武汉，电韓复榘停止进兵，并召他来見，于是蔣、韓就在武汉晤面了。見面的时候，蔣和宋美齡亲自招待韓复榘夫妇（韓帶紀甘青同去），对韓嘉奖备至，口口声声称贊“向方兄（韓的号叫向方）的战功卓著”，并說，现在北伐成功，不应再有內战，应当从事和平建設，云云。韓向来見馮，馮总是連名帶姓地叫他，不但毫不客气，而且还給他碰釘子，这次受到蔣的优礼，受宠若惊，又感激，又高兴。临別之时，蔣送韓十万元，并用各种方法攏絡韓复榘，准备对付馮玉祥。

这次蔣、韓的会見，对韓的影响极大，此后，蔣韓之間就发生日益亲密的关系了。

一九二九年夏天，馮准备反蔣，把原来駐山东的孙良誠部队及在河南的軍隊，全部西撤。馮在华阴开軍事會議，表示要反蔣。韓复榘出席會議后（此时石友三在南阳），对人說，“我們的队伍从前都是經由西北打出潼关的，西北地方的穷困，我們亲身经历过，現在又要退往西北，軍隊豈不都要餓死”，云云。馮的意思是，他的軍隊从甘、宁、青、陝，一直摆到豫、魯，长达几千里，对蔣难以作战，譬如与人搏斗，直伸两臂，无法用力，必須先把两臂弯曲回来，然后再打出去，才能有力。根据这个想法，

馮預定把在山东的孙良誠部撤到河南，把河南的力量撤到陝西，逐步后撤，摆好陣势，再来反蔣。同时，馮以从前南口战役，吃过閻錫山抄袭后路的大亏，所以这次打算等候队伍摆好之后，先压迫閻錫山表明态度，一同反蔣，如果閻不肯从命，就先打山西，再打蔣介石。馮的計劃，再也沒有想到会遭到韓的反对。韓在华阴會議以后，馬上到陝州。这时他从前所带的基本队伍二十师在陝州，师长已由石敬亭換为李兴中，但旅长以下的軍官还是韓的亲信担任，沒有变动。韓招集旧部密議，叫旅长孙桐萱当师长，把队伍全部东开，把李兴中裹胁到洛阳，連同邓哲熙及邓所率領的奉馮命西撤的河南各厅局处的負責人，一并胁往洛阳，把邓哲熙、李兴中等人关在洛阳的西工。邓哲熙、李兴中等人不肯随韓叛馮东开，韓在临离洛阳的时候，派队前往西工围杀他們，但是他們已在事前得到消息，逃离西工，幸免于难。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韓由洛阳发出“养”电，通电維持和平，拥护中央，第二天又給蔣两个“梗”电，表示拥蔣。

这时蔣介石看到馮突然把山东、河南的队伍和各机关人員节节西撤，知道馮要对付他，但又摸不清底細，何以馮不先动手而急急往西撤兵。蔣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忽然接到韓的电报，真是喜出望外，当日复电嘉奖，并許所有駐陝甘部队概归韓指揮，并派石友三为討逆軍第十三路总指揮，又立即送現款五百万元（一說是一千万元）作为犒賞。在韓通电反馮以后，蔣就在五月二十五日用国府命令討伐馮玉祥。

馮自韓、石叛变后，事出意外，感到困难，不久便由潼关过黄河到太原，西北軍的声威大落，全部退入潼关闭关自守了。

韓在洛阳发“养”电时，把石友三、馬鴻逵、龐炳勛的名

字，都列在上面。石是久存反馮之心，与韓一鼻孔出气的，“养”电以后，石果然由南阳率部队到郑州与韓会合。其余馬、庞諸人，都未随韓行动，相反的，庞部駐在洛阳东边的黑石关，听到韓率部叛馮东开，庞立即予以截击。韓东面受到庞的截击，西面又受到孙良誠的追击，潰不成軍，只得带着残部离开铁路，繞道逃到郑州。此时如果没有石友三响应韓而率部在郑州会合，韓的实力消失，已經无能为力了。

二

馮玉祥自从韓复榘、石友三倒戈以后，不仅精神上受到意外的严重打击，在威信方面也大为低落；虽然当时其他将领沒有繼續叛变，但馮对于西北軍的自信心，已不如从前的坚强，而感到困难重重了。蔣介石用国府的名义下令討伐馮玉祥后，閻錫山由太原电馮，劝他出洋，自己愿意陪同出国。馮接閻电，遂即通电下野。馮感到时局轉变，于己不利，但反蔣这口气沒有出，于是派邓哲熙、曹浩森（馮的參謀长）到太原找閻，希望閻共同反蔣。閻閃爍其詞，主要的意思就是約馮过河到晋面談。馮以不得要领，又派邓哲熙到太原找閻。馮面告邓說：“只要閻能够共同反蔣，除去不能应允亲到山西这一个条件以外，閻其余的条件，都可接受。”邓受命后，由潼关渡河，刚到对岸风陵渡，遇見李書城正要去見馮，請其赴晋。邓告李，馮不能考虑赴晋。李說，他已与閻說好，馬上过河見馮。

李書城与閻为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这时他是唐生智的总參議，由北平到太原訪閻，代表唐与閻商反蔣之策。李听到閻部重要将领孙楚等談起，馮不接受閻的劝告，无意出洋，李当即表

示，如果閻決心與馮一同出洋，他可以去見馮面勸。孫楚等立即把李書城的話報告閻，閻大喜，第二天就派汽車送李到風陵渡過黃河見馮。李與馮原是舊友，早在一九二四年間，馮玉祥聯合胡景翼、孫岳發動北京政變，倒吳囚曹，曾由黃郛出來組織攝政內閣，李書城就是由於孫岳的推薦而擔任內閣中的陸軍總長的。從那時候起，李與馮成為相識。李是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時他曾任黃興的參謀長。馮對李向來很尊敬，此時馮遭韓、石之變，正在傷心愁苦的時候，見李遠道而來，甚表歡迎。李與馮談，大意說：“蔣自打垮李宗仁以後，排除異己，更見毒辣，唐生智和兩廣方面，連閻錫山在內，都想反蔣。但是唐生智對你（指馮）素有惡感（唐的老師蔣百里，是有名的軍事學家，有一次報上誤載蔣是馮玉祥的參謀長，馮部加以否認，言詞之間對蔣很不客氣，蔣認為這是馮有意污辱他，非常憤恨。唐對蔣百里極為尊重，言聽計從。由於蔣的恨馮，因而唐對馮也發生了嚴重的惡感），唐一定要先打垮你，才反蔣。目下桂系新敗之餘，蔣的氣焰正盛，你要反蔣，沒有幫手，形勢對你不利。況且韓、石是你一手提拔起來的人，無異於自己的親子弟，竟至突然叛變，如果馬上興兵反蔣的話，那你就不能不考慮對自己軍隊的把握問題了。我看閻的為人尚稱誠實，他現在約你一同出洋，你何不趁此機會，躲閃一下，和他出洋走走，我也可以陪你們同去。這樣做法，於你有利。你在軍事上威望很高，但在政治方面還需要樹立威信。你出國後，把軍隊交給將領，力量還是整個的，蔣決不敢打他們。你在国外與外国的政治家往來接觸，取些聯絡，有時對國內發表一些政治言論，借此增高聲望。不出半年，國內反蔣之戰必起，那時你回到國內，重新掌握自己的軍隊，其他反蔣的勢力，一定會推

重你。你振臂一呼，蔣介石非垮不可。”馮与李談話后，決定赴晉見閻面商，遂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帶同妻女偕李書城过河到山西。

閻見馮居然应邀到晉，喜出望外，大加招待。从此，閻在蔣介石方面，挾馮与西北軍以自重，身价大增，蔣派閻为西北宣慰使兼办軍事善后事宜，并亲到北平，邀閻面談，拉攏备至。

馮初到山西时，閻在表面上还虛与委蛇，談談反蔣的办法，同时也准备些出国的服装用具，好象真要出洋的样子。但閻自从到北平見蔣以后，就不談出洋，也不談反蔣，更进而不与馮見面了。馮所住的建安村，周围皆住有閻的卫队师，由师长杜春沂負責監視馮的行动。馮要見閻，閻总是托詞不見。馮忍无可忍，有一天，坐上汽車开出建安村外，声言要去太原見閻。杜师长阻拦无效，跪在馮的車前，求馮不要出村。馮怒置不理，仍命開車前行。杜师长赶忙電話沿途駐軍，把公路挖了一条大沟。馮車到时，无法过沟，不得已只好折回建安村。馮感到受閻誘騙，非常憤慨，曾經計劃化装跑回潼关，又因他的身材魁梧，无法改装隱蔽而作罢。李書城因为他是劝馮到晉与閻共商反蔣的，現在閻对馮如此，李心甚为不安，每日打坐习靜，表示一定要在建安村住下去，与馮一同“坐监”。这时，主张閻馮联合反蔣而对閻有說話資格的人，除李書城外，还有山东名流王鴻一。王与馮相識多年，素受馮的尊敬。李、王二人，常常向閻进言。

西北軍將領对于閻扣留馮向蔣买好的作法，甚为憤慨，又因經濟方面沒有办法，穷困万状，亟待接济，于是又恢复了与蔣方往还的局面。这时，鹿鍾麟在南京当了軍政部长，西北軍与蔣之間形势趋于緩和。宋哲元派他的參謀长陈琢如去南京見蔣，弄到

了一些給养补充。閻見此情形，大为着慌，深怕西北軍繼續直接与蔣往来，他就会失去了重要性，因而改变办法，在中秋节的夜間亲自找馮，答应与馮联合反蔣，而叫馮命令西北軍先发动。于是遂有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西北軍出兵潼关討蔣之举。这次，由刘郁芬、石敬亭、宋哲元等西北軍將領联名通电討蔣，由宋哲元代理馮的总司令职务，由孙良誠任前敌总指揮。出兵后，連打胜仗，进展甚快，但閻始終沒有表示反蔣，也沒有发动队伍，这就影响了西北軍的士气。同时，孙良誠不服从宋哲元的指揮，二人大鬧意見。孙一怒之下，把部队突然后撤，因而全綫混亂，紛紛潰退到潼关以內。至此，西北軍仍旧恢复了闭关自固的形势。馮痛恨閻的背信，憤而絕食，經李書城、王瑚（馮的顧問）等力劝，馮才复食。

当宋哲元出兵討蔣的时候，唐生智帮蔣打宋，宋退回潼关，唐达到了先打败馮的愿望，遂决定反蔣，派他的顧問袁华选到太原找閻，說明唐要反蔣，請閻支持。李書城与袁华选商定，以閻对馮反复无常，应当引为前車之鉴，这次唐的反蔣，須要求閻代拟通电，以坚盟信。閻同意代唐拟就通电，約定等唐动作后，閻即响应。袁华选回到唐生智处不久，唐就出兵反蔣。唐派了許多軍事长官，而并没有拥戴閻的表示，完全是自己当首領的派头。閻对此大不高兴，遂按兵不动，以后看着唐的形势不利，就出兵打唐。唐受了蔣、閻的夹击，就被打垮了。

馮鉴于自己不能回到軍中，而將領又各有意見，不能相下，于是命令当时在天津的鹿鍾麟回陝負責。鹿由天津取道大同，路过建安村，与馮秘密晤面后，潛赴潼关，就代理总司令职。馮命鹿等迅速采取措施来对付閻。有一次，馮亲笔在一本“三国演

义”上用米湯密写了給鹿鐘麟、宋哲元等的信，說：“你們一定要設法对付閻，能够联合韓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更好，千万勿以我为念，而且只有你們这样做，我才能够有办法”，云云。鹿等照着馮的指示去做，并且派人与蔣方联系，企图联蔣反閻。

自从馮到山西以后，接着西北軍及唐生智相繼反蔣，閻利用时机，向蔣大做“生意”，一帆风顺。在軍职方面，他已經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当了蔣的副手，做了陆海空軍副司令。但是閻并不以此为滿足，他和其他的大軍閥一样，抱着自己当头子的野心。同时，他看到蔣的“削藩”計劃正在次第实施，北伐时代的四个集团軍（蔣是国民革命軍总司令兼第一集团軍总司令，馮是第二集团軍总司令，閻是第三集团軍总司令，李宗仁是第四集团軍总司令），馮、李已被蔣打倒，眼看就要輪到自己头上来了。至于坐鎮关外的张学良，这时从事整理內部，和蔣的关系很为接近，因此，閻感到蔣的矛头已經指向他来，即使他不反蔣，蔣也不会容許他的势力存在下去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历年来各方面的反蔣，背后都有閻的活动，其中內幕蔣方完全明白，閻知道这笔帳迟早蔣是要向他清算的，因而惴惴不安，力爭先发制人的有利形势。正在这个时候，閻得到密报，說西北軍进行联蔣倒閻，大吃一惊，馬上又来亲自找馮，共商反蔣了。

这次閻迫于自身的利害关系，决心打蔣。他自任首領，請馮回决指揮西北軍，找汪精卫北上主持扩大會議。在馮临行的前一天，閻用极“誠懇”的态度和馮說：“大哥（指馮，馮与閻是“把兄弟”）来到山西，我沒有馬上发动反蔣，使大哥受些委曲，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討蔣，我沒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軍受到損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

方。現在我們商定聯合倒蔣，大哥馬上就要回到潼關，發動軍隊。如果大哥對我仍不諒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跡。大哥回去以後，倘若帶兵來打我的話，我決不還擊一彈。從今以後，晉軍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軍隊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決不歧視。此心耿耿，唯天可表”，云云。閻并立即交給馮現款五十萬元、花筒手提機槍二百挺、面粉二千袋，作為歡送的禮物。馮此時唯一的希望，就是要迅速回到軍中，當即慨然表示，對於已往之事決無芥蒂，此後彼此一德一心，共同倒蔣。第二天——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馮由山西到達潼關，他的妻女仍留住太原。馮回到潼關對他的高級將領們說：“蔣介石是我們第一個敵人，我們現在必須聯合閻錫山打倒蔣介石，等到蔣介石被打倒以後，閻錫山是容易對付的。”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馮通電就陸海空軍副司令職，同日，閻在太原就陸海空軍總司令職，雙方出兵討蔣，中原大戰，從此開始。

一九三七年訪問英、德和苏联的回忆

翁文灏

一九三七年春間，伦敦要举行英王加冕典礼。那时我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做秘书长，忽然见到命令：中国派代表团前往庆贺，孔祥熙为特使兼团长，海軍部长陈紹寬和駐英大使郭泰祺为代表，我为代表团秘书长，此外还有参赞、秘书等人。此事内容意义如何，我并未预先知道。我见了秘书长头衔，吃了一惊，就往见行政院长蒋介石，面告他说：孔不会要我管事，我也不愿管他的事，希望改为参赞。蒋说：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各有不同的任务。孔做什么，你不用过问。你的工作直接对我负责，不必对孔报告。你的任务是什么呢？日本对我国不断侵犯，免不了要用武力抵抗。但武力抗日，双方强弱不同，我国势必大败。那时，不但我国吃亏，欧美各国在我国所取得的许多权利，定必尽归消灭，被日本一口独吞。可见中日交战于它们具有切身利害关系。可是它们究竟将有何办法，我们还不知道，此时还不宜正式提出交涉。你在外国素有声誉，我盼你趁这机会，访问欧洲各大国当局，告以当前危机，问它们如何看法，对我密电报告。意在探询它们的具体方针，并不要你同它们签订任何协定。”

我对这样一个任务是愿意担任的，因即同代表团诸人乘船赴

英，后又轉到歐洲大陸。所有訪談情況，就我記憶所及，撮要記述如下。

英 國

在倫敦，我先拜訪財政部顧問李滋羅斯。我在南京就已經先與他認識。那時他在中国幫助孔祥熙收集國內銀幣，發行不兌現的鈔票，名為法幣。當時由他的接洽，英美兩國在我國所設的銀行，都將所藏銀元交給國民黨政府。隨後，孔與他商量一筆借款。李滋羅斯却托人對我說，要我約蔣與他作一次單獨談話，必須宋美齡和孔祥熙都不在場。後來蔣果然定期接見，我就當了翻譯。在这次談話中，李滋羅斯竭力說孔的不好，表示用他做財長，英人極不信任，必須改任別人，他才可把這筆借款介紹成功。蔣對此意見不置可否，只說了些中英友誼的空話。

在倫敦見及李滋羅斯時，他對這次仍用孔來英要借兩千萬鎊一事，大發牢騷。我要他言歸正事，介紹我訪問英國當局。他說，保守黨內閣首相包爾溫就要下台，繼任者是張伯倫（時任財政大臣），外交大臣仍為艾登。當經商定分別會見。

張伯倫和艾登二人的意見基本上相同。他們認為日本要在華北單獨投資，但在華南則要求英國依照四國銀行協定，遇有投資和借款的機會，必須通知日本共同參加。他們面告我說，英國不論在華北或華南都有權投資，英國願意在華投資經辦各種企業，英人經驗優良，必能抵制日本，盼中國政府加以信任；至於武力戰爭，英國決不參加，萬一中日交戰，英國立即遠避，中國不可空望幫助。

我听了此話后，自加考慮，深覺當時納粹德國武力日強，

英國力不能敵，自顧不暇，所以畏懼戰事；但英國政府要借此機會更進一步擴展它們在我國的經濟勢力，專為它們自己打算，於我國沒有好處，只有置之不理，因即停止進行訪問。

回到大陸，先往巴黎。我見法國內閣極不穩固，此起彼倒，循環變化，覺得此種大事無從談起。因此，我對他們沒有談到具體問題，旋即轉往柏林。

德 國

那時德國由希特勒為首的納粹派當權。我首先訪問了經濟部長兼德國銀行總裁沙赫特。於此必須先說明一些那時蔣介石政權與納粹政府的关系。

蔣介石手下原聘有少數德國高級軍官做顧問，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曾經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首先重建國防軍、因而在德國很負重望的塞克特將軍。此人年高，不久即去。任期較長的德國顧問為法根浩森將軍，後來德軍在歐西侵戰勝利時，希特勒迫令他回去，任為比荷總督。

納粹派先曾派秘密代表克蘭到廣州，拉攏反抗蔣介石的陳濟棠，表示願意用德國軍械交換中國貨物（如同鎢砂和錫）。軍事顧問德國某將軍表示不滿，因此納粹派就令克蘭改到蔣介石方面去接洽，當由蔣命孔祥熙與他於一九三四年簽訂交換貨物合同。蔣想用這個方法來取得德國所制的上等槍砲。那時我因被汽車撞傷，病勢沉重，當時又尚未參加蔣的政府，對此事完全隔膜。而且這個交涉極為機密，其具體內容連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都不知道。接着，蔣又密派顧振（開灤礦務局總經理）率領凌光揚（孔所荐的人）、鄧悌（蔣的特務）等往柏林與沙赫特部長當面洽談，

續訂了一个长期貸款合同。依照这个合同，中国建設有关国防的工业厂矿，可与德国訂立契約，由德国帮助建設，所需資本即由德国貸款支付。这段交涉，我在行政院秘書長任內曾与聞其事，因此，我先到了柏林，就找見了沙赫特。

沙赫特对我大加鼓吹中德两国聯絡交誼的重大意义，認為决不只是供給少数枪砲，实需要为經济发展前途爭取远大效果。談到对日本武力抗战的問題时，他說这事是參謀部职掌，介紹我去訪見当时主持軍略的某少将（忘其确名）。

那时，孔祥熙等还在柏林，由沙赫特做中心隆重招待。有一次孔和我被邀往德国外交部，由次长（部长往別国訪問去了）郑重說明，德国虽同日本訂有防共协定，但决沒有絲毫妨碍中国的意思，相反的，德国方針是极愿与中国增加联系。有一次，我們被邀到柏林郊外去看一个軍事演习。一支軍隊保卫住一个据点，另一支軍隊施以攻击，因为攻击者弄錯了目标，所以无法攻破，而且防守者突出一支奇兵，把攻击者包围了。这是对我們的一种含有用意的表示。

在那时候，孔祥熙突然飞往美国，大約是去見美国总統罗斯福，談話情况，我不知道。后来他又回到欧洲，等到中日已开战之后才回国。陈紹寬在英国要購買潛水艇，沒有成功。他在德国也曾商洽購買，也沒有成功。

德国某少将同我談話时，首先說明：德国經济工作全以增强武力为前提，現在德国武力强大，設備充足，已經冠于世界各国；中国要德国帮助抵抗日本軍隊，必須相信德国对中国的真正好意，不可怀疑。

他又說：中国目前軍隊要同日本正式作战，条件相差极多，

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采取守势；守，又必須能久，必須在工事上和設備上准备十分充足，才能有效。为了这个目的，他提議：中国宜聘用一整批德国軍事顧問，包括各部門專門軍官，归一个德籍总顧問統率，这个軍事总顧問归蔣指揮，对蔣負責。这个德国軍事顧問团的任务，是帮助中国政府选定地区，建筑对抗日军进犯的坚固防綫。这种防綫应当能够固守两年，使日军不能越綫內犯。在这个時間內，中国应努力作国际活动，以期轉危为安；至于防綫以外的地区，只好暂时放棄。他以为这是比較可靠的方法。

我不是軍人，对軍事一点沒有修养，所以我无法估計这位少将所提办法是否在战事上足够有效。可是从整个办法看，我覺得如此做法是把我国軍事指揮权交給德国，交給富有野心的納粹德国。这好比前門拒狼，后門进虎，危險一定很大的。因此我認为这个提議我国不应接受。我以此意密电蔣介石，并建議續往苏联商談。蔣复电催我迅速前往苏联，并告我时机很紧，不可迟延。

我于此必須补述一些納粹德国拉攏蔣介石的經過。蔣請德国軍事顧問是在納粹派当权之前，并不是为了交結納粹派。德国老派軍官与納粹派之間是存有矛盾的，納粹派很費苦心，用打破凡尔賽条約、自强独立、反苏反共等道理來說服和聯絡国防軍，才能勉为合作。

納粹派拉攏蔣介石，訂立換貨合同只是开始第一步，真如某少将說，供应少数枪砲是无济于事的。

納粹派对中国的野心計劃曾有好几次表示。有一次，在中日交战之前，蔣介石正在設法对付广州号称独立的陈济棠，忽然有德国元帅賴世璠奉希特勒之命，到来拜訪。蔣的第二个儿子蔣緯国

向在德国学习军事，就在赖世璜元帅的部下，大约就是利用这个关系，叫他来联络的，具体用意没有预先通知。蒋指定熊式辉招待他，并请他参加阅兵。这个军人说话直率简单，他对蒋说：中国军队对外作战是没有用的，所聘军事顾问不够好也不够多，不能发生作用，唯一补救方法是，聘用许多军事上各有专长的德国军人；这些军人又不可能各自独立行动，必须由一个总顾问居于统率的地位来部勒和指挥他们；这个总顾问代表整个团体对蒋建议，对蒋负责，其他顾问则听总顾问的指挥。

蒋的答复是，德政府推荐优良军官做顾问是可以的，但每个顾问应订立个人愿为中国服务的受聘合同，中国政府有权直接指挥，并有权聘用和解聘，总顾问统筹重大的事情，但不能因此使蒋断绝与其他各顾问的直接关系，所有顾问都应对中国负责，不是对德国政府负责。意见既不相同，这位元帅只好悄然回去了。

又一次是在中日已经开战、蒋政权中枢移往武汉的时候，那时宋子文统辖中国银行，住在香港。德国纳粹代表克兰也在香港，向宋游说，要创设中德合办的南洋航业公司，由宋主持其事，由德国供给轮船及技术人员，用很低的运费来帮助华侨。他说，华侨在南洋是一支很大的经济力量，中国政府应当使用德国的物质能力来支援他们，轮船旗帜全用中国国旗，德国完全赞同。这个办法明明是要用中国作媒介，使德国势力伸展而进入到南洋地区。大家知道，纳粹派对于当时富藏石油的苏门答腊、爪哇等荷兰殖民地抱有掠夺的野心，他们想用联络中国为名来实现这个目的，其自私计谋是很显明的。这个办法也幸而没有实现。

苏 联

我往苏联是以参加莫斯科国际地质学会会议为名的，經由駐苏大使蔣廷黻通知苏联外交部要商洽一些公事，苏联政府派人招待。

說到大使，駐英郭泰祺、駐法顧維鈞、駐德程天放，对我此行的活动都是不知道的。在苏联則不全相同。

蔣廷黻原是清华大学教授，专门研究外交史。他和我同时往南京加入行政院，我做秘书长，他做政务处长。我所注意的是对付和抵抗日本侵略的问题，蔣廷黻却着重对苏对共的关系。他对蔣介石說：“你同时反苏反共是不对的。苏联是一个很大的新兴力量，你必须取得苏联的友谊谅解，使苏联对你放心，然后你才真能反共。”所以他的結論是：“反共必須联苏。”蔣介石接受这个主张，就叫他做駐苏大使。实际上他并没有达成这个使命。

經蔣大使的介紹，我见到了苏联外交部长（那时称为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維諾夫，他用英国話和我相談。李維諾夫的态度是痛快的，他不繞圈子，明白地說，蔣政权与苏联的关系本来是很坏的，現在从头做起，建立交情，应当速即訂立互不侵犯条約；苏联根本不会侵略別国，訂立此約就是表明中国可得苏联帮助的意思。他說，中国应了解苏联和納粹德国是不能合在一起的，所以中国軍隊不能交給德国軍官指揮，实行帮助的方法应先訂立中苏交換貨物的合同，如此，苏联就可帮助一部分設備。

从这次談話中，我明白看到苏联果真具有助我抗日的好意，互不侵犯条約和交換貨物合同，簡單明了，都是极可欢迎的办

法。我自覺這次总算不虛此行，電蔣建議完全接受，並詢問我應否留蘇面洽換貨合同的内容。蔣的復電是，互不侵犯條約已令外交部與蘇聯大使洽訂，換貨合同可以暫為緩議。蔣對這合同為什麼如此決定，我真完全不能了解。沒有換貨辦法，怎麼能取得蘇聯軍械呢？如此消極做法，自然要耽誤了一些時間。後來，在已經對日開戰以後，蔣續派孫科往蘇聯，才訂立了這個合同，為履行這個合同而應送交蘇聯的鎢、錒、錫、汞等礦產品，都由我（時任經濟部長，兼管資源委員會）依約如量交付清楚。由孔祥熙主管的農產品却拖欠很多。

如上所說，蔣的復電既然如此，我覺得我的任務已了，就利用這個機會，商得蘇聯重工業人民委員會同意，往烏克蘭各地參觀好些嶄新偉大的工廠，以領略蘇聯新建設的氣象。正在參觀期間，接到消息，得知我國對日戰爭已經開始，形勢緊張，我即停止參觀，回到倫敦，乘坐荷蘭國遠東飛機飛行回來。

回到南京，見蔣介石，他叫我改任經濟部長，籌劃抗日期間內地生產的工作。

蔣介石在抗战期間的一件投降陰謀活動

施 乐 渠

在一九三八年日軍侵入华中、進窺武汉时期，約距武汉淪陷前两个多月，何应欽的顧問雷嗣尙帶着蔣介石、何应欽的密諭，由武汉到香港找蕭振瀛，使蕭进行向日求和的活動（雷、蕭是結拜弟兄，蕭时避居香港）。蕭自离开华北，即与日方断絕联系；惟有一个日本軍人和知（特务），曾在华北与蕭相識，此时寓居澳門，他的華人翻譯何以之系蕭同乡，因此，蕭到香港后，与和知仍有往来。蕭既奉了蔣、何密諭，妄想利用这个机会再上政治舞台，当然格外卖力，在雷到港后的第二天，就偕何以之赴澳門就商和知。和知原系日本政府派遣，专从側面对华誘降，一聞蔣、何自动求和，恰合他的目的，当即表示愿意努力沟通和議。蕭既找着这条門路，先由雷嗣尙回报蔣、何。蔣、何正处日軍威胁之下，求和心切，立命蕭振瀛飞往武汉，面授机宜，并由蔣介石亲拟一个談判原則，交蕭帶回。蔣介石所拟的談判原則，蕭帶回香港后，曾將原件交我抄录。原件是用复写紙写的，約有一张半紙，上面还有蔣用紅鉛筆修改的笔跡和签字。原件全部內容已記不清楚，其主要內容，大致如下：

1. 双方軍隊同时下令停止冲突；
2. 在华日軍分期撤退，約一年为限，全部撤尽，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况；

3. 日本承認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
4. 中日合作，共同防共；
5. 滿蒙地區，全部交還中國；
6. 雙方在戰時所受一切損失，互不賠償。

蕭還曾對我談到他在武漢同蔣商擬這個談判原則的一段經過：蔣所擬原則，其中本無交還滿蒙一項。蕭因滿洲是其故鄉，要蔣添上這項。我還清楚的記得當時蕭對我說過這樣一句話：“東北是我的家鄉，不要東北，我還能干嗎？”蔣恐要求過高，日方不肯接受。蕭說：共同防共，是日本最大的希望，有此一項，日方大慾已償，區區滿蒙，必不計較。蔣始採納，並囑蕭看事做事，只要日方答應停戰，滿蒙問題如有爭執，不妨保留將來再談，不必因此耽擱全面和議。

蕭帶這個原則回港後，再與和知接洽，和知對原則內容尚不挑剔，允即轉達日方當局。過了幾天，和知告蕭，日方當局正在考慮，如果雙方意見接近，應再互派全權代表，會商決定。和知得到國內指示後，又來告蕭：前談原則，大體可商，一俟考慮成熟，即派全權代表；日本代表擬由首相近衛擔任，中國代表希望由何應欽擔任；並擬以福州為兩國代表會商地點，請何早作準備，日方通知一到，立即飛往福州，屆時近衛必在福州相待。蕭將與和知接洽情形，隨時報告蔣、何。蕭的報告除由書面航寄外，有時竟用家中電話直達武漢蔣的侍從室，口頭陳述。這種便利，皆由蔣、何特許，足見蔣等對於求和如何重視。

不料談判正在進行，武漢旋即淪陷，蔣、何逃往四川，以致聯系中斷。最後一次報告，由蕭請孔祥熙的秘書王良甫乘飛機送往重慶，飛機失事，王死機難，報告遺失，延誤多時。而日方軍人

因已侵入武汉，躊躇滿志，和議亦不認真。迁延既久，风声渐露，馮玉祥先生竟在重庆揭发蕭振瀛的在港活动。蔣介石大为难堪，就将蕭召往重庆，暗中監視，以掩物議。

蕭去重庆时，談和文件均留港寓，交我保管。約过半年，大公报总編輯張季鸞到港，住在蕭的儿女亲家孙隆吉家（蕭談和經過，孙也知道大概），說是由蔣授意，訪問和知，試探和議。張認為和知沒有誠意，并向我索閱蕭振瀛所留文件。張回重庆后，向蔣討好，說此种密件不宜留在外面，蔣乃甚怪蕭办事不密。蕭因電港，叫我将此項文件焚燬（是由我和孙隆吉二人共同焚燬的），蔣才不再究問。此后又有伪中央信托局长盛莘丞（系孔祥熙的亲信）到港訪問和知，再探和議，也无結果。張、盛两人皆由何以之陪見和知，何因蕭振瀛的关系，故曾將他們会見大概情形告我。我想蔣介石等正以抗日大义号召国人，乃在暗中覩顏求和，至再至三，喪心无耻，至此已极。我在当时系任国民党中央銀行專員，由行派港服务，蕭振瀛在搞求和活动，叫我整理文件，我也做了卖国帮手。悔罪內慚，不能自己，故将这段卖国醜史从新补述，借供参考。

晋軍概况和“鉄軍”、“同志会”的内幕

楚 溪 春

一、晋軍概况

我于一九一八年夏在保定軍官学校第五期毕业后，就分配到山西步兵十团充当見习官。这是我参加晋軍的开始。当时晋軍有四个混成旅、两个独立步兵团、三个独立营，南北两个鎮守使（南鎮守使署在平阳，北鎮守使署在大同），各轄一个混成团。全軍番号和长官姓名如下：

（1）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第二混成旅旅长馬开松；第三混成旅旅长孔繁蔚；第四混成旅旅长赵戴文（赵是个文人，实际上是閻錫山直接指揮）。

（2）两个步兵团：由閻錫山直接指揮，步九团（学兵团）团长由商震兼任，后由荣鸿臚充任；步十团团长蔡荣寿。

（3）三个独立营是：工兵营、卫生营、輜重兵营。

（4）南鎮守使（少將級）是张培梅，抗战开始后，任二战区执法总监，因战事失利，他非常恨王靖国在隰县石口子不抗战，曾想杀王，未得逞。后从太原退到大宁时，感到前途茫茫，服鴉片自杀。死后，閻錫山还亲自路过太宁去吊唁。北鎮守使是张树帜，抗战开始后，任二战区执法副监。

我听说在前清末年，清军驻山西部队当时只有一个协（即旅），管两个标（即团）。閻錫山在辛亥革命时以第二标标统的资格被推举为“山西大都督”（当时第一标统是陕西人黄国樑，平时与革命党、省参议会中人很少联系，而閻錫山是老同盟会员）。閻錫山当了山西督军后，很怕袁世凯撤换他，故对袁必恭必顺，小心谨慎。当时他还不肯暴露他的政治野心，只是保境巩固自己的地位。袁世凯死后，閻錫山才开始有对外扩张的企图。

北伐战争时，閻錫山挂了青天白日旗以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当时我在晋军北路军总指挥部前敌总指挥部当少将参谋长。北路军总指挥是商震，前敌总指挥系第七军军长张蔭梧兼任。南路军总指挥是徐永昌、杨爱源。当时晋军已经扩充了，记得当时晋军的师长有孙楚、傅作义、杨效欧、傅存怀、王靖国、李生达、赵承绶、李培基、李服膺、孟兴富、关福安等人。此外还有骑兵司令赵承绶、炮兵司令周玳、工兵司令杨澄源、机关枪团团长关颖凯等。

当时晋军的编制是：一个师辖三个步兵团，其中两个团设一旅长任前方指挥，师长直接指挥一个旅长、一个团长。

閻馮倒蒋战役时，晋军为了壮大声势，把“师”的番号改为“军”，兵力稍有增加。我当时任北平中将宪兵司令兼一二五旅旅长，一二五旅改为二十七师时，由原辖两个步兵团扩充为三个步兵团，“旅”的番号取消，实际上我这个“二十七师师长”直辖三个团。

閻馮倒蒋战役失败后，閻錫山潜逃大速，山西省军政大权归徐永昌、杨爱源等人掌握。当时晋军由奉军代管，薪饷由奉军关发。晋军在张学良领导下原封未动。

閻錫山逃大連后，感到前途无望，曾打算出国旅行。后来他又派周燾文、鍾建奇二人到江西調查蔣介石能否消灭共产党。据周燾文回来报告說：蔣介石不能消灭共产党。閻这才取消欧美之行，感觉到蔣介石既消灭不了共产党，也就无余力打晋軍，所以他又坐日本飞机回大同后，就直奔其家乡五台县河边村，并未回太原。当时他曾向蔣介石表示以后不再过問軍事、政治，蔣介石因鞭长莫及，对閻也无可奈何，也就算了。几个月后，閻錫山忽然回到太原，徐永昌、楊爱源等当然就把軍政大权原封不动地交还閻錫山。閻錫山当时成立了一个“晋綏軍軍事整理委员会”来整理軍隊。

当时晋綏軍最危险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官兵吸白面、大烟，又嫖又賭，以致軍隊腐敗，战斗力很差；第二件是軍隊一度归张学良领导后，大部分带兵官都吃空名子，甚至于一团、一营、一连的空名子都有。当时奉軍点驗官因受晋軍长官之賄，也装着不知道，所以晋軍軍官趁这时候发了些財，以致多数軍官貪污腐化。閻錫山回太原后，才下决心先从整理晋綏軍着手。閻整理軍隊后，晋綏軍吃空名子的风气才被压下去。晋綏軍軍事整理委员会又实行戒烟办法，將軍官分別調驗后，染毒的才陸續减少。整理委员会只是整理内部，并未縮減軍隊編制。

閻錫山当时还不敢公开抓山西的軍政大权，在軍事政治方面他假意認輸了，所以他一方面整理晋綏軍，一方面实行他的所謂“造产救国十年計劃”。首先，他建立了“西北实业公司”，秘密整理兵工厂，以巩固其經濟和武器装备的基础；另外又修筑同蒲路，实行兵工筑路計劃，并采用窄軌制，以防外面势力侵入山西。他当时曾編有所謂《将来希望歌》，記得歌中有这样的詞：“无山

不封林，无田不水到；无村不工厂，无乡不职校；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入校；无人不当兵，无人不公道。”

閻錫山在其羽毛未丰满前，采取的是“自顧防守”的策略。

自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到“陆大”学习深造，这一阶段据我所知，晉軍无大变化。

抗日战争开始后，閻錫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下辖两个集团軍：第六集团軍总司令是楊爱源；第七集团軍总司令是傅作义（当时第十八集团軍总司令是朱德总司令，名义上属二战区指挥）。

此外，又成立所謂“新軍”四个旅：第一旅旅长魯英馨，政治部主任薄一波；第二旅旅长艾子謙，政治部主任张文昂；第三旅旅长李廷秀，政治部主任戎子和；第四旅旅长梁浩，政治部主任雷任民。另有一个工人武装自卫队，负责人是郭挺一，实力编制等于一个旅。

閻錫山当时所以要成立新軍，是因为他感到原旧軍不能抗战，想利用一批有为的青年来领导軍隊，同时并組織“公道团”、“牺盟会”、“同志会”，用意都是防止人們背离他。新軍编制与旧軍同，一个旅辖三个团。新旧軍的区别是：新軍有政治领导，不仅是旅有政治部主任，团、营、連都有政治主任或指导员。在武器装备方面，比起旧軍来，新軍是用的山西兵工厂新造出的武器。

新軍在“牺盟会”的领导下，不同意閻錫山对日本的投降办法，最后脱离了晉軍，起义参加了革命。閻錫山还曾派王靖国、陈长捷率领所部追打新軍第二旅，一直追到晉西北。新軍第二旅与新軍第四旅汇合了，閻錫山沒达到消灭的目的。其他新軍两个旅就近在晉东南与第十八集团軍总司令部取得了联系。

抗日戰爭中，忻口戰役失敗後，閻錫山決定退出太原，而却令第七集團軍傅作義部固守太原。傅作義部經幾天血戰後，經汾河退往晉西北回綏遠。從此，傅作義部隊漸漸脫離了閻錫山而直接歸國民黨政府指揮了，但原第七集團軍的番號仍留在二戰區未動。到了這個時候（一九三九年），閻錫山實際兵力就剩下了一個第六集團軍的兵力了。

後來閻錫山為了維持面子，又請求國民黨政府軍委會增加了兩個集團軍的番號，即除原第六、第七集團軍之外，新增加了第八、第十三集團軍，合起來就有四個集團軍的番號了。這四個集團軍是：第六集團軍總司令楊愛源（後改為陳長捷，楊升副長官）；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孫楚；第十三集團軍總司令王靖國。

四個集團軍一共轄八個軍，每一集團軍轄兩個軍，每軍轄二、三個師，每一師轄三個團。

同時，二戰區又設立了南、北區軍總司令部。北區軍總司令部設在孝義，司令是楚溪春；南區軍總司令部設在吉縣，司令是彭毓斌。抗戰勝利後，南區軍到晉東南與八路軍作戰，全軍覆沒，彭被擊斃，一些高級軍官被俘，南區軍總司令部撤銷。

閻錫山的四個集團軍是兵團性質的部隊，集團軍總司令全駐在二戰區長官部，其兵團部隊以軍為單位，機動地換防、調動，分別屬南、北區軍總司令部指揮。南區軍總司令部撤銷後，晉南各地由晉軍以“軍”為單位駐防指揮作戰。

抗日戰爭勝利後，閻錫山除有原四個集團軍兵力外，又收編了投降的日本兵近萬人，分三個縱隊，統歸趙承綬接頭辦理，詳情不知。

一九四七年部队整編，將“軍”編為“師”，“師”縮為“團”，以致軍官失業的很多。閻錫山為了收容這批軍官，又成立了軍官教導團，當時軍官的情緒很憤怒。

以後，我和閻錫山意見不和，脫離了晉軍。

晉軍的軍官幹部，除一部分高級將領是陸大、日本士官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生（主要是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生）外，大部分是閻錫山自己設立的“學兵團”、“北方軍校”、“教導團”、“青年軍官教導團”等學校培養出來的，絕大部分都是山西人。

二、“鐵軍”的內幕

閻錫山為了加強對晉軍官兵的控制，保持他個人的獨裁統治，曾在抗日戰爭中期組織了一個“鐵軍”組織。

當時國民政府所給晉軍薪餉，多被閻錫山挪用開銷，以致晉軍的服裝、伙食非常困苦。當時官兵苦到吃山藥蛋粉的程度（吃這種東西不經餓），軍衣破破爛爛，尤其冬季制服都是舊棉花，不能禦寒，因之軍心低沉，戰鬥力差。因此，閻錫山就玩了一手陰謀，組織了這個“鐵軍”組織，來加強控制。

我當時在孝義兌九峪指揮北區軍對日抗戰。有一天，一個名叫高冰的，奉閻錫山差派到兌九峪來，晚間向軍事高級官員講話時，提到我，稱呼我為“楚鐵委”。我很奇怪，會後問他，他才告訴我，原來閻錫山組織了一個鐵軍組織，並內定我是“鐵軍委員”。我對這個組織的經過和內幕，當時一點也不清楚。

幾個月後，我回到二戰區長官部（在山西吉縣），閻錫山就命我宣誓入鐵軍組織，並由王靖國事先擬好誓詞，交我背誦。

第二天早上三點鐘雞叫的時候，我被王靖國（集團軍總司

令)、楊愛源(副長官)請到一個布置得很莊嚴的小密洞里去。一進門，看到正面挂着閻錫山的象片，桌上擺着閻錫山親筆寫在一幅紅緞子上的鐵軍誓詞，桌上兩旁點着一對大紅蠟燭，氣氛很令人恐怖。我再一看，閻錫山就坐在桌子左前方，態度很嚴峻；楊愛源和王靖國站立閻錫山的兩旁。

他們事前已告知我，一進門就要先給會長行鞠躬禮，然後正面跪在桌子前面。我就照這樣做了。當時宣誓的只有我一個人。

我雙腿跪在地上，舉起右手背誦了一遍我事先已背熟了的誓詞(現在已記不清了)。隨後，閻錫山親口將桌子上那張他親筆寫在紅緞子上的幾句守約念給我聽，我現在還記得是這樣幾句：“鐵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同子女財產，共生死利害”，另外尚有紀律八條，詳細的我已記不清楚了。宣誓完畢後，王靖國親手交给了我一根鋼針，叫我把左手中指刺破，將中指血印印在自己的誓詞上，然後起立又向閻錫山行九十度的三鞠躬禮。閻錫山這時站起來和我握了握手，說：“靖波，你很好，努力吧！”於是我就同楊、王二人退出密洞。

這就是我入鐵軍組織宣誓的情況。

就我後來所知道的，這個鐵軍組織的最高領導人(會長)是閻錫山，實際負責人是王靖國。“鐵委”是高級領導幹部。我記得“鐵委”有楊愛源(爾後升為副會長)、王靖國、趙承綬、孫楚、楊澄源、郭宗汾、彭毓斌、楚溪春等。“鐵委”下又設“二十八宿”(就是二十八个地位次於“鐵委”的高級軍事幹部，多是軍、師長一級的負責人，也有地位較低的)，這“二十八宿”是做實際工作的，由王靖國統一管轄。“二十八宿”的軍官姓名，我記不清楚了。

我入鉄軍組織以後，奉閻錫山命令回到孝义兌九峪北區軍總部後，就開始着手發展鉄軍組織。我當時就命令當地“組、政、軍、教、經統一工作委員會”中負責組織工作的人同負責軍事工作的人共同商量如何發展組織，在軍隊發展那一類的軍官。實際工作就歸這兩個負責人來管。我呢，就只是在他們宣誓的時候到場，裝着象我在宣誓時閻錫山對我的那付架子。入鉄軍組織，是事先編好十個一組，分別陸續入堂宣誓。他們一進來就先給我鞠躬，然後就跪在閻錫山象片前，桌上也是擺上閻錫山親筆寫的紅緞子的誓詞，點上一對大紅蠟燭。我呢，也是照樣坐在桌子的左前方，兩邊站的是“組”、“軍”兩個負責人。他們和我過去入組織時的儀式一樣，跪着舉右手宣誓，然後我把紅緞子上的誓詞宣讀一遍，他們也刺血印手印。禮成，我也如法泡制地同他們握手說：“你們很好，努力吧！”

舉行宣誓儀式都是在下午。當時入組織的很多，大部分的中、下級軍官都入了“鉄軍”組織。

由以上看來，閻錫山是為了挽救他的動搖的統治，才想出這個辦法來欺騙、籠絡他的部下，企圖用原始的歃血為盟的辦法把人籠絡在一起為他賣命。實際上，反動的統治不管用什麼手法，最後都是不能挽救他垂死的命運的。

此外，閻錫山還用“服務士”來監視軍、師長，就是：他訓練了一批十三、四歲的兒童做服務士，分配給軍、師長每人兩名（總司令以上官員不派服務士）。這兩個服務士每天服侍軍（師）長，掃地、倒茶，什麼都干，你會客談話都不能回避他們，他們並有隨時出入你寢室的自由。每天晚上，這兩個小服務士要把這個軍（師）長的一天行動、言論統統寫在報告上，直接寄給閻錫

山。各軍（師）長明知這是監視他，打小報告，但絕不敢干涉，因為事先講明：如有干涉，是要受處分的。小服務士寫什麼，這個軍（師）長也不敢看，更不敢干涉，只能心里暗地害怕，無法阻攔。其實，這種辦法只能使大家人心惶惶，增加對閻錫山的不滿，起不了什麼大作用。

三、“同志會”的內幕

抗日戰爭前，山西已有“公道團”的組織。抗日戰爭開始後，閻錫山在太原又成立有“牺盟會”的組織，當時參加的多是山西政界的文人，軍人參加的很少。以後撤退到臨汾溫泉村的時候（一九三八年春），閻錫山與薄一波、梁化之等人商量組織“同志會”。當時我任二戰區參謀處長，“同志會”發起人共有“高干”十三人，我是其中之一。這十三人是：朱綬光（二戰區參謀長）、賈景德（二戰區秘書長）、續范亭（二戰區高參兼西北區動員委員會主任）、王懷明（二戰區軍法處長）、王謙（省府秘書長）、邱仰濬（省府民政廳長）、杜春沂（衛隊旅旅長）、梁化之（二戰區政治部主任）、李冠洋（省府委員，給閻錫山辦組織工作的人）、薄毓相（“公道團”負責人）、陳長捷（軍長，當時在長官部駐防地）、彭毓斌（師長，當時在長官部駐防地）、楚溪春（二戰區參謀處長）。

這個組織是軍、政、民統一領導的組織，會長是閻錫山。從那時起，山西軍政人員對閻錫山不稱“司令長官”和“總司令”，一律稱“會長”，淵源在此。

我雖是發起人之一，但詳情我却不十分清楚。當時“同志會”負實際責任的是梁化之等人。後來軍政人員如趙戴文充任

“同志会”的副会长，楊爱源、孙楚、王靖国、赵承綬、薄一波、戎子和、雷任民、韓鈞等也都充当“同志会”的“高干”了。

“同志会”的目的表面上是由民族革命达到民族复兴；实际上是把山西的軍政人員籠絡在一起，为閻錫山效忠卖命。我記得还有这样的誓言：“終身不准脱离組織和背叛組織，如有背叛組織、脱离組織的一律自裁”；“如有人暗地对会长不滿或侮辱会长的一律自裁”；“犯烟、賭、脏、欺之一者，一律自裁。”（按烟就是吸大烟；賭就是拿賭具賭錢的，甚至拿賭具玩耍的也要自裁；脏是貪污，閻錫山对这条訂的特別严，就是貪污一块錢的也要自裁；欺是指欺騙长官和部下而言，尤其是欺騙会长的，一律自裁。）

“同志会”的組織系統是：“会长”——“副会长”——“高干”——“基干”——“同志会先鋒队”（同先）和“会員”。“高干”可以介紹多少人为“基干”，“基干”可以介紹若干人为“会員”。

“高干”介紹的“基干”的人数越多，在会里的势力也就越大，如梁化之、王靖国、赵承綬等都是介紹“基干”几十人入会的“高干”，所以他們在会里的势力很大。我只介紹过一人入“同志会”为“基干”，就是今天山西人民委员会民政厅厅长楊自秀。

当时“同志会”每年选举一次“高干”，按票数多少来决定“高干”的去留。按我在会里的势力，我只有一名“基干”，本应落选，但因为担任“北区軍总司令”的职务，所以每次选举时，閻錫山总要授意梁化之等人非要把我选出当“高干”不可，因为那时只有“高干”才能有資格当山西的軍政大員。晉軍軍隊

里的軍、师长大部分是“基干”，这些人后来又被提升为“高干”和“候补高干”的也不少。

我虽然是“高干”，但始終不知道入会的仪式是怎么回事。

我只知道有两件事，足以說明閻錫山是怎样利用“同志会”来起恐怖作用，残害部下，叫人終身唯唯諾諾，不敢脱离他，不敢犯他的“戒条”。

第一件事是，晉軍师长刘墉之的自裁。这个人是河北省人，由山西学兵团毕业后又在陆军毕业，从当排长起一直跟随閻錫山，可以算是亲信。有一次他在防地上說过这样的话：“中央領到的款，完全被会长扣了，他还口口声声說怕我們贪污”，“什么‘同志会’呀！簡直是以‘同志会’为綑仙繩，將我們綑住，終身为他卖命，不准脱离他。”这几句話由他的參謀长姜煥章和当地的“組政軍教經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这个职务权力很大）孟际丰告密給閻錫山。閻錫山就馬上用电报将刘墉之調回二战区长官部問明事实。刘完全承認，并哀求閻錫山：“今后背后決不再說侮辱会长的話。”而閻錫山却授意王靖国等几个“高干”开会（当时我在中条山作战，未参加会），決定令刘自裁。決定后就由于振河、孙福麟两个軍长給刘拿去一大玻璃杯鴉片烟漿水。刘墉之見势已至此，只好举杯几口喝下，左右手拉住于、孙两人的手痛哭說：“家中有七十多岁的老母及家室，請你們关照。”但是，他喝下大烟后許久总是烧不死，他們就用綿紙盖其面，噴以冷水，不久其气息即断。当时軍政人員知此事后大部分不滿，但沒有敢說話的。

第二件事是，有一夜张子佩、郝梦九、曹大觀、李生瀛四人在李冠洋家里拿牌九抓大头玩，講明誰輸了誰請吃餃子。这件事

不知怎的被南村宪兵司令樊明渊的宪兵告发，閻錫山立即派人搜捕。张子佩馬上蒙上被子装着睡觉。郝梦九是“同志会”会员，但不是“基干”，后来又有徐永昌来电保释，所以只受到驱逐出境的处分，跑到西安去了。李生瀛不是“同志会”会员，没有事。只有曹大观是“同志会基干”，所以就被决定自裁了。

从这两件事来看，这完全是閻錫山牺牲一些倒楣的人来增加他自己的个人威信，至于真正的有势力的“高干”如王靖国等人，他们公开和部下眷属姘居和种种贪污行为，也从来无人敢告发，閻錫山也装着不知道。

抗战胜利后，“同志会”的做法就更加残忍了。当时有一个团长叫赵俊义的，原来驻在山西寿阳、盂县一带。他把与解放区对峙的地区划成真空地带，实行他的所谓“三自政策”（自清、自卫、自治），也就是山西当时所谓的“赵俊义奋斗法”，对凡有共产党嫌疑的人，一律用乱棍打死。听说平遥一县，就打死了几百人。实行“赵俊义奋斗法”以后，据说被乱棍打死的人总共约有五千人以上。

当时实行这个办法是在晋中和晋东南一带，而我在晋北，虽未亲眼看到，但闻知后也甚感愤恨。

关于改組派的一鱗半爪

罗方中

改組派是“中国国民党改組同志会”的简称。它于一九二八年上半年成立，在上海設置总部，执行中央职权，并依次在各省市設置分部，领导地方組織。一九三〇年閏，馮反蔣战争失敗，北平扩大会議垮台以后，改組派的上海总部基本上解体，各省市組織也停止活动，剩下来的只是分散在各地无組織的改組派分子。它的发生、成长、消灭，可以說是反映了当时反动統治內部矛盾的一个具体过程，現在扼要申述于下。

一九二七年春天，国民革命軍攻克南京，蔣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屠杀大批共产党員和革命分子，組織南京国民政府，宁汉因以分裂。同年七月，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同共产党决裂，繼續背叛革命，形成所謂宁汉合作。自宁汉合作以后，汪精卫以及顧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朱霽青、潘云超、郭春涛等，不見容于当时的南京反动統治集团，他們跑到广州进行护党运动。广东軍閥张发奎等同蔣介石爭夺广东失敗，所謂护党运动也随之流产。汪精卫出国，顧孟余、陈公博、王法勤、王乐平、朱霽青、潘云超、郭春涛等所謂粵方委員集中上海，进行反蔣活动。他們分析当时民主革命的失敗的原因，認為固然是由于蔣介石的反动、独裁，完全拋棄了改組以后的国民

党政綱，同时也認為共产党的农工运动过于激进，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运动，不同于无產階級的革命任务，应由城市小市民領導。他們一致主張推翻蔣介石的反动統治，重新改組中国国民党，以小市民为党的階級基础，恢复一九二四年改組精神，彻底实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对內、对外政綱。因此，他們組織了中国国民党改組同志会。

中国国民党改組同志会的組織系統，从中央到地方分为三級，中央設总部，省、市設分部，分部下設小組，都是絕對秘密的組織。总部委員會由当时所謂国民党第一屆中央執監委員會粵方委員組成，內設組織、宣传两个机构。組織工作由王乐平負責，王乐平被南京反动統治暗杀以后，由朱霽青負責；宣传工作由陈公博負責，陈公博离沪以后，由顧孟余負責，顧孟余离沪，由潘云超負責。

众所周知，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領導工农群众繼續坚持革命斗争，大資產階級則跟随蔣介石背叛革命，民族資產階級又跟着大資產階級而投降变节。但是，有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慑于南京反动統治的白色恐怖，既沒有勇气跟着共产党繼續革命，也反对蔣介石背叛革命、残杀革命青年、完全撕毀国民党政綱而肆行独裁；他們不肯死心塌地投靠反动統治。汪精卫集团的第三条道路的号召，就很自然地迎合他們的心理，适合他們的要求。因此，自一九二八年中国国民党改組同志会組織成立，取得了散处在全国各地、离开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贊同；紧接着設置各省市分部，就有不少人參加。如以江苏、上海、南京三个地区为例：南京反动党部派的江苏省党务整理委員會委員滕固、上海市党务整理委員會委員刘衡靜，同时分

任江苏、上海改組派分部的書記。江苏省党务整理委员会組織部秘書卢印泉、民运会总干事許聞天，都是江苏省改組派分部的委員。江苏、上海两地改組派分部成立不到一年，就有好几百人参加。南京是反动統治中央政府所在地，有文特务，有武特务，防范非常严密。但是南京的改組派組織同其他地区的改組派組織一样地发展，人数最多的时候有五百多人，将近七十個小組。其中蔣介石的中央軍事学校有十几个小組，将近七十人；中央政治学校有好几个小組，将近四十人。南京市改組派分部書記，起先是赵惠謨，后来是我。我被捕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民运会的两个处长沈苑明、何汉文負責。分部委員有南京市党部秘書林凡野、中央軍事学校队长罗子实、中央大学学生吳健、蔡焯。其他各省市改組同志会分部負責人，据我所知，大致有这些人：北平市有谷正鼎、蕭忠貞、蕭訓等，河北省有朱化魯，河南省有张居平，山东省有范予遂、王立哉等，山西省有赵光庭、武和軒、郭任之、刘定安等，湖南省有伍仲衡、宾鶴翔等，湖北省有罗頁华、张子明等，两广有陈孚木、黄佩兰等，江西省有刘文涛，浙江省有王柏春、曹天凤等，安徽省有朱子帆、黄梦飞等，四川省有呂寒潭、閔劍梅等。

改組派的地方組織，除了发展組織工作外，做的反蔣活动不多。就我回忆，当时各地的具体反蔣运动值得在这里提一下的有这么两次：一次是南京市反对国民党三全大会指派代表的运动；一次是江苏溧阳暴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江苏省溧阳县发生一次暴动，是由江苏省改組派負責人卢印泉、許聞天、駱繼綱、陶国华领导的。这次暴动的具体經過，我記不清楚了。許聞天現在北京，他一定有比較詳細的报导。至南京反对三全大会运动，是在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召开代表大会之日发生的，简称“三·一四”运动。这次运动是南京改组派分部领导起来的，目标是反对蒋介石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派代表。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召开代表大会，吴健是中央大学区党部代表，谷正綱是中央政治学校训育处副处长，被选为该校区党部代表，改组派南京分部负责人策动吴健推谷正綱做大会主席，提出反对三中全会指派代表问题，并策动南京中央党部的李实散发反对蒋介石独裁的传单，一时掀起了反蒋高潮，致使南京的反动政府布置大批军警，施行极其残酷的镇压，勒令解散代表大会。不少的人受了军警的铁蹄践踏，谷正綱受重伤，如果当时不是他的刽子手哥哥谷正伦做南京宪兵司令，谷正綱的性命也难保。

汪精卫集团领导改组派反蒋，并没有具体反蒋计划，仅仅做过几次军事投机和政治投机。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汪精卫集团策动张发奎参加广西军阀和蒋介石争夺华中的战争，结果是张发奎的军队随着广西军阀的失败而分化。一九三〇年四月，閻、馮联合发动反蒋战争，双方动员了几十万兵力，算是反动统治集团内部最大的一次战争。这次战争打了七八个月，在津浦线上徐州附近就相持将近三个月，致使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震惊危惧。汪精卫集团利用閻、馮同蒋的矛盾，利用了閻、馮的势力，于一九三〇年十月组织了北平扩大会议，各地改组派分子麇集北平。可是不到三个月的光景，扩大会议即随着张学良率兵入关、閻馮反蒋战争的失败而瓦解，参加扩大会议的分子作鸟兽散。汪精卫出国，改组派的上海总部难以为继，全国各地改组派的组织也停止了活动。由于南京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矛盾尖锐，蒋介石于一九

三一年春天扣押了胡汉民，广东軍閥陈济棠联合桂系軍閥李宗仁，借机树起了反蔣大旗；汪精卫乘机回到了广州，联合陈济棠、李宗仁、张发奎、孙科等召开国民党中央非常會議，組織国民政府，爆发了宁粤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出兵东北，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人很快占领了东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潮。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反对下，被迫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野。汪精卫回到广州后，各省、市改組派代表将近百人参加了国民党非常會議。后来汪精卫和蒋介石勾結起来，相約一同重新上台；汪精卫领导的改組派分子也退出了非常會議，随汪精卫到南京去做官。

据说蒋介石同汪精卫合作的条件，大致有这么几点：（一）貫徹蒋介石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张，同日本妥協，繼續“剿共”。（二）汪精卫主持政治，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协助蒋介石压迫爱国民主运动和执行对日妥協政策；蒋介石专管軍事，破坏上海抗战，重新发动对共产党占领区的大規模围攻。（三）在党务方面，汪精卫集团退出广东国民党非常會議，原为第一屆中央执监委員如汪精卫、顧孟余、王法勤、陈公博、甘乃光、朱霽青、陈树人、陈璧君、潘云超、郭春涛等，由南京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仍选举他們为中央执监委員，另外从改組派的代表中选出十人，由南京国民党代表大会选举他們为候补中央委員。因此，汪精卫集团退出非常會議以后，即在上海召开了改組派代表大会，选出唐生智、王懋功、唐有壬、曾仲鳴、黄少谷、谷正綱、邓飞黄、萧忠貞、范予遂、陈孚木等为南京国民党第四屆中央候补委員候选人。

一九三二年一月，蔣汪合作，重新上台，汪精卫集团除汪精

卫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外，顧孟余任铁道部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长，陈树人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自此以下的改組派活动分子，大多数得到一官半职，汪精卫集团领导的改組派算争得了反动統治政权中的一杯残羹，而早已崩溃了的改組派組織，到这时候連过去改組派的人的关系都起了剧烈的变化。这就是改組派改組中国国民党、恢复一九二四年改組精神的最后結果。

总结起来講，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道路是跟着共产党繼續坚持革命斗争，另一条是投靠蔣介石的反动統治，走上反革命或不革命的道路，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汪精卫集团从一九二七年和共产党决裂而背叛革命，本来是希望投奔反动陣营去同蔣介石合作，只是因为不見容于当时的反动統治集团，所以他們戴上假革命面具，蒙蔽了当时迷失革命方向的小資产階級，誘惑了当时离开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企图开辟第三条道路。正因为这样，所以在一九二八年中国国民党改組同志会成立后，就吸引了不少的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参加。也正因为这样，汪精卫集团领导改組派做的几次軍事投机和政治投机都失敗了，最后还是走上投降蔣介石反动統治的老路，于一九三二年与蔣介石合作，重新上台。中国国民党改組同志会从一九二八年上半年成立后，到一九三〇年十月参加北平扩大會議失敗时，全国各地組織已經瓦解，只剩下改組派一群人的关系。迄到汪精卫集团领导改組派这一群人投靠南京反动統治，他們彼此为了权利地位而明爭暗斗，連原来改組派的人的关系都消失干淨。同时，这一群人也就起了剧烈的分化，反动透頂的如谷正綱、谷正鼎之流則死心蹋地地投靠蔣介石，終于加入CC团，做了反动統治的中心分子；而一部分进步分子如陶国华、郭任

之、刘定安、朱程、王柏春等人则投奔革命阵营，跟着共产党继续革命。此外大部分改组派分子则丧失了他们的灵魂，醉生梦死地在反动统治底下鬼混。凡是过去参加过改组派运动而终于踏进了新社会的人，都备尝这一段痛苦经历的滋味，都应该深刻地体会并且很明确地认识这条真理：“没有共产党领导，任何革命都不会成功。”

补充·订正·质疑

对《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 投降阴谋活动》一文的意见

阎 宝 航

我亲自听到萧振瀛讲过，蒋介石“面授机宜”的投降条件是：只要日本退出华中、华南，华北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况。不言而喻，东北不要了。萧并说：“合作反共是日蒋双方一致的要求和条件。”蒋介石被迫抗战、动摇；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企图，始终如一。断送东北以满足日寇从而保存四大家族的华中、华南统治中心的卖国政策，亦从未改变。然而日寇尚不以为满足。在日寇占领了华中、华南，直接威胁蒋家朝廷统治中心，形势危急时，求和情急心切的蒋介石又怎能提出如作者编造的投降求和条件？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見聞紀实

——辨李著陶著各書之誤

梁 漱 溟

一、緒 言

这里所說的民国初年，指一九一一到一九一七年的一段期間。我是一八九三年生于北京的，民国初年不过二十岁内外。但我已經有机会亲自見到那时政治上一些事实了。首先这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运动，于清帝退位后随革命同志們創辦報紙，曾任外勤記者。再則，我又与当时政治上人物之一的张耀曾先生（鎔西）关系甚密，曾一度担任他的秘書。

清帝宣布退位之后，同志們放下了手枪炸弹，在天津同时有两家报纸出版，是属于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其一名《民意报》，主其事者为赵鉄桥（四川人），又其一名《民国报》，社长为甄亮甫（元熙），总編輯为孙潛明（炳文）。我为《民国报》編輯之一，并从事外勤采訪工作。此报不久迁到北京出版，末后由国民党本部派湯漪接收改組，我就离开了。

张公是我先母的堂弟，所以我称他为鎔舅。然而他的外祖母却又是我先父的亲姑母，所以他又称我先父为表舅（在亲戚关系上是重叠而交錯的），并自幼师事先父。一九一六年倒袁后，他

出任南北統一內閣的司法總長，引我為秘書。其時同任秘書者有沈衡老（鈞儒）及席、楊二位。

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我從當時的臨時參議院取得一種證件可以隨時出入於旁聽席，并向秘書廳作採訪。又如國務院等機關和各黨的黨本部亦是常去走動的。而不時晤及張公，亦能知道一些事情。雖云事隔四五十年，有些亦還記憶差不多。近來見到陶菊隱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關於這一期間政情敘述頗有錯誤和疏漏不明之處。復檢看較早些年出版的李劍農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其錯誤疏漏之點如出一轍，乃知陶誤蓋因襲於李誤。偶與鄭天挺教授（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亦曾一度為張公任秘書）談及此情，據他說不只李、陶兩書有此誤，還有其他書亦如是。我因寫此文，藉供史家採擇。

二、臨時參議院的黨派情況

本文旨在說明民國初年政治上黨派情況。黨派分立之勢，大抵因議會制度而形成的，本文即從臨時參議院之時談起。

當一九一一年革命後，國內政治上十分活躍，大小黨團紛見雜出，离合無定，誰也難言之無誤。而且在今日詳切言之亦無何意義。但今之修史者於其當時情勢變化之大端，却非胸中了了，論列明白不可。可惜李著、陶著兩書之所短正在此。

本來清季在中央已經有了資政院，在各省又有了諮議局，政黨便已見萌芽。然而這總不外乎走君主立憲一路的。而當時主張革命、要推翻清廷的，便是與之對立的另一路。一九一一年革命之獲得短期收功，並非一方面之力，此固人所共知。同時更須知道，孫、黃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同盟會雖于此居主要地位，而其本

身却又是走革命一路的几多团体合組起来的。革命一旦成功，其本身又起分化。所以从全国來說，只見其分合变化，很少見有单一組織慢慢发展扩大的情形。党派的名稱說之不尽，分合变化說之不尽，我們只能从大形势上以左翼、右翼和中間来分它。同盟会当然算左翼，旧立宪派为右翼，恒居于左右之間者为中間派。革命之初，同盟会当然得势，临时參議院中党派单位約不下于五个，或者还多，而同盟会終究为第一大党。

临时參議院要分前后两阶段：前一段在南京开会，后一段在北京开会。然前后两段并不仅仅是开会地点不同，重要在于其內容組成上有些不同。前一段大致是全国各省区各有代表三人，多为各該省都督或議會（旧諮議局改）所推选派来。等到后一段則改为每一省五个人（蒙藏各区似稍異），并且規定要由議會选出。其人选有連任，有更換，并有大增加，所以其議長就要从新选举。

南京临时參議院的議長林森，为同盟会的人；副議長似为陈陶遺，是否同盟会人，我不清楚了。通例在議會中某一政党的許多議員們必有它的一个領袖，称为院內总干事，在同盟会当时却非由林森担任，而是张耀曾。张在当时同盟会內部組織上是評議部（对执行部而言）的議長。他明明是同盟會議員的中坚人物，然而李著、陶著却把他列入了統一共和党之中。这一錯誤非小。因为这以后的事情都将无法說明。——所謂以后之事包含着同盟会之改組成国民党这样的大事。

据我記憶所及，临时參議院迁到北京初期，議長还是林森。譬如袁世凱作为临时大總統来向临时參議院宣誓就职的那一幕，我是在場的。当时便是在林森主持下举行此典礼。其后在何时改选議長，我不能明确言其月日，但記得似乎相隔不甚久。譬如李

著說統一共和黨當時占有二十五議席，同盟會、共和黨各四十余席，而我記得在議長選票上，統一共和黨只掌握十幾張票。左右兩方各三十幾票。其數字均少於李之所說。可能是李說的數字為其後新組成份子陸續全部到齊之數，而議長之改選較早。

所謂統一共和黨者，就是那時的中間派。因為其中有些個人如谷鍾秀等是同盟會分化出去的，就算它中間偏左吧。右翼一面似有兩三個單位（非如李說只是一共和黨），較大的是共和黨，而較重要的却是共和建設討論會。因為它有梁啟超這樣重要人物為后台，有湯化龍、林長民作頭目。它是民主黨的前身，而民主黨又是後來進步黨的中心骨幹。右翼綜合起來雖有三十幾票，却止於三十多一點，而同盟會則接近四十票。在議長改選前夕，同盟會自恃為第一大黨，並有素常靠近的統一共和黨，沒有急于作布置，被右翼搶先了一步。右翼主動地早去找統一共和黨商量合作，願以正議長讓給這個小黨，而他們甘居副席。這樣，當然一拍即合。及至同盟會向統一共和黨來商洽時，那方面的協議已成立了。選舉揭曉，果然正議長是統一共和黨的吳景濂，副議長是湯化龍。並且其較次的兩個席位：院秘書長（此席由議長決定，不用選舉）和全院委員長（由議員公選）亦分別為林長民、谷鍾秀所得，全無同盟會的份。只是為不使第一大黨的同盟會太難堪，总算把法制委員長一席選了張耀曾。

其實張耀曾正是同盟會內定的議長人選，因為林森不想干下去——既不干議長，亦不干議員。至於吳景濂是何許人，這裡亦須說明一句。若論品德、才氣、學識，他無一長可取。十一年之後（一九二三年）他正是在國會中為曹錕包辦賄選總統的人，卑劣無恥到了極端，此時則惡跡未著而已。他是奉天（遼寧）人，

而在統一共和党的十几票中（譬如說十七票），他們东三省同乡却占十票以上（譬如說十一二票）。他身体高大，其头尤大（所以俗呼吴大头），年齿亦較长，在十多个东三省議員中便成了領袖。其取得議长的由来不过如此。

三、正式国会开会前后的党派情况

临时參議院的重要任务，除了产生临时政府之外，就是制定国会組織法和国会議員选举法。即在制定这两部法律之时，各党派为了应付将要到来的大选，都在忙于党务。質言之，就是尽可能并合来以利于竞选。于是后来在国会中就出現了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党对峙的局面。本文这一段将主要說一說同盟会之改組成国民党。

同盟会原是一个要推翻旧統治而建設新国家的革命党，而不是一般宪政国家的所謂政党。这番改組，若只从其并合四小党^①以扩大党势来看便錯了。要深刻地来認識它的性質改变了。同盟会本有革命方略之規定，把建設新国家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时期，即是：軍法之治或云軍政时期，約法之治或云訓政时期，宪法之治或云宪政时期。它是要自掌政权到几年，又几年之后，才轉化为普通政党的；现在旧統治初初推翻，如何談到此？然而在当时国内大势，却非放棄这个革命方略不可。首先就为推翻旧統治并非同盟会一方面之力，势不能强各方面听命于一方。而且对于这个革命方略，就在同盟会内部，也很少有人認真看待它。

同盟会里面的人的思想是多种多样的。孙先生虽自有一套学

^①这四个小党是統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共和共进会。

說和具体主張，却全然不能以此統一其黨人的思想意志。大約不同於他的，至少可分為兩大流派：一派是無政府主義者，例如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張繼等許多人物都是，乃至汪精衛亦接近于此。他們於革命後，薄政治而不為，宣言不做官、不做議員，相率出洋而去。又一派則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思想，換言之，就是傾慕歐美近代政治，特別是英國式的議會政治（政黨內閣），宋教仁即其代表。其實這是當時人的一般思想傾向，大約留學生們莫不如此，同盟會所有的議員們莫不如此。同盟會之改組為普通政黨，固迫於黨外大勢而要以此為其內部基礎。

然而改組運動大非順而且易，險些兒不得成功。

以我個人記憶所及，此次改組，內部爭執甚大。蓋非止放棄了革命方略，還放棄了革命的宗旨目標。同盟會會章的宗旨一條，原為“本會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而國民黨黨章則改為“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了。只不過另外在政綱五條之中，列有“注重民生政策”一條。這明明是以社會政策代替社會主義，以改良代替革命。再則，同盟會原有女同志，而新黨章却不收女黨員。這一變動亦非小，都要算最引起爭執風潮的問題所在。不止孫先生很難同意這種改變，許多老同志很難同意這種改變，凡富有革命性的人俱都激烈反對。然而在改組派却認為既要應付當前大選，爭取作憲政國家大黨而改組，非這樣改就不能廣結同志（吸收四個小黨首先是統一共和黨），就不能多得選民，就只有自陷於孤立，讓敵黨坐大，所以又是堅持斷斷乎不讓步。經孫、黃考慮，勉勉強強定議之後，猶有人蓄意搗亂，破壞其事。改組成立大會分在上海、北京兩地同時（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舉行。據聞上海的會就以當場爭吵一鬩而散。

北京开会那天我在場目睹其事。地点是在虎坊桥湖广会馆的大劇場，其最高容納量亦只有一千多人，非常拥挤。当宣讀党章要通过之时，有女同志唐群英、沈佩真等起而質問辱罵，并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寻毆。台下亦有多人鼓噪。虽有不少維持大局的人尽力劝阻，其势仍岌岌可危。幸得孙、黄二公临場講話，以靖秩序。黄先到先講，孙后到后講。孙講話將完，左右（张繼等）頻請續講，不要他停，以致拖长数小时之久。便趁此时散票选举。比將票收齐，已是日落天黑（沒有电灯）。从早八时开始，至此一整天，沒有休息用飯。尤其受罪的是正当盛夏，而列坐台上的多半穿西服，孙、黄二公并且穿着大礼服，滿面流汗，无时不在以手巾拭来拭去。却是幸得終局，便算成功。

宋教仁在党内初非有高于其他人物的資望地位（一九一一——一二年宋且正遭党内外的打击，見李著），其卒能主持改組，使領袖如孙先生为之曲从，正为其有群众支持。而最具有发言地位的群众，莫如那些代表本党出席議会的議員們。議員甚多，又必得有其中坚有力人物与宋密切合作，方能成其事。这第一就是张耀曾氏。再則，国都既在北京，同盟会的党本部自須設于北京。当唐內閣在职的短短期間尚有些党内要人（宋其一）在此，不久都先后出京他去。然而象这样复杂严重的改組問題却多要在此商洽（对外）解决和进行，那么何人主持呢？这第一又是张耀曾。若如李著、陶著以张氏属之于改組时被吸收的小党人物，而非代表同盟会主持改組的人物，这一切均将无法說明了。

国民党成立之后，张氏以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正主任，即見其是实际負責的人。又試举一事亦可見出张氏才具及其在党内外的資望地位。当国会两院合开宪法會議以制宪之时，两大党各有代表

該党主张的一部完整宪法草案提供各方面研究。代表进步党的那部草案为梁启超手笔，而代表国民党的即为张氏手笔。世所称“天坛宪法草案”固为宪法會議所选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所制作，却是委员会当时曾推定五个人执笔（代表五个方面），五个人中又是公推张氏主稿的。

关于民主党、共和党等儿多小党合組进步党的事情，我不清楚，这里不叙。但我記得其成立是稍后的，而众議院議長之大爭夺战实有以促成之。当全国議員选举揭晓时，参众两院議席均以国民党占过半数，在总名額八百多人中号称有五百多人。但其具体数字极难言。因各地方新出人物的政治面貌尚不够鮮明确定，各党派既爭相拉扯，其本人又往往有投机心理。我曾目睹此拉扯及投机之活剧。当时北京有东西两車站，除內务部主管方面为議員到京設有招待所，并派員在車站迎候外，各党亦各有其招待所，各都派人持旗帜在站候接。每見一議員下車，則招待人員蜂拥而上，彼拉此扯，各以能拉到自己的招待所为胜利。某人的党籍即以其住入某党的招待所为定。頗有住入甲招待所数日后甚至一二月后忽又移住乙招待所者。其內幕花样甚多，无非金錢酒食拉攏，可不必講了。

对于国民党的声势最动心、最感到不能相容者莫如袁世凱。所謂拉議員、爭議长，各党派皆是对国民党而拉而爭。各党派之拉与爭似乎各为其党，而在背后資助并运用之者都是袁，其所收效果亦都为袁所享有，此外任何人无所得。可惜当时那些聪明人如梁、湯等皆不悟。由于其对方是一，而此方后台又是一，所以就促成了此方合組进步党。然而进步党究竟还只能間接为袁用，不能直接为袁用。于是末后又出了公民党，由梁士詒（總統府秘書长）直

接出面組織議員。

国会開幕，當然要先選出議長來，方談到其他之事。然而眾議院多次開會、幾次投票，時間拖至一個月之久還沒有議長產生出來。爭奪之烈特見于眾議院者，一則其权重，又一則其議員年輕，多新出人物。若參議員大半資歷老，不易收買其脫黨了。必須把國民黨議員收買脫黨，而后減少其議長選票，增多此方選票。議員聲明脫黨啟事紛紛見于報紙。尤其是當時的《民視報》（其后公民黨成立，即為該黨御用報）滿載于頭版，數之近百數。就這樣，眾議院議長卒為進步黨湯化龍（正）、陳國祥（副）所得。只有參議院議長早早選出了國民黨的張繼、王正廷。

如上所說，為了適應中國要走資產階級的憲政道路而左翼改組出了國民黨，為了對抗國民黨而右翼形成了進步黨，為了進步黨尚不能直接地為袁用，袁部下于是又搞出公民黨。當時黨派情勢變化發展之大端就是如此。但其后又出了新變化。

這新變化是什麼？當正式國會末期，憲法未成，而袁世凱却取得了正式總統，他便悍然來干涉制憲。制憲原為憲法會議之事，國民黨、進步黨（還有其他）的一些有頭腦、有心肝的人士正集于矢壇，靜心致力于此。他們很想本着他們的信念為國家效勞，不能不惊心于野心家的破壞威脅。他們恍然認識到野心家（袁世凱）是真正的敵人，而他們彼此間還是在思想信念上可以合得來的同志。于是以張耀曾、丁世嶸（佛言）為首的兩大黨一部份議員（可以說兩方議員的粹吧）攜手合組了民憲黨。這已是臨到國會被袁解散的前夕了。

說到此，我又記起了一段故事，無妨補敘出來，那就是宋教仁曾密訪梁啟超的事情。當唐內閣去職而宋尚在北京之時，他主要

是布置改組，迎接大選，以謀政局之新開展。他不單照顧家里的事，還照顧到各方面。主要的如掌握實力并代表舊勢力的袁世凱是一方面，作為言論思想界的權威并代表右翼政黨的梁啟超又是一方面。宋都希望把他們納入他所夢想的憲政軌道，彼此在政治上和平競賽。他之所以和趙秉鈞往來屢作深談，即是对袁的一方作功夫。同時他又訪了梁。梁過去曾阻撓革命，此時為革命派所看不起，亦覺自覺臉上無光。宋獨向他表示彼此應以兩黨輪替秉政如英美相勉勵。在即將到來的國會大選後梁若當政則他願在野相助；否則，他出來時請梁善意監督。這原亦是梁的夢想，對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後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由此可見兩方人物早有其共同的思想意識，其或離或合只看環境形勢。

四、一九一六年國會恢復時的黨派情況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國會被袁世凱非法解散，到民國五年袁倒黎繼，乃又得恢復開會。然而當年國民黨和進步黨兩大黨的局面卻沒有隨之恢復。這是何故？

據我所知，當八百多議員們被袁強迫解散後，不少頭腦較清醒而於國家大局具有責任心的人皆有所後悔。第一後悔不應先選總統——把有關總統一章從整部憲法中抽出來先制定，並選出袁的正式總統。更則後悔不該在制憲過程中牽於黨派成見，多所爭執，耽誤時光，以致久久未完成制憲工作，實無以對國人。及至袁倒，醞釀復會，咸有懲前毖後之心。當群集上海、將次入京之時，即互約彼此虛懷同心以制憲，在制憲期間把黨務暫時擱起來。一時風氣如此，兩大黨以至其他黨的招牌遂不見於北京。不過事實上，于議場外聚合一些熟人商討問題，總不可免。于是不厭其

雷同近似而有“宪法研究会”、“宪法讨论会”、“宪法商榷会”等名称出现。或者随便用个“丙辰俱乐部”（这一年是丙辰年）、“鞞园”、“益友社”……为名。甚至不立名堂，只就其聚合之地而说“张寓”。总之一句话，不取组党形式，亦实无意乎组党。其聚合一堆的人抵还是旧日同党的人，虽无旧党形式，固未尝忘情于旧党。

“政学会”是其中稍晚出现的一个，而延续却似稍久，本文将于后面个别叙说两句。这里继续说总的形势。

大家一心制宪自是好事，但不过初念如此。临到事实上，处在政局中，权势斗争仍居第一位。原非组党的这些集体仍然起着政争工具作用。最后又是政争复灭了国会。国会再度被解散，宪法还是没有制定出来。其详就非本文所及了。

这以后，国家大局日益恶化，军阀势力高于一切，只能从其时政治上人事彼此分合之间看出种种派系，无政党组织可言，过去两党卒不再见。至于北伐时的国民党乃是又回到革命党的路上，与前非一事。

应该指出：李著第十二章第二节题为《国会恢复后的党派形势与政潮》，陶著第三册有题为《国会中党派分化和转化的简单轮廓》一段（其中陶因袭于李，只加以简化），其所说几乎全是无是处。例如说“进步党领袖提出不党主义”，梁、汤一向迷信政党政治，其一时不党（如上述）则有之，何能有此“不党主义”？且进步党领袖又何能同时使广大国民党议员为之景从？又说：梁为宪法研究会而汤为宪法讨论会，很短时间复合并为一，皆不符于事实。以我见闻所及，宪法讨论会始终以江天铎（粤人，国民党）、孙濶宇为代表，曾未闻有所合并。观于李著譏笑梁、汤原是一家人

何必分开，疑訝“研究”与“討論”到底有什么区别等等的說話，正显露其于当时情势变化之由来隔閡无所知，誤有所聞而不能辨其誤。

陶著說，此时“国民党已經名存实亡”，其实顛倒了，應該說它名不存而实尚未亡。此时孙先生所領導的名为中华革命党。在京的議員們分化为几个单位，即如老同盟会人物亦用了丙辰俱乐部一类名称，更无人肩着国民党这招牌。然而正如我在前所說“虽无旧党形式，固未尝忘情于旧党”，彼此言論主张仍多从同，甚至行动上有联系。同时不要忘记自由散漫原是此时的风气，其不尽一致是不足怪的。

政学会是当时国民党議員的几个集合体之一，或者还是一个較大的集合体。张耀曾先生被推为政学会的正主席。我此时虽为他任司法部秘書，但在这方面帮助他的是另一秘書沈衡老，我未曾参予其事，因而所知甚少。当时任副主席的为李根源、鈕永建、谷鍾秀三位。三位先生的年紀均长于张（张生于一八八五年，此时只三十二岁未滿），論資望，张亦并不出于三位之右。其卒被推为正主席者，似为他平素立身端正謹严而对国家大局一片公忠，易得群众信任之故。若以今天所謂“組織者”所謂“領導人”来衡量他，他是不够的。他参加同盟会甚早，却非一个激烈份子，而是民国初年流行口語所謂“稳健派”。其实整个政学会就是一稳健派，頗似有中間偏左那种意味。陶著（第三冊一〇二頁）說“张谷二人所組政学会已成为背离国民党的另一团体，并且具有反对孙中山的傾向”，全不衷于事实。

但后来孙先生領導护法之役，“非常国会”在广州的那些年中有所謂“政学系”者則非我所知了。而且就在张氏怕亦不尽

知。因为据我所知，张本人虽支持护法之役，却一直留在上海，未曾一去广州。又据其故后其家人所撰行述一文（张故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有行述一文刊于当时讣告之后，今有存本），他曾在上海宣布解散政学会的。至于末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时代，道路传闻仍有政学系之说，那就更不相干了。（完）

附識：本文系应政协文史資料委员会之号召而写的。文中追記四五十年以前之事，不敢定其間有无出入差錯。政协同人中还有当时国会議員健在于今的，如陈叔通（敬第）、李根源（印泉）、俞寰澄（凤韶）、刘定五（治洲）、王紹鏊（恪臣）、王葆真等皆是。沈衡老（鈞儒）則是候补參議員后来补入的。章士釗（行严）亦是參議員，似乎亦是后来补入的。最好請这許多老前輩来审訂看看。至于临时參議院的人物好象眼前沒有，其事怕难于对証了。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漱溟識

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記

金 汉 鼎

編者按：金汉鼎先生撰有《云南护国亲历記回忆》一稿，这是原稿第三章关于护国之役的軍事布署和护国軍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川作战的經過部分；标题和文内插題都是編者加的。

自一九一五年十二月間李烈鈞、方声涛、程潛、熊克武、呂天民、但懋辛等到滇后，云南反对帝制的运动已經发展到了頂点。唐繼堯眼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再敷衍将会发生于己最不利的严重后果，于是一方面表示反对帝制，以緩和憤激的人心；一方面把反对帝制最积极而又最亲信的邓泰中、楊蔡两团部队派去昭通，說是边境有匪，这样做不但可以消除肘腋之患，也是一举两得的事，再便宜不过的。

邓泰中的第一团是十二月十六日从昆明出发的。在这之前，刘云峰和路孝忱已到香港^①，准备乘船赴沪，在上船途中适为殷承瓚看見^②。殷从背后把刘拉了一把，約至路側，問刘何往，刘

注①刘云峯当时为滇軍旅长，唐繼堯經路孝忱建議，派刘为专使，与路同往北京謁見袁世凱。

②殷承瓚当时随蔡鍔在香港，准备去云南。

以赴京对。殷說：“蔡公已到港，請你去見他談談。”刘即跑去向路說：“腹痛甚剧，請你先行，在沪等我，病好就来。”路无可奈何，自去上船。殷領刘見了蔡鐸，把去北京的事說完后，蔡对刘說：“你的事我已代你办好，咱們同到云南去做一件为国家爭国格、为人民爭人格的事吧！”（这段話是刘亲口对我說的。）刘即随蔡鐸等一同入滇。

袁世凱早得密报蔡将入滇，即密令“特务”蒙自道尹周沆、开远县知事张一鵬暗杀蔡鐸。由于护路警察和駐河口的独立連連长蔣文华派有一班人随車护送，保护周密，蔡未遭毒手。周沆事败，畏罪潛逃；张一鵬逃至滇黔边境被捕枪毙。蔡鐸一行于十二月十九日晚到达昆明。在邓泰中团出发时，昆明米价由四元一斗（一百二十斤，十六两秤）陡涨至六元一斗，人們一听到蔡都督已到昆明，米价又由六元突跌至四元五角，可見云南人民对蔡公的信仰是何等的深厚。

蔡鐸到昆明后，即与唐繼尧、罗佩金、李烈鈞、方声涛、程潛、熊克武、黄毓成、殷承瓚、李日垓、赵仲、刘云峰、吕天民、戴戡、楊蔡、董鴻勛、顧品珍、何国鈞、张开儒、黄临庄、赵又新、张子贞、任可澄等日夜开了多次的會議。蔡鐸把在京津时和梁启超、殷承瓚、王伯群、戴戡等所进行的反帝制活动和联系馮国璋、陆荣廷的計劃，以及袁世凱与段祺瑞、馮国璋二人不可調和的矛盾、袁氏兵力分布的情况和可能調动到西南的兵力、各国对袁的态度、云南起义后可能响应的省分、外交的运用等等，說得条理清晰，簡洁明暢，詞意誠懇，态度坚定。大家听了之后，如服了一颗定心丸，反对帝制必获全胜的信心顿时发展到了最高峰，护国討袁的大計遂以决定。接着是討論用兵的名称、軍隊的

組織、战略的决定。决定如下：

(1) 名称：定名为护国軍；

(2) 軍隊的組織：編为两个軍；軍下为梯团，梯团下为支队，支队下为营，营下为连；

(3) 战略：第一軍出四川，得手后进取武汉，第二軍出两广，相机进取湘赣，得手后会师武汉。

第一軍总司令部配有騎兵一连、警卫一队、測繪員一队；梯团部騎兵一排；支队部附有炮兵一连、重机枪一连、騎兵一班。

蔡鍔任护国第一軍总司令，总參謀长罗佩金，參謀处处长王兆翔，总參議石陶鈞，秘書长李日垓；第一梯团长刘云峰，第一支队长邓泰中，第二支队长楊蔡；第二梯团长赵又新，第三支队长董鴻勋，第四支队长何海清；第三梯团长顧品珍，第五支队长祿国藩，第六支队长朱德。

李烈鈞任护国第二軍总司令，參謀长何国鈞，付參謀长陈忱，第一梯团长张开儒，第一支队长錢开甲，第二支队长盛荣超；第二梯团长方声涛，第三支队长黄临庄，第四支队长馬为麟。唐繼尧任云南都督，坐鎮后方，策应两軍；任可澄任省长。

第一軍第一梯团第二支队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从昆明出发。云南部队在唐繼尧执政后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团只有两营，每营虽仍然保持四个连的編制，但每连人数平均沒有超过八十人的（那时我曾历任第八团第一营一、三两连连长和第七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长）。临出发时为了充实战斗力，将四个连并成三个连，留着连长和軍士数人等新兵，待新兵到手，连长同士兵都被編归別部去了（我后来带的工兵营刘国威连就是这样的）。好在第一梯团官兵久經訓練，有着辛亥革命战斗实践的丰富經驗，素質很

高，装备又全，都是德国克虏伯厂的新式武器。

我們行軍至东川（今会泽），才接到一、七两团改称为护国第一軍第一梯团一、二支队，派刘云峰为第一梯团长的电报。云峰于廿五日从昆明出发，一九一六年一月六日赶到昭通与一、二两支队会見，向四川进发。他与路孝忱一南一北，路到北京向袁世凱献三路平滇之策，被派随张敬尧到泸州，作了危害民主的罪人；刘云峰跟蔡鍔回滇統兵討袁，成为拥护共和的名将。

在云南宣布独立的那一天，蔡鍔曾給四川將軍陈宦一个“有”电，大意是說：“自国体問題发生后，国内远識之士曾多方进劝，而袁終不見听。鍔不得已，涉足东瀛，周历南北，知某国之所以謀我者蓄蘊甚久，而国人之欲图倒袁者蔓延甚广，进行极銳。近聞段芝老已被害，馮河間亦受囚，倒行逆施，真狗彘之不若矣。在項城已屆日薄西山之年，一旦不諱，必成土崩瓦解之勢。我公高瞻远矚，諒早洞烛及此。若能登高一呼，將見众山立应，除此大慙，另建新邦。此間同仁，佩公甚至，亦当維馬首是瞻。”（此电原文系蔡公亲笔，存在由云龙手里，过去我曾借来拍照送給玄武湖吳蔡二公祠陈列。）

当时兴师动众，軍用浩繁，罗佩金自愿将祖輩积遺财产捐獻給护国軍，向殖边銀行抵押得十二万元，第一軍才得陸續出发入川。李烈鈞从海外带来数十万元，是华侨张木欣（云南騰越人）慨然借助的。

叙 府 之 战

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四日，第一梯团全部到达盐津县（旧老鵝滩）。十五日到普洱渡，县丞告知燕子坡一带已有敵軍扼守，梯

团就连夜赶做各项战斗准备。十六日天明，第一支队为前卫先发，后队繼之。未几，战斗开始。敌正規軍一营，另有朱登武的巡防軍两营，共約八、九百人。我軍长于山地战，一发动就如疾风扫落叶，敌軍望风奔潰，借密林掩护，四散逃窜。我軍追逐数十里，毙伤敌数十人，获步枪九支，我軍士兵三人受輕伤。当晚梯团在凤凰吻一綫警戒宿营。十七日拂晓，繼續前进，过捧印村，无敌踪。第一支队进至黄果舖，前方与敌軍发生冲突。第二支队先头进入黄果舖，受到敌炮猛烈的轟击。我軍沉着开进，全部展开，投入战場。敌軍伍祥禎旅据险扼守，机炮齐发，烟尘蔽天，黄土飞揚。只見我軍攀登峭壁悬岩，俯击敌人，越过一山又一山，超过一岭又一岭。敌軍层层設防，只是处处挨打，惊为飞將軍从天而降。战至日暮，敌炮声全息，我軍料知敌人要逃跑了，就发起全綫冲锋，冲入横口場。敌軍在慌乱逃窜中，把載有軍火的船只触在滩石上不能动，被我俘获，上有大炮一門、重机枪两挺、炮弹十二箱、枪弹四十余箱、步枪五十多支。是役毙伤敌官兵一百多人。我軍伤亡三十余人，其中司号长一人、号兵二人，系冲至敌队里因不辨敌我，致被枪杀，創口的衣服被烧焦，显然是由于枪口靠近人身发射，才会有这样現象；失馬枪和鋼号各三支。

十八日，我軍决定以第一支队沿横江去攻安边的正面，牵制敌人；第二支队于即日渡过横江，对岸宿营，明早三时出发，繞道楼东，渡过金沙江，直击安边敌軍之背，是为主力战。由于支队领导人缺乏經驗，事前不曾派人到对岸偵察宿营地情况，而横江水流湍激，过渡极慢，待全队人馬机炮渡完，天已黑尽，寥寥几家草舍，食宿无法解决，不得不餓着肚子露营。十九日三时出发，人困馬乏，頻聞跌跤之声，我的耳朵中也象农家迎娶时吹唢呐

之声在作响。九时到楼东，只有能载十来个人的小船两只，幸喜沒有敌軍防守，总算安全的把全队人馬渡完。急进至安边附近，日漸偏西，楊蔡支队长想把安边敌人一网打尽，自率林桂清营（工兵营編为支队第二营，以抵朱培德营缺）直趋安边下游，阻断敌人逃往叙府的归路；刘云峰梯团长率田鍾穀第一营和机炮連俯击安边敌巢。因彼此沒有很好的联系，楊部何时进入安边場，第一营全不知道。天已昏暗，田鍾穀和我談：“場內毫无动静，可能沒有敌人，我們进去吧。”我說：“有敌人一定放有步哨，既无步哨，是不会有敌人的。”梯团长也同意我們的看法。先头进入場口，碰到支队部一个姓崔的見习員从里边走出来，問他場內的情况，他答：“全是敌人，去不得。”我們即时退回后山严密警戒。

这时刘云峰梯团长和我們忽然断了联系。我去原先停留的甘蔗林找他，沒有下落，深虑在黑夜間他的北方口音会惹出意外的事。時間已是晚上九时，困乏的人們都坐在地下打瞌睡，突然聞場內喊杀之声，繼之是咄咄吧吧的枪声，打了些时，喊杀之声更为接近。有些熟睡的人被惊醒，爬起来盲目乱跑，无法制止。忽然中間有一草棚（农民用以避风雨的）起火燃烧，紅光四射，照出彼此所带軍帽同是紅边，才認識是自家人。一場不应有的自扰，把第一营少尉排长繆立帆和士兵三人打死，另三人受伤。从此另行配备警戒，規定口令。經過两天两夜的紧张活动，各个人都感到十分的疲倦，一場虚惊也已过去，大家都又轉入睡乡了。只有候差員张效巡和我分头巡視步哨綫。到了深夜三时許，突聞北方口音的人在講話，并有吵罵打耳光的声音，接着是三八式步枪声。因黑夜不辨，我和张效巡指揮部队应战，喊杀之声重复又起。田鍾穀在睡梦中从麦地里惊起，盲目乱奔，左中指被击穿一个洞，下

衣跑脫了，用手去拉，染得滿褲是血。二十日天明搜索戰場，在地上檢得二百發手提式子彈箱二十余个，其他一无所見。張效巡率一排人搜索江邊，發現從屏山方面開來敵船五只，上有營長戴鴻嘯一員、士兵二十余人、司號長一人，滿載軍用物資。鴻嘯持槍反抗，被擊斃落於江中，其餘士兵、物資全被我俘獲。梯團長回到軍中整理隊伍，獨有營長林桂清、副營長萬人表沒有下落；上尉副官蔣德茂被吓呆了，不能說話。他命我接任林的營長職，並派隊過江迎接第一支隊。下午梯團長召集連以上軍官會議，決定乘勝向叙府追擊前進。

二十一日拂曉，第一支隊為前衛先發，楊蔡支隊長同行。劉云峰率第二支隊為本隊，繼進。午後三時，本隊到達柏樹溪，鄧泰中送來報告說：袁軍伍祥禎旅已棄城向自流井逃跑，叙府各界代表來歡迎我軍入城，為減少人民接待的煩擾，請梯團長即晚來叙；第二支隊由川、金兩營長掩護炮機連，今晚在柏樹溪宿營，明日再開拔入城。二十二日，第二支隊進駐叙府。

這次戰役，誰也不會相信袁軍伍祥禎旅（第十五混成旅）會這樣的脆弱無力。假使他們嚴密封鎖金沙江，凭險固守，護國軍要攻入叙府，必得付出很大代價和相當時間。想不到橫江一戰，他們竟至潰不成軍。第一團占領叙府後，原擬乘勝直取自流井，後知馮玉祥旅（十六混成旅）已侵入南溪，遂作罷。未几，袁軍果分四路來奪取叙府。第一支隊於二十八日與敵戰於宗場，因敵眾我寡，成相持之局。二十九日我奉令率部馳援，激戰至三十一日，得人民的支援，到處放槍，扰乱敵後，並引我突擊隊潛至敵後襲擊其炮兵陣地。我正面聞敵後槍聲密集，就大舉猛攻。敵腹背受擊，頓時陷於混亂，紛紛向後逃竄，被擊斃、擊傷和墜岩而死者

不計其數。獲大炮兩門、驛馬五匹、抬伏十余人、步槍九十多支、炮彈十九發、子彈四百餘發。我軍死傷七十余人；有一下士在與敵人爭奪大炮時被擊傷，到死仍抱著炮身不肯釋手。

同日，馮玉祥旅從南溪向我進攻，與田鍾毅苦戰於白沙場。激戰至午後二時，田營被圍，第三連連長周勉畏懼潛逃。田鍾毅鎮靜指揮，抗击敵人，予敵以重大的殺傷；終因無援，突圍得免。我在宗場奉令回援，趕到距白沙場不遠的白塔寺，天黑伸手不能見掌，空山靜寂，冷氣襲人。劉云峰梯團長也隨後趕來，兩人背靠背坐地露營到深夜，官兵個個發抖。天曙，我軍即向敵搜索前進，戰鬥又從此展開。劉云峯親自指揮炮兵壓制敵軍火力，掩護步兵前進。未几，我炮位受敵炮反擊，從頂上開花，只見團團黃烟從四周冒起，官兵四人受輕傷，劉梯團長軍大衣下擺被擊穿一個洞，真是幸事。我炮兵很快就將大炮推入隱蔽地方，选好新陣地，測准敵炮炮位，向之還擊，數發炮彈就將敵炮炸毀（後來劉云峰去瀘州與張敬堯商談停戰條款時，對方軍官向他說：我炮曾將新婚未滿月的炮兵連長打死）。這時第一支隊也加入戰場，向敵右翼進攻。我軍向敵猛施壓力，激戰三小時，得悉敵軍輜重有向後移動的消息，我全綫發動攻勢更為猛烈，繼之以冲鋒肉搏。馮旅終于狼狽潰退。我軍追至挂弓山以東，奪回昨日田營失去的炮身，還獲得戰利品不少。我軍在冲鋒射擊時受敵側擊，打死下士于之文，再穿通我的左膀，肋肋也被擦破。我全臂頓時麻木，流血如注，不只衣袖濕透，地下也滴紅一大塊。軍中無護士和醫葯，只好將于之文的綁腿取來扎束，繼續指揮作戰。當收復田營昨天失去的陣地時，發現第三連排長三人、司務長一人、号兵兩人、士兵五十多人全戰死于陣地上，每人身旁遺下一堆子彈壳（槍

支被敌人拿走），衣扣、綁腿、領扣整齐如生，目睹者无不肃然起敬，情緒激蕩，同时也愧煞畏怯怕死、临陣潛逃的連长周勉，而增同仇敌愾之心。

这次战役毙伤馮旅二百多人，俘九人，获步枪四十余支、騾馬五匹、子弹一万多发。我軍共伤亡九十余人。天晚了，整队警戒宿营。刘云峰梯团长要我同他进城去，令副营长楊仲賢暫代营长职务。入城后，我被送入同仁医院（美国传教士唐医生办的）。因流血多，時間久，血把衣袖和伤口凝固在一起。为便于治疗，唐医生将我左袖自肩下剪掉，用溫水洗滌消毒，敷药扎綑带。

經過橫江、宗場、白沙場三次剧烈的战斗，敵軍無論在質量和数量上、在装备和供应上，都比我軍远为优越，就是作战技术方面也称得上头等能手，但一到交鋒，就显得一筹莫展，处处被动挨打。这个道理很显明：一、非正义之战，名分不正；二、违反人心，与全国人民为敌；三、軍紀废弛，奸淫搶掠烧杀，四面树敌。护国軍恰与之相反：是正义之战，有着亿万人民的热烈支持，士气昂揚，軍紀严明，秋毫无犯，因而到处获得人民的帮助和支持，自动为我軍送弹药，护送伤病官兵，修路架桥，供給飯食。如白沙場战役，我軍无法突围的和負伤的官兵，人民把他們收容救护至家里，隱藏武器，換給衣服，授予农具，在地里工作；伤者找医治疗，視若親子侄。在叙府城郊，有許多老太婆天剛亮就起来沐浴淨口，整肅衣冠，拎着香烛、紙錠、灯油，上翠屏山真武山半边寺各庙宇敬香，叩祷滇軍打胜仗，虽近迷信，而爱护民主、反对帝制的真誠更令人百倍的敬服。

我軍到处受到人民这样的爱护、尊敬，深受感动，无一个人不以战死为无上光荣，以怯懦怕死为莫大恥辱。伤未愈者偷着上

战綫杀敌，被派后勤者坚不肯接受任务，爭着上战场，总得三番五次講解“后勤供应与陣前杀敌同等重要，假使沒有粮食弹药，誰也不能保証会打胜仗”的道理，他們才得心服接受。还有馱子弹到陣地的馬鍋头，把子弹放下，将馬拴于隱蔽处，也跑上火綫向战士要枪射击敌人。这些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事例不胜枚举。

未几，敌军又从犍为、屏山分两路来攻叙府，屏山一路是朱登武的巡防軍十二个营，約两千人；犍为一路是陈宦部一个团和炮兵一营、川軍两营，共两千数百人。我軍以少数兵力将朱登武的烏合之众驅逐远遁后，以全力在距城三十余里的牛石坪迎击敌人，战事甚为激烈。隆隆的炮声和机枪声，在城内清晰可聞。我向唐医生請求到前方去看看，他劝我不要去，說前方无人換药，伤口会发炎生脓，因此我就沒去。次日晚，刘梯团长从前方回来，逕到医院看我說：敌军已被我完全击潰，向犍为和自流井逃窜，死伤甚多，遺下軍用物資大小七十余船，內有大炮两門、机枪三挺、子弹四十余箱、医药品十几大箱；我軍伤亡共四十余人。从一月二十八日到二月二十九日，敌军四路夺取叙府的企图，至此已全告幻灭。叙府人民欢欣鼓舞，笑逐顏开，儿童們敲鼓打鑼，放爆竹，玩各种游戏。各界还备了很多酒肉、糖果、蔬菜、皮蛋，犒劳我軍。难以說尽的深厚情誼，刻在每一个战士的心灵里，永銘不能忘怀。

納泸之战和叙府撤退

刘存厚，字积之，四川簡阳人，留日士官学校毕业。清末到云南和雷飈、唐繼尧同在蔡鍔、罗佩金部三十七旅（旧称协）七

十四团（旧称标）任营长（旧称管带），辛亥云南革命起义有功。那时清总督赵尔丰在成都大肆屠杀人民和革命党人，端方复受清命为川汉铁路督办，从武汉带领第八师（旧称鎮）新军一部入川助恶。云南都督蔡锷以赵、端不除，云南革命的成果就不能有保证，立即组织援川军，派谢汝翼为第一梯团长，李鸿祥为第二梯团长，黄毓成为骑兵联队长，以韩建铎为师长，分两路入川；选派存厚和反正的清巡警道郭勋（四川人）两人先行与四川革命领导人取联系。刘存厚就这样留在四川，获任川军第二师师长。他与蔡、罗有着深厚的历史关系，同情护国，事属必然。他的旅长雷飏曾随蔡公在桂、滇两省任军职，同是邵阳人，那就更不待言了。当董鸿勋支队行抵毕节时，刘、雷即派员驰往联系，表示欢迎。董支队于二月一日到纳溪，与刘、雷协商后，存厚即宣布独立，合力向泸州进攻，占领了益田壩、月亮岩，与张敬尧的先遣队和熊祥生旅（存厚师的附逆旅）隔江对峙。五峰顶为军略要地，俯瞰全城，董鸿勋与刘部团长陈礼门约定，由陈防守月亮岩、蓝田壩，拒止敌军渡江，并将砲兵连留给他指挥，董自率唐淮源、郑森两营和机枪连轻装从下游十五里的泰安场渡江，向封门坎、学士山、五峰顶进攻。董很顺利地攻占五峰顶。但麻痹大意的陈礼门放任士兵赌博，毫不为备，使敌得有隙从小关门偷渡，分向月亮岩、蓝田壩袭击。陈团骤闻敌至，即惊溃逃逸，四门克虏伯管退炮就轻轻的资了敌。陈羞愤自杀。董鸿勋闻耗，也独自退过江来。唐、郑两营长突然失去领导，惊疑中莫测何因，相约保全战斗力，从五峰顶退回南岸。功败垂成，令人惋惜。刘部一股劲退到江安，董支队退至纳溪，这一来影响士气不小。

未几，赵又新率领何海清第四支队到达纳溪，声势复振。合

攻陶家大瓦房双合場，敵軍敗退。而袁軍張敬堯師（第七師）全部已到達瀘州，特務路孝忱也在軍中。護國軍兵力這時又顯得少了。適總參謀長羅佩金率領顧品珍第三梯團長、朱德第六支隊從叙永兼程趕到，雙方大戰，已迫眉睫。護國軍兵力實際就只董、何、朱三個支隊。戰爭開始，雙方砲火異常猛烈，彼此日有傷亡，任務顯得十分艱巨。第五支隊長祿國藩僅有雷淦光一個昭通獨立營，過叙府時把第一支隊第一營李文漢借去充數，到達納溪加入戰場。雙方炮火極其劇烈，晝夜不息。我軍營長曹之驊、雷淦光、付營長趙榮晉身先士卒，勇猛異常，與敵肉搏，殺傷很多。最後三人均壯烈犧牲在棉花埂、朝陽觀陣地上。祿國藩、李文漢、楊如軒、張正德等受傷回滇醫治。第三支隊長董鴻勛指揮失當，撤職查辦，遣職調第六支隊長朱德接替，方把朝陽觀對敵最艱巨的任務擔當起來，始終鞏固了我軍整個陣地。

這時敵軍一部從双合場偷渡永寧（叙永）河，竄據龍頭舖，把我軍包圍在安富街和納溪城八九平方公里的地區，形勢十分嚴重。羅佩金臨危不亂，鎮靜指揮顧品珍、趙又新兩梯團和朱德、何海清、王秉鈞各支隊反擊敵人。何親率一連將龍頭舖敵人擊退，驅逐至永寧河以東，派趙燧生第一連扼守雷公嘴（双合場對岸）。朱德支隊把陶家大瓦房以東敵主力擊退，追至棉花埂、朝陽觀。由於敵軍在那里已構築有幾道堅固防禦工事，居高臨下，凭險固守，遂形成相持之局。

貴州劉顯世是一個封建最濃厚、辦團起家的舊官僚，與研究系有姻緣。當王伯群回黔向他訴說袁世凱盜權竊柄、媚外禍國、變更國體、舉國共棄，應同雲南取一致行動、申罪致討時，劉曾首鼠兩端，遲疑不決。直至雲南護國軍第一梯團在四川連戰皆獲

大胜，占领叙府，贵州反帝制的积极人士王伯群、王文华、戴戡、吴传声、熊其勳等坚决主张护国讨袁，在外的李仲公等亦有电信督促，刘始迫于众议，于一月二十七日宣布独立，与云南护国军取一致行动，分兵向川东、湘西对袁军作战。

蔡锷总司令行抵叙永后，知道袁氏兵力源源入川，曹錕第三师和李长泰第八师已分别达重庆、合江两地，即亲临前线指挥。全军官兵闻讯，精神振奋，勇气倍增，欢喜若狂。总司令部设于纳溪城内，每天都有敌炮弹射入，一般老百姓已习以为常。我军向敌展开猛烈的攻击，战事异常激烈。敌军人数多，火力强，占着优势地利，可以轮番作战，更替休息。我军恰与之相反，从出发时所配给的炮弹、枪弹只有消耗而无补充；人员是战斗中主要因素，伤亡的生前任务又转而加在生者的肩上。由于存在着这些不利条件，战事形成相持之局，势所必然。

二月二十五日晚九时，刘云峰梯团长派人到医院请我去谈话，当时我不知有啥事。到了司令部看见支队长邓泰中、杨霁、参谋长张璧（字玉衡）三人在坐。他们问我：“伤好些吗？”我答：“好些。”刘就递一个电报给我看，是蔡锷司令打来的，中有“张敬尧为袁逆唯一之勇将，非得先树声威之贵部前来增援，则大局不堪设想”之句。我看后，刘问我：“你看怎样办？”我答：“请梯团长和两位支队长作决定。”他们相互看了一眼，没人作声，各自吸烟。沉静些时，梯团长再问我，我仍照前作答。至此参谋长张璧说：“能援不能援，应早作决定，好复电。”杨霁就说：“我们的兵力原来已够单薄，经过几次战役，伤亡的兵员和消耗的弹药还没得到补充，第一支队第一营又被禄国藩带走，若再分兵，叙府就难保守，云南的大门就洞开了，是一件很

危險的事。”停了些时无人发言。刘云峰和邓泰中再要我提意見。我这时就說：“总司令的电报里不是說‘非得先树声威之貴部前来增援，則大局不堪設想’嗎，这四个字是多警人啊！譬如大树，应先固本，本固則枝叶茂。若是根本已被斬断，枝叶沒有不枯死的。还有准备起义响应的省分听到主軍失利，也将收捲旌旗，坐視成敗了。至于违令不听調遣的責任更是无法逃避的。”楊恭接着問：“依你說，还是要去增援？”我答：“是。”繼之，又問：“那个去？”我答：“我去。”邓說：“你的伤还未好，怎去得？”我說：“沒关系，我的两腿能跑路，右手可以写报告、下命令。”邓泰中很兴奋的說：“好、好、好，請梯团长下命令把馬鑫培一营（第一支队第二营）归鑄九（我的字）指揮”，并說：“河下备有应差船一百多只，今晚上船，明早出发。”我拿着命令，就回医院向唐医生告別，要了些紗布、綑帶、药膏、药棉，并安慰住院的伤病官兵，始回营部令各連和机砲兵在晚十二时以前上船睡觉，明早出发。馬鑫培营已由第一支队部逕令到江边停船处聚会。城中市民听得我軍出发，每家舖戶門前都点上一盞灯，照着部队行路。这样民爱軍、軍爱民、軍民互爱、亲如一家人，令人感动得流淚，心想要怎样才能报答。

二十六日早开船，有四川招討使熊克武的干部向传义要去江安找刘存厚，与我同船。春寒料峭，我衣单沒有左袖，感觉发冷，船家給一件棉袄披上，頓時溫暖，解衣衣我，盛情可感。二十七日早到江安，稍停，繼續下駛。奉总司令命令要我率部逕向龙头关攻取泸州，乃舍舟登陆，軍佐人員押船随行。每經過一个場鎮，人民都备有飯菜欢迎我軍，并爭着代运弹药、行李。正行进中，奉总司令令由馬腿子乘船到納溪待命。二十八日午后四时船到安

福街（与納溪隔河相望）。毛毛雨在不停的下着，总司令身穿雨衣，头戴遮阳雨帽，带着一个副官亲到碼頭来接。他面容有些憔悴，語音带哑，态度仍然是那样的誠摯亲切，和藹可敬。我跟他走到总司令部，他把前方的战况詳細講給我听，并指着軍用地图上标志兩軍战地的形势和李长泰第八师到合江后的动态等。他接着說：“你快叫人來領取酒肉，給兄弟們早点吃飯睡覺，夜里三时就出发到双合場，由罗參謀长同你去。”同吃过晚飯后，我看了些从前方送来的战斗报告，即回宿营地。

三月一日，天未明我們就到了双合場。毛毛雨仍不停的下着，每个人的鞋袜全湿透了，天亮从密林中望出去，似下霧一样，远不及百碼。使我感到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是这个場各个庙宇里都堆着死尸，每个尸体上均系有山东曹州、安徽亳州、直隶大名某某人的竹牌，約有三百多具，身肿大，头似笆斗，面紫黑。罗总參謀长对我說：“这是张敬尧第七师的二十五团魏明山部在此搶渡，被防守雷公嘴的赵燧生速击毙的。这次战斗經历了七昼夜，赵速伤亡数十人，只剩下官兵十九人了。”說完走出場外，他指着敌人方向告知我：“张敬尧的指揮所設在牛背石，你对这方面要严密偵察警戒”；另告知我一些友軍位置，互取联系。我就向部队下作战攻击令。由于初到，对当前一切事物尤其是地形深感生疏。到了中午，罗总參謀长要回总部，我請求他由总部派人把双合場敌军遺棄的尸体迁葬掩埋，一方面免影响我軍士气，另一方面免传播瘟疫。当日的战事只是小接触，我軍前進了十多里，毙伤敌七人（抬运农民告知的）。我軍只有見习員彭霄刚足部受輕伤。

三月二日，总司令命我代理第一支队长职，并令义勇軍张午

嵐(名煦)支队和廖月江大队统归我指挥。我受命后，立即令张、廖两部在打鼓场、五通场、土地坎、红石岩一带对敌人配备警戒，绘具略图报查；本支队即日向上下天堂敌军进攻。由于张敬尧师所到之处荼毒人民，甚于蛇蝎猛兽，人民恨之入骨，故我军所到之处，经常由人民供给敌军活动的情报，给我军创造了有利的作战条件，胜利的信心更为坚强，人人出主意，个个想办法。如敌人在土墙内挖洞作枪眼向我军射击，士兵们就用一根竹竿乘隙插入洞内，一人紧握竹竿，另一人跃上墙头，以十响枪向敌猛射。这样就攻破了一个据点，其他怕受包围的，也随之慌乱逃走。还有用瓦罐装火药、石子充手榴弹，吓跑了敌人的。更有趣的还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马鑫培营长和我随着士兵前进，有五个敌军士兵占据着三小间空瓦房，士兵们要去活捉，鑫培制止说：“野兽犹斗，必受损伤。他在地里拔了一只萝卜，猛力向屋顶甩去，把瓦片打碎，叫一声“吃我一个手榴弹”。那五个士兵吓慌了，逃跑出来，被我击毙二人，俘虏一人，余二人逃脱。战斗至午后五时，我军前进十多里，上下天堂就被我攻占，缴获敌兵五人、三八式步枪十九支，毙伤敌三十余人；我军伤亡共九人，逼近朝阳观左侧背。

三日，支队奉令继续进攻。有人来向我报告说：看见有一乘四人轿，前后有骑马者数人，在某处停留。支队随派员同去侦察，回报是张敬尧的一个旅长在那里活动，当立即命第一营猛攻敌正面，由马鑫培营长率第二营抄袭敌司令部。午后攻入敌指挥所，敌旅长吴新田仓惶逃逸，遗棄軍用品和医药材料、罐头、香烟不少。正面敌军是张敬尧骑兵第七团，听得旅部被抄，纷纷向后溃退。我正面杨仲贤营乘势猛击，马营又从侧面抄袭，敌军十

分狼狽，四散乱窜。路烂泥滑 間杂水田，阻其行动。他們东倒西跌，棄枪逃命，被我击毙击伤的遍地皆是，难以数計。获伤俘二十九人、未伤俘十四人、三十年式馬枪一百五十多支、子弹一万九千发、战馬三匹；我軍伤亡二十九人。由于棉花埂、朝阳观敌軍陣地險固，我軍久經激战，彈藥大量消耗，伤亡員兵亦迄未获得补充，在敌軍可以輪換休息，更替作战，而我則夜以繼日，无有暇晷。支队奉令应与第三支队保持密切联系，不要过于突出，乃复轉至上下天堂之綫与敌对抗。第一支队离叙府后，馮玉祥乘我守軍单薄，举全旅向叙城进犯。刘云峰、邓泰中、楊綦在崔鍋山指揮田鍾毅营和譚兆福的砲兵連奋力抗击，剧战竟日，給馮旅很大的杀伤。我軍后因彈尽无援，于薄暮时安全撤离叙府。

云南白一、二两軍先后分道出发后，唐繼堯在后方扩編第三軍，自兼总司令，因此前方需要补充的員兵和彈藥自无从补給，一些大炮只得移置后方。蔡总司令一面請托邓泰中、楊綦向唐吁請补充彈藥和兵員，另方面电湖南新化煤矿企业刘命侯等求貸款，以济軍糈，終无有应者。軍中的艰苦自不必說。后来是刘显世汇济五万元，虽属杯水車薪，究胜于无，当时蔡公給刘电曾有“解衣推食”之句。

此时龙覲光受袁派为云南查办使，乘机图滇。覲光与其弟济光世为云南建水县逢春岭的土目，也就是一封建剝削的大地主，保持封建統治，原是他們的本質。他先曾派旧部李文富和侄子龙华乾回蒙自、建水、箇旧、邱北各县勾結土匪作內应，自率大軍經广西入滇。前队到广南、文山間，被李烈鈞第二軍迎头痛击，退回广西。覲光和陆荣廷是儿女亲家，自以为可恃，亲帶不少款彈和卫队到了南寧。这时陆荣廷与袁世凱的矛盾已至无可調和的

地步，从武鸣移驻柳州。龍光請求帮助招兵，榮廷不但一口应承，还派其子裕光統兵协助入滇。师至百色，榮廷于三月十五日在柳州宣布独立，改称都督，兼两广护国軍总司令。同时，裕光在百色也动起武来，把老岳丈龍光囚系起来繳了械，所借款弹全为榮廷所得。在百色逃散的残部复受到黃毓成挺进軍的拦截。袁世凱命龍光图滇的企图，至此已告完全破灭。

泸 州 之 战

叙府撤退后，邓泰中、楊綏两人到了盐津县，聞知滇南有变，不明真实情况，就电請唐繼堯释放朱家宝的父亲，由他轉托家宝出来調停战事（朱家宝云南华宁县人，任直隶巡按使兼將軍，为袁世凱的忠实走狗，繼堯聞知龍光窺滇，就把朱父請至省軟禁起来了）。营长田鍾毅在橫江聞知此事，深为不滿，就从上尉副官王启文手里把第二支队长关防夺过来，执行支队长职权。

还在陆榮廷独立之前，总參謀长罗佩金曾建議放棄棉花埂、朝阳觀的不利陣地，誘敌深入，聚而歼之。到了彈藥兵补充絕望、战士精神十分疲憊不堪的条件下，总司令始决定变更战略，派总參議石陶鈞、參謀长王兆翔至后方选择陣地。在两个选好的陣地中，由他签定的是三层舖。

三月七日，滿天阴霾逐渐消逝，东方出現了一輪紅日，回想几月来自总司令以下，人們无时不馳騁于浓霧和炮火的气氛中，外受雨淋，內受汗浸，內衣洗的未干，新的又已透湿，洗澡嗎，环境不許，每个人的身上都生了不少的蝨子。夜間总司令部經常召集开会，人們伸手一摸，就向火盆上扔，只听到噠噠之声，当时我說了一声“捫蝨談兵”，众为之大笑。今天忽得見天日，尤其是在

这春光明媚、花香鳥語的季节，人們有說不尽的欢喜。午后三时我在战綫上偵伺敌人的活动，传达兵跑来报告說：总司令来了。我急忙向后走，一看真的来了，后头跟着的是赵又新梯团长、少校參謀楊森、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何鴻祥、主任副官赵宝賢、測繪員赵时清。我向他敬礼說：“此地流彈多，請总司令到后面去談。”他說：“沒关系，軍人生活就是这样的。”他就坐在一个坟墓碑前草坪上坐談起来。他問我：“伤好了嗎？”我說：“早好了，只是有些麻木。”他的面容比前更憔悴，态度仍誠懇謙和。他說：“今晚我軍要轉移到新陣地，顧、赵两梯团的命令已下达，你这支队应在黄昏后从陣地撤离，經金凤山、峽魚磧到白节滩，向泸州方面布置警戒，义勇軍張、廖两部仍令在原地不动，作为前进哨，監視并搜集泸州、合江两方面敵軍活动的情况，随时彙报。”我当时向他陈述意見說：“事前沒有派人去偵察轉进路綫，恐黑夜迷失方向，部队离散，如敵軍跟踪而来，恐不易收拾。”我請求改在明晚，給各部有个准备。他允許我的請求，立刻派楊森去通知顧、赵两部今晚仍固守原陣地，原令改于八日晚实施。他們就要回去，临行，我再向他請求今晚送給我些石灰、爆竹、条香、蔴綫。到日暮，我所要的东西全送来了。即晚派定两人准备，天明帶着石灰向轉进路綫偵察，在岔路上用石灰标明应走方向，不便行軍的地方請人民帮助修整，并告我軍要經過这些地方，請不要惊恐。

八日晨把总司令对义勇軍任务的指示传达后，約集机、砲、步連长以上軍官下达支队轉进和战备行軍任务的命令，并将爆竹、条香、蔴綫分发各連、排預先准备好，于离陣地时点燃，插于战壕內，再按班、排、連、营层次在規定时內集合，帶到支队部听候出发。晚飯时偵察路綫的人也回来了，即赶制路綫略图，营、連、排各发一

张，作为行进的指标。黄昏后各营连来报人数已到齐，即按砲、机、步縱列而行，沿途秩序很好，仅有炊具互撞之声。行了两小时，还能听到疏疏落落的枪声。所經路綫，凡是歧路均有箭头标示。泥滑路圯的地方均已修好，舖有稻草穀壳，行軍很方便。天明到了峽魚磡，老百姓已烧好洗脸水和稀飯接待我軍，給他們錢，坚不肯接受：后来是留下一个司务长，待全队过完，說了很多好話，才允收一半。

峽魚磡为大理村南麓的金凤山与大南山相对峙而形成的峡谷，长约两里，中有溪流，林木茂密，蒼翠成蔭，风景幽美，农家星罗棋布，衬托其間，别有韻味。一般农民的生活并不算差。他們早已熟聞北洋軍的恶名，看見我軍从前方开来，心神大感不安，后見我軍在谷口設下一个排哨对敌警戒，他們又才轉忧为喜，情緒安定下来。中午全队到达白节滩，沒有一个掉队失散的。場上家家户户遍插欢迎滇軍的旗帜，街头街尾許多长桌上摆滿酒肴，招待我軍。我們吃过后同样說了很多好話，他們才只愿收点盐米錢，真是受之有愧。当晚奉到总司令自大洲驛发来的命令，要支队很快的占領大南山陣地，待命反攻。大南山面积約两千平方公里，四周絕岩峭壁，东西南北各有寨門一道与外界通往来，地勢险峻，易守难攻。山上人烟稠密，盛产水稻、木材、楠竹、蔬菜、水果，佳木葱茂，儼似世外桃源。

十六日，总司令亲临大南山指示方略，亦認為这是不易攻破的天险，巡視一周，在一丛楠竹林里指着对面沙山向我說：“那个山很重要，你快派一連人去把它占領；明天我軍全綫总攻击，你的任务是攻取牛背石，正式命令今晚准送达。那个沙山将是战胜敌人的一个关键性的陣地。”送別总司令后，我看着占領沙山部队到达山頂，心才安定下来。随即下令給义勇軍张午嵐、廖月江两

部，在支队开始进攻时就要从多方面展开，向敌扰乱，分散其兵力，在敌军败退时应节节尾追袭击，使其疲于奔命，难于集结。天晚，正式攻击令已送来，即时转令各营速积极准备战斗。

十七日，支队全部一早就进达沙山，向敌进攻。我右翼受敌砲猛烈射击，不能前进。沙山正面却发现大部敌军汹涌的向我侧进。遍山盛开若黄金似的油菜花，成为我军最好的隐蔽物，待敌进入有效射程，一声快放，机步枪齐发，只见敌兵纷纷倒下，后队又被我大砲准确打中。经过两个多钟点的战斗，这支敌人被我歼灭大半，残余漏网脱逃。这时右翼我军仍与敌相持中，支队遂集全力转向右翼，并将重机枪从隐蔽中运到距敌砲有效射程地点，测准距离，瞄准猛射，砲兵亦向敌轰击助威。官兵勇气倍增，乘势向前突击。一时敌军乱成一团，争相逃命，被我机枪打死、打伤的可真不少。我在机枪旁观测距离，供给机枪手，右耳膜就为此震坏，失去了听觉。梯团部少校参谋杨森来支队取联系，带着我们四个兵首先冲入牛背石。场外战场上尚有未逃出的敌人，隐伏在菜地里向我乱射，经人民的大力帮助，才把他们彻底肃清，占领了牛背石。这天的战役被我击毙、击伤的在三百人以上，单是从菜地里捉送来的就有三十七人，生俘四十多人和三八式步枪廿余支，缴获法造小钢砲和山砲各一门、旧制机枪两挺、三八式步枪一百零三支、砲弹十六箱、枪弹两万多发，还有被义勇军张、廖两部缴获的未计在内。支队共伤亡五十多人。

敌军军纪败坏，也是他们遭到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到处找花姑娘，在战壕里奸污，并把牧童的耕牛用枪打死，分割吃掉。因而牧童恨之入骨，时思报复。这次护国军全线总攻，牧童们知道敌砲阵地所在，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跑来向朱德支

队长报告，自愿引路袭击敌军。蔡总司令即令朱德支队长派一突击队跟着牧童迂迴到敌炮附近隐伏着，并约定放火为号。当两军战斗最剧烈时，突击队乘机向敌炮兵猛攻，并放起火号来。正面我军看见敌后浓烟飞升，缭绕盘旋，知奇袭已得手，刹时间冲锋号角与喊杀之声震撼山岳。

敌军腹背受击，仍拼命顽抗。激战至午后五时，敌军左右两翼均是绝壁悬崖，在溃败混乱时遭到我炮火集中射击，死伤极其惨重，被我击毙、击伤和坠岩砸死的遍地皆是。而逃走的又受到人民武装的拦击，真是天罗地网，无处可逃。这都是由于张敬尧师到处奸淫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的耕牛骡马、猪鸡鹅鸭，不是被吃光，就是被牵走，迫使四川人民都拿起武器帮助护国军打击共同的敌人，因而使他处处受敌，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牛背石附近的人民经常将敌步哨杀死，并活捉溃散敌兵，连人枪送给护国军。敌人这次遭到最严重的惨败，是自食其果。

协 议 停 战

我军这次全线发动总攻击，西起大理村、上马场、三层铺，东至牛背石（蔡公命名为丰乐店）、打鼓场、五通场，阵地绵延一百多里，有激战整日的或数日的，毙伤敌军共九百多人（俘虏不算），缴获大炮七门、机枪九挺、步枪九百多支、炮弹二百多发、枪弹十三万余发。这一仗真打得陈宦、张敬尧、曹錕等惊魂落魄，寝食不安，不得不向护国军哀求停战。蔡总司令考虑到护国军从云南出发时，每门炮只配给炮弹一千发，机枪每挺五万发，步枪每支一千发，并且只发了两个月的饷，经过数月的剧烈战斗，不只饷弹两竭，就是伤亡兵员的缺额也未获得补充，以三千飢疲

之师，当十方頑强之敌，得机休整，已属必要，遂允之。蔡总司令手拟停战条款十一条，派刘云峰带去泸州与张敬尧会谈；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馮玉祥旅必須撤离叙府，由护国軍接防。适馮玉祥也派参謀张之江、副官伍彪和唐医生（美国传教士）来大洲驛通款，愿与护国軍合作。叙府駐軍問題和一部分停战条款，张敬尧爭执甚力，經刘云峰严正的反駁，最后略有修改，協議遂成，以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六日为停战一周的期限。

这时总参謀长罗佩金受派为左翼軍总司令，移駐叙府。在云南宣布独立的那一天，蔡鍔曾給陈宦一个“有”电，告知他全国人民都在反对帝制，劝告他要明辨是非，顺应人心所向，不要为一时的权势所迷惑；在交战敌对期中仍不断与陈宦有电信往来，最后并允許拨一部分滇軍归他指揮調遣，早日宣布独立，共申义討。这种战略的应用，当时唐繼尧頗不为然，示意住在盐津县的邓泰中、楊蔡二人赶来大洲驛劝阻，經蔡公說明国内和川、湘、黔全部战局形势，向他們解释这样做与我并无不利，只会給袁世凱以致命的打击。二人听說，遂默无一言而退。第一支队在停战条款实施后，奉令从牛背石、沙山移駐大南山对敌警戒，义勇軍张午嵐、廖月江两部仍留在打鼓場、五通場严密監視敌軍的行动。我这时忽感觉脑子很不舒服，似有千鈞压力紧箍着我的头，双目睜也不是，閉也不是，右耳叫鳴不已，精神十分苦悶，听得邓泰中已到大洲驛，即向总司令請求命他速回任，給我去休养。邓回支队后，我即去赤水县第四支队周崇頤营长和赵燧生连长处作客。仅数日，总司令电召我速回大洲驛。謁見时，他問我：“病好些嗎？”我說：“暫时无法医治，沒大关系。”他手取一些文件給我看，一件是罗佩金从叙府打来的电报，内容是将陈天相、

蒋文华两营編为一支队，命我速去任支队长；一件是总司令复罗的电，内容是“邓泰中辞第一支队长职，已批准，金鑄九以代第一支队长为最相宜”，要我快回第一支队去。我内心体会到总司令从出师以来就在病魔的磨折中指揮三軍，躬冒鋒矢，与頑敌搏斗，鏖战数月，废寝忘餐，不曾言苦，今当盛暑，仍运筹决策，晝夜不遑，我的病算不得什么，当即領受指示，又回第一支队。

当支队在叙府作战时，許多已經治愈的伤病官兵此时已陸續回来，听他們講了两件有趣的事，写在下面，可以想見当时一般人对帝制和民主的趋向。第一件是：叙府失守后，袁軍入城，某旅长带着參謀、副官、卫士到同仁医院慰問住院的伤病官兵，他对滇軍官兵說：“你們这些穷小子为什么跟着蔡鐸来造反，不怕国家王法嗎？看你們几个月領不到一点餉銀用，你們都是好百姓的儿子，现在我賞給你們每人几块钱，各自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过活，豈不快乐嗎？”众聞言齐声說：“我們不要你的作孽錢，我們是不愿做一家一姓的奴才，自愿来打倒袁皇帝，将来做一个民主自由的人民，虽死也是甘心情愿，挨饿受冻更說不上。”这些话把那位旅长說得面紅耳赤，口噤不能作声，靜悄悄的扫兴走出医院。第二件是：护国軍的伤病官兵从叙府經筠連、高县、庆符、兴文、叙永各县回大洲驛归队，沿途不只人民招待食宿，体貼周到，就是夙称匪巢的大壩、金鵝池的土匪只要听說是护国軍，无不另眼看待，視若上宾，除招待酒肉飯食外，临別还送給旅費，护送出境。可見合乎人民愿望的正义事业，虽落草为匪的綠林人物，亦晓得是非順逆而心向往之。这也說明护国軍以三千飢疲之师而終于战胜袁世凱十万凶暴之敌，是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的。

清末贖回京漢鐵路的經過

叶 恭 綽

在一切大躍進的今天，鐵道的新建和擴建隨之一日千里，解放前是無可比擬的。而且以前留下的包袱也是不少，即如京漢鐵路這一條綫，當初借款合同定得很壞，其後費了無數氣力贖了回來，在當時可說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但壞影響仍受了若干年，就是一例；而且在當時的環境下，這一件事也只是由少數人努力去做。這就證明，政治不良，無法產生任何佳果。但這件事的經過還是值得一述的。

京漢鐵路為縱貫南北之一大動脈，動議于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但隨即擱置。直到七年之後，乃又舊事重提。當時因修路需款甚鉅，列強紛紛競爭投資，清政府懍于過去借款之受制于人，確也相當慎重，最後才于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和比國銀行工廠合股公司訂立合同，借款英金四百五十萬鎊。清政府認為比國是工業小國，不似列強的難于应付。誰知比國後面有法國撐腰，而帝俄與法又系同盟，帝俄、法、比仍可能串通一氣。此由清廷不明外情，故至迎拒皆誤。此合同有數要點鑄成大錯，致其他與京漢聯系之路綫（如正太、汴洛等綫）陸續借款，其合同皆以京漢為藍本，不易變更，例如：全路建造工程完全委託債權者主持；路成之後，三十年內復委託債權者管理；而債權

者即任主持工程之总工程师为其驻华之代表。故由工程以至运输、会计、用人、行政，全由该公司总揽。督办大臣体制虽崇，待遇虽优，但仅代表债务者司承转、考核、监督之责，所有执行事项皆无权直接指挥。至其下属总办、会办之类，则又仅系督办之代表。又全路之其他华籍员工则实系比公司所用，不属于督办大臣系统之下。故京汉借款可谓开我国铁路借款的先例，也即开了我国铁路借款的无数的恶例。比国虽小，居心可不算小！

当时清政府不仅甘于媚外以图存，坐视权利丧失而不问，而且根本不懂办铁路是怎么一回事。而在具有反抗侵略的传统精神的中国人民大众方面，经过甲午、戊戌、庚子一系列的內政、外交、军事的失败，雪耻及收回权利种种思想随处勃兴，即铁路部分亦不能例外。如一九零二年（光緒二十八年）美国合兴公司私售粤汉铁路底股三分之二给比国公司，激起了鄂、湘、粤三省官民的反抗运动。其在以两湖总督张之洞为首的官方，虽不免有英国的背景，而在人民大众方面，却正因为民族资本主义方在萌芽，急于独立地向前发展，碰上了这个阻碍向前发展的帝国主义，无论美国或者是比国，都必然要掀起强烈的反抗的。反抗基本获得成功，结果是合兴公司向比国公司购回了股票，而中国又向美国贖回了路权。这一次，美国虽是倒了霉，比国却是落了空！虽然收回以后，自己办得好不好，这是另一回事。

粤汉的榜样，不仅鼓励了一部分有识见的铁路新官吏和新兴知识分子，加强其收回权利的信心；同时，他们鉴于中国的地理形势，长江大河的分布都是自西而东，铁路干线必须首先贯通南北。此时粤汉路权既经收回（一九零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津浦又方兴筑（一九零八年，光緒三十四年），京沪之间已经一半

可通，如能贖回京漢，既與津浦成兩大直干，又與粵漢銜接，貫通南北，局勢可成。適京漢合同中第五款所規定的“在公曆一九零七年九月一日以後，無論何時，可將借款清償”的時期已屆，故京外各要人及樞府間多數主張勿失此良機，而以此事責之主管交通之郵傳部。

當時郵傳部的尚書是陳璧，系清末大官中比較能負責任事和拔擢人才的。他奉命以後，把這件事交給鐵路總局局長梁士詒主辦。

然而企圖從比國人手中贖回已被掌握了十年（一八九九——一九零九）的長達一千三百公里的干綫鐵路權利，在強鄰逼處、國勢危弱的环境中，的確不算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必須有胆識，有魄力，有策略，有計劃，有手段，有方法，尤其要抓緊時間，免誤機宜。當時在事諸人及其同僚們怎樣積極進行，是可以想見的。但事有湊巧：是事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零七年）六月開始籌備，至三十四年（一九零八年）九月，十五個月諸事方有頭緒，確定辦法，於九月十四日奏明核准；而西太后及光緒帝突於十月下旬逝世，於是暗潮迭起，進行一切亦愈增困難。但當事者仍於危疑震撼、孤立無援之下撐持應付，借底于成，此不可不謂之奇績也。

事情是分交涉和籌款兩方面平行進行的。

在交涉方面：最初曾向比公司提出修改合同，不成；比公司就將合同第三款“一千九百零九年起，分二十年撥還”曲解為自當年起即不能一次全數歸還。這一點，當即以郵傳部的名義，根據合同第五款予以駁復。彼來此往，久而不決。論理此事本不應成為問題，但在清政府一向的“叩頭外交”情況下，居然也成為

了問題。這一問題，始終未得明確決定。

比公司眼見中國人這一回忽然強硬起來了，乃避開正面不談，別生枝節。枝節之一是：咬定合同規定委託管理鐵路三十年，如今即使將款还清，而三十年中的余利仍應分享二成^①。意思是說：“我們給你們修路，余利二成正是以酬修路之勞，今路雖贖回，我們修路的功勞猶在，自應仍然享受此項權利。”枝節之二是：合同規定一九零八年前借款只還息不還本，一九零九年三月一日應還第一次本，此款應於三個月以前從行車進款除開銷外提出。現在比公司却咬定中國既要將借款一次还清，此款即不須提出。用意在：不提此款，余利即增，公司應分的二成數目可以多些。枝節之三是：一九零六、一九零七兩年盈余项下提有十分之一的公積，以作養路修車之用，而比公司也咬定此項公積為余利，也要分享二成。後面兩節，比公司並聲明由比國公使和外務部“評斷”，借此拖延時間。郵傳部倒也毫不客氣，登時予以揭穿，並且聲明：“無論評斷至如何地位、若干時期，均不得因此絲毫阻礙一千九百零九年正月一號中國收回該路（指京漢）之事。”這一聲明是很有力的。

在籌款方面：儘管認為“自一九零九年起分二十年撥還”的說法毫無理由，却不能不預為籌劃，務使在此期限以前，將款籌足付清，然後不成問題的問題才算真無問題。京漢借款原為一億二千五百万佛郎，又照合同提前還款，每一百佛郎給銀行報酬費二毫五，合三十一萬二千五百佛郎，共計一億二千五百三十一萬二

① 據一八九八年五月《京漢鐵路行車合同》第六款規定：“在比公司代辦京漢鐵路行車期內，中國總公司准予每年公共結賬後，除攤還各項借款本利各費外，于實在余利中，酌提十分之二酬給比公司。”

千五百佛郎（后实还本息經手費共一亿二千七百四十万一千零四十一佛郎三十三生丁，又蘆保三年官息二成^①共銀二十四万零一百二十九元九角），数目太大，筹措为难。直到一九零八年十月（光緒三十四年九月），才向度支部拨借得官款計銀五百万两，募集公債一千万两，总借商款一百万两，合計仅及原借款四分之一。怎么办呢？那就又只有另借外債之一途。这回的对象是英国的汇丰和法国的汇理两銀行，以振兴实业借款的名义借来五百万鎊，将其中四百万鎊用作贖路之費（四百万鎊九四折扣，实得三百七十六万鎊，約合九千四百八十二万佛郎）。当时英国正因为贖回京汉有利于阻止帝俄的势力伸入关內，而法国则主要是为了做生意，相关的比国虽然退出，自己仍得成为債权人，所以都能以就范。此項借款不以贖路为名，也才免除了管路、分利、購料、用人、查賬及以路抵押等权利的断送。这种借款条件在当时可以說是无前例的。款項交清，合同作废，比公司撤退，鐵路如期于一九零九年一月一日收回管理。交接办完，接收人員特为比方人員設宴餞行。餞行席上，公司代表犹悻悻致辞：“希望你们管理鐵路比我们管理得更好”，話中显然有拥掄的意味存在。我們接管該路，不能不格外提起精神，破除困难，然而在那种黑暗腐敗政治之下，群疑众謗之时，其孤危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幸而一年

① 京汉路原定自蘆沟桥修至汉口，故原名蘆汉路，在比款未成立之前，北端之蘆保段（蘆沟桥——保定）已經由清政府撥庫款兴修；比款成立之后，接修保定至汉口段。据一九零八年十二月《蘆保鐵路造本利息合同》規定：“比公司愿分摊中国政府于建造蘆保鐵路时款五百六十二万两之五厘利息，在京汉行車进款項下开支”；并規定：“設正、續两借款于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以前全数还清，則中国政府应将历年所收蘆保路款五厘利息之二成繳还比公司。”

过后，路局将收支表报給比公司寄了一份去，上面記得明白：比他們管理的最后一年还多了八百余万元。这总算替中国爭了一口气。

其实，在比公司管理时期，着眼系在牟利，一切因陋就簡，湊合了事，只图省錢，以便分享余利。可是他們做事确能負責，用錢也經濟，所以鐵路成本很輕，黄河鉄桥工程建筑費才不过二百几十万元。桥修成后，那个比国工程师走了，留下一个副手，名麦利那多，是意大利人。这人終身管理此桥，几次遭遇軍閥內战，他都力尽保护之責；有一次还向軍隊下跪，哀求保存桥身，临死留下遺言：“葬我在桥头。”

在贖路的过程中，既耽心交涉变化，又耽心款項难筹，当时的几个人劳心焦思、夜以繼日地加紧筹划奔走，寢食不安。而当时的清政府各部并不能密切合作，交涉应属外务部，而外务部却只成了承轉机关；筹款应属于度支部，而度支部却安然坐視不理。一切都得郵传部拿主意，想办法。此外，在政治場合上还有一些人并不同意此举，所以更得秘密地去做。还款日期将到未到之时，适逢那拉氏已死，袁世凱失势，陈璧和袁有政治淵源，眼見政潮即将掀起。別人在此时期大可放手不管，然而他們却反而坚持到底，正因为政潮有掀起的可能，乃更迫切希望及时完成任务，免得半途而废，以后更难措手。

任务終于完成了，但昏庸的清政府絲毫沒給在事者何等奖励，給予他們的是一場軒然大波的大參案，陈璧革职，牽連多人。大參案轟动一时，这一場大事——贖回京汉鉄路的胜利交涉，遂寂寞而終。然究竟这件事是办到了。但有关人員和全路員工本来对这件事是十分努力和兴奋的，見清廷这样糊涂顛倒，都怀不

滿，暗中遂醞釀了革命種子。現在回溯那時，到現在剛剛是五十年頭，大概知道當時那些交涉的詳細經過的人，只有我同關廣麟了。今幸帝國的侵略業經打倒，全國交通事業正如旭日東升，自然令我特別愉快。

關廣麟是收回京漢鐵路後較長期做該路局長的人，當時可說是非凡困難和勞苦的，因為本國誰也沒有辦鐵路的經驗，却是不能不懷着勝過外人所辦的成績的決心。但剛一收回，便遇國內極大的政潮，不久即遇辛亥革命，一切措施和應付的艱困，是難以想象的。關廣麟當時曾著了一本書叫做《京漢鐵路的現在與未來》，久已絕版。還有值得一提的是，交通銀行就是因為贖回京漢鐵路而產生的。因為比國管理該路之時，該路進出的一切金銀款項和每天行車進款等等，都是存在外國銀行的。贖回以後，難道還把一切款項都交給外國銀行嗎？但那時中國只有錢莊票號，都是十分舊式、不可靠和無能力的。初成立的一個大清銀行，全是官派，簡直等於一個衙門。因此才趕快組成這末一個銀行來經理全路的出入款項，並先經理贖路的公債和借入款。這樣一來，連各地（北京、漢口等）的金融，也因之活動了（因為每年有幾千萬元出入不歸外國銀行操縱運用）。這也可說是國家經濟的一個轉捩點。交通銀行當時獲得大眾信用，也可說是由此開始的。

附：郵傳部奏報贖回京漢鐵路摺

京漢鐵路前議及時收回，當時籌辦情形，歷次分別奏陳，並函照比公司聲明，俟全款還清，迭次所訂借款行車各合同，悉行作廢，各在案。嗣與比公司商定，一切應還款項統在法京交付，

准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数付清。当由出使比国大臣李盛鐸专办此项交款事宜，随时将所筹各款督飭交通銀行分起陸續筹汇。茲据李盛鐸电称：所有应交本息經手費各項，共法金一亿二千七百四十万零一千零四十一佛朗三十三生丁如数交清。又照合同，应交回比公司蘆保三年官息二成共銀元二十四万零一百二十九元九角，亦已由臣部付訖。当于十二月初十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九年正月一号派令鐵路总局局长梁士詒、京汉鐵路監督郑清濂将比公司經手各項文卷、賬目、款項、材料，一併点收，并将抵押卷据，悉数收回。迭次合同，全行作废。即于是日为臣部收回京汉全路管理权之始。惟比公司于京汉一路，久据利权，一旦拱手授人，中情似难允愿，故于收款交路各事，要求挟制，迭发难端。經臣部加派委員叶恭綽、袁长坤、李大受、卢学孟等随时随事峻拒婉商，始克就范。迨本年十月間，比公司尙借口比政府从前墊交該路賠款之担保另归外务部与比国駐京使臣公断各事均未了結，声言西历明年正月一号不能交回該路管理权。复經臣等援据合同，辯駁至于再三，直至十二月初九日比国駐京使臣始照会外务部，定于初十日先将管理权交出，注銷各項合同，其余爭执諸节，随时再行議結。窃思此路借債逾四千万两，比人干涉已越十年，茲幸得以完全收贖，此后工程行車各項应行布置之事方多，容臣等随时妥筹，悉心办理，总期路务日臻完善，藉副朝廷慎重交通之至意。

洪 宪 遺 聞

張國淦遺稿

一、徐世昌談洪憲小史

一九一一年即宣統三年，徐世昌為東三省總督，于式枚到奉，時余（張國淦自謂）在程德全幕，亦居奉。于與余為憲政編查館舊交，至是常相過從。一日忽談及袁有不臣之心，余問：何以知之？于言：袁自朝鮮回國，在北洋散居閒曹，以家世關係，常到幕府（于時在李鴻章幕）指畫東邊往事。人皆喜聆其言論，目為一世之雄。每袁至，咸戲以曹操呼之，彼亦漫然應之。余嘿窺其舉止，確非常人。其后，袁編練武衛新軍，以至督北洋，進軍機，扶搖直上，今日雖退居彰德，然其勢力分布半天下，現在朝中無人，實深隱憂云云。辛亥武昌起義，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內閣那桐辭職，曾舉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劻、徐世昌皆祖袁者，故有武昌督師之命。有人詰那桐：此舉豈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復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此皆余之所親聞者，然只能認為局外人之觀察，未可遽作袁本人帝制思想之佐証也。

帝制醞釀，起于何時，言人人殊。洪憲失敗以後，余時與徐世昌談及此事。徐與袁關係最深，所知當較為翔實，茲撮錄徐言

如下：

項城自小站練兵，即树立北洋根基。戊戌政变后，以至入直軍机，其广布势力，无非争取政治地位，充其量不过欲为一权臣而已。在君主专制下，稍萌異志，輒有杀身之祸。以項城之精明穩練，宁肯出此！

辛亥革命时，清廷起用項城，督师武汉，未几，擢为內閣总理，其权势之重，一时无与抗衡者。当时，其左右亲暱之人，即有劝袁利用机会取清廷而代之之議，即后来号称反对帝制之张一驤，亦曾馳电劝进（案张一驤心太平室文集卷一密陈大計呈稿，有“当大总统視师萧家港时，一驤曾馳电劝进，是时天下大乱，民无所归”云云），然而項城之所以不出此者：（一）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为后世所詬病；（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駿、赵尔巽、李經羲等，均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有軍权者，如姜桂題、馮国璋等尚未灌輸此种思想；（四）北洋軍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帝制自为，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須用兵；（五）南方人心向背，尚未可知。因此，項城最初表面維持清室，其次始討論民主君主，又其次則偏重民主，最后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此时南北和議，北方代表唐紹儀主民主，楊士琦主君主。袁本想在清帝退位后，自为总统，故清帝退位詔中有“由袁世凱以全权組織临时共和政府，与民軍協商統一办法”之語。不料南京选举孙中山为总统，項城之总统且由中山推荐，此非項城之所逆料也。当时楊士琦主君主，人皆以为維持清室，不知楊之所謂君主者，非溥仪，乃項城也。同时，汪兆銘、楊度組織国事匡济会，楊度亦主君主，其意图正与楊士琦同，但两人各不相謀耳。

中山推荐項城为总统，力持建都南京，选出后南方派蔡元培等来京欢迎項城到南京就职，不料北方軍人憤憤不平。其某公子与左右亲暱者，密謀由曹錕所統第三鎮駐京各營（此时駐京者除禁卫軍保护宮禁外，唯第三鎮有力量）攆入东华門，强挾項城入宮正大位。惟不敢与馮国璋所統之禁卫軍接洽，二十九日夜发动后，为禁卫軍所遏，不得逞，遂搶烧东华門一带。事后宣称部队譁变，系因索餉之故，借以威吓南来专使。实则事前項城毫无所闻，人謂出于項城指使者，非也。

一九一三年四月国会成立，七月十二日赣宁事起，不久即平。此时北洋軍力震撼一时，袁左右亲暱一派又暗中策动帝制，且較辛亥时更为积极。而項城則欲确定正式大总统，以待时机。故在法律一方面，宪法草案所規定不便于政府者若干条，本含有对人立法之意。法律家以此鼓动項城，极易中听。此乃施愚、顧鱉等号称法律家者所为，尚在范围以内。至別一策动，則出于段芝貴、雷震春、張鎮芳等，然亦不敢向項城明言，不过平时隱隱微露一两句，項城第頷之而已。及至大总统选举法由国会宣布，法律派又起而責言，而軍人派亦以为有机可乘矣。总之，項城为人，表面大开大闢，其实际先求千穩百当，方肯做去。选举大总统順理成章，而另起爐灶，則多少帶有冒險性，虽是双管齐下，項城終由穩着走大总统一途。

国会解散，項城乃放手做去。自今日思之，項城以約法會議改造新約法，又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着着皆为帝制預謀之阶梯。但在政事堂范围以内，从无人露出帝制二字。自八月筹安会发起，此幕业已揭开，項城未曾向余（徐自称，下同）有一言之表示。繼而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北京又組織全国請愿联合会，于是

有国民代表大会之产生。其国民代表大会組織法，前数日項城令顧整先送余閱，越日余問顧用意何在。顧答：大权在国民會議制定宪法。余言：須待討論。乃不及討論，即于十月八日公布。此种做法，日趋明显，余于是辞去国务卿之职。余辞职后，項城終以国民代表大会之推戴，承認帝制，以朱启鈴为大典筹备处长，积极筹备，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虽以外交团之警告，西南各省之称兵，亦有所不顧。項城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此余之所不解者。

帝制正囂尘上，清室遺老如劳乃宣、刘廷琛、宋育仁、章梫等以为如恢复帝制，自应宣統复辟。劳乃宣首先发布《正續共和解》，宋育仁等又联合国史館守旧派人員，有上書复辟之議。于是肅政使夏寿康呈請查禁，經批交內务部办理。某日政事堂會議，提出此項問題，項城言：“宣統滿族，业已讓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系自明取得，便当找姓朱的，最好是明洪武后人，如寻不着，朱总长（朱启鈴时任交通）也可以做”等語，項城公开倡言帝制自此始。此虽复辟一段小經過，然明言皇帝不要滿族要汉族，項城之用心正堪寻味也。

就軍人方面言，項城成功，所倚为干城者，为段祺瑞、馮国璋、王士珍三人，时称北洋三傑也。帝制失敗，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关系此三人者为多。段素性倔强，长陆軍有年；馮久駐南京，儼然藩鎮，漸漸不如当年之絕對服从。項城思以軍政大权操之于己，于是在總統府設海陆軍統率办事处，以移陆軍部之权，已为段所不快。关于軍事人員之进退，段請旅长以上由大總統主持，团长以下交陆軍部办理，其用心可以想見。項城又借口北洋軍隊暮气沉沉，另組模範团，挑选各师旅之优秀将校为主干，以

別于北洋旧軍隊。蓋因某公子對於北洋老前輩不能指揮，故項城為其培植新勢力，此更予段以最深之刺激。某公子最忌段，段又毫不敷衍，即項城左右其他諸人，段亦皆盛氣凌之。後來項城對段屢次表示：“你氣色不好，想是有病，應當休息休息。”六月間，又有陸軍次長徐樹錚參案（三次長參案之一）發生，以迫脅段。段於是請假赴西山，托辭養病，憤憤不平。段管軍事教育，又握軍政多年，亦有其普遍之潛勢力，然懾于項城之威勢，亦无可如何（相傳某公子曾進食置毒藥，又發現刺客，段夫人入內哀求等等，實并無其事）。

當帝制風傳甚盛時，六月間馮入京謁項城，言：“外間傳說，大總統欲改帝制，請預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項城言：“我絕對無皇帝思想，袁家沒有過六十歲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幾年？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克定殘廢，二兒子克文假名士，三兒子克良土匪，那一個能繼承大業？你儘管放心。”又言：“北洋軍隊暮氣沉沉，有事時便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頓，我們自己家人總當團結，保持我們的實力，你既來京，可與相國（徐）、芝泉（段）籌畫一番”云云。此次項城說話甚多，對馮撫慰備至。馮退出，忻然密告余。馮回南京，相信袁決不做皇帝矣。及帝制揭曉，以為受袁欺騙，倘袁正位，自己首領且不保，故此後與西南暗通聲氣，以防阻帝制。馮在南京有實權，其勢力固不可輕侮。王則以黃老之學依違其間，一面听袁所為，一面則偏袒于馮（王素不傾向段）。在項城左右，以新勢力尚未養成，不得不勾結張勳、倪嗣冲（此時倪尚未投段）等極旧派以抵制段、馮，某公子皆主其謀。而項城遂陷于孤立，以致失敗。

就財政方面言，項城在北洋以周學熙、孫多森為主干。周學熙系建德周馥之子，孫多森系壽州孫家鼐本家，皆有深厚淵源，共在北洋辦理新洋灰、開灤煤礦公司，成效卓著，根據實業而言財政，自較踏實，故項城信任之。以其為皖人，故曰“皖系”（當時並無派系，因後來有粵系，乃有此稱）。梁士詒亦項城屬意之人，清末在郵傳部即嶄露頭角，後又掌握交通銀行，于交通具有歷史。辛亥議和，項城利用其與唐紹儀、伍廷芳聯系，梁則依靠交通銀行，為項城公私兩方面籌挪款項，項城亦驅使之，然箇中真秘密，非彼所能盡知也。彼以府秘書地位而擴張其財政勢力，于是有“梁財神”之稱。其部下葉恭綽、趙慶華等亦皆一時人才，乃形成交通系，以其為粵人，故曰“粵系”。其實項城所親信者，仍是周學熙一派。民初，周紹財政部，一九一三年五厘金幣借款，梁士詒不能參與，故交通系對於此項借款，頗詆毀之（按梁燕孫年譜謂此項借款為我國財政史一大痛事）。然終項城之世，財政鉅大計劃，皆出于周而非梁。帝制事起，周不贊成，梁則借用時機，異常努力，為項城着想，正如孟子所云王無親臣矣。而北洋舊人，因此亦受影響不少，蓋不僅財政方面之損失也。

就黨派方面言，民國未成立時，項城固拉攏國民黨，迨南京選舉孫中山為總統，項城惡感甚深，然自項城總統逃出，在北京就職後，其對國民黨的態度又漸漸轉移矣。猶記民國初元，項城常與余談及中山坦白，克強慧直，頗思與國民黨提携，乃宋教仁堅持政党内閣，國會議員如張耀曾、谷鍾秀等亦事事挾持政府，項城終覺國民黨不能合作，于是改變態度，與國民黨為敵，而有贛寧之役。項城之于進步黨，本思引以為友，進步黨人亦曾為項

城帮忙，无奈任公一派学者气味太重，彼一度加入熊希龄内阁，湯济武参加政事堂，均少表见。項城则以为此辈書生，不过紙上談兵而已。自国会解散，帝制运动日急，此时在内主持者为楊上琦。楊不仅反对国民党，亦且反对进步党及交通系（楊皖派，梁粵派），思由北洋包办。在外則袁大公子克定发縱指使，彼尙知此举非北洋一系包办所能成功。克定初欲借重进步党，曾于一九一五年一月約任公到湯山（克定住此借口养病）商談国体問題，任公支吾其詞，克定知进步党不可恃，乃变計而顧及交通系。梁士詒本无党派，在国会中曾与国民党之广东派聯絡組織公民党，虽系杂湊，然能以金錢号召，对于各方面拉攏，亦具有相当力量。克定欲利用梁，又知梁为功利中人，遂以三次长參案（交通部其一）、五路參案胁之。一日，克定約梁往談，单刀直入，問变更帝制，肯否帮忙，并加以恫吓。梁不敢持異議，惟言須向同人报告，再作确定之答复。回寓后当夜召集交通一派人員开会。謂贊成不要臉，不贊成就不要头，結果大家要头，一时传为笑談。梁于次日回报克定，表示愿为尽力，并陈述进行之策，克定大喜过望。故參案中之交通次长叶恭綽复职，京綏路局长关冕鈞免議，津浦路局长赵庆华、京汉路局长关赓麟仅交付懲戒，一时注目之大參案遂以无事。于是，帝制派即以交通系为台柱矣。此时进步党初无表示，至筹安会宣言发表后，任公即发表“異哉所謂国体問題者”一文，后湯济武亦辞职南下，迨蔡鐸云南起事，果由进步党推翻帝制。帝制派操縱运用，有交通系而无进步党，交通系无群众为后援，不可謂非袁失败原因之一。

楊度素主君主，曾为項城奔走，后因事有进讒于項城者，項城亦疏远之。然彼不甘寂寞，在京任參政。与其謂为接近項城，

毋宁謂为接近克定。克定住湯山，楊時到彼处鼓吹帝制，克定亦利用之。但楊是言論家，又无党派为后援，而梁系实行家，手下有交通系之健将，自决定参加帝制活动后，立即积极进行，如在京以沈云霈出名发起全国請愿联合会，所有筹委会预定包办之請愿推戴种种，几全面移轉于梁。梁亦参政，此时更挾其特殊势力在院內操縱，而参政院代行立法，遂供其利用。且梁曾任府秘書长有年，对于各省軍民长官，常以私电往来，发生效力。故克定之倚重梁，远过于楊。

就幕僚方面言，項城在北洋，有于式枚、傅增湘、楊士琦等。于等只办公事，楊士琦則能办其私事，庆軍机（奕劻）諸权貴，皆由楊勾通。楊虽未任职务，固坚决主张君主者，項城令其居住南海万字廊，始終运筹帝制帷幄之一人也。其次为张一璠、沈兆祉、閔尔昌等。項城为总統，张信用加重，政事堂成立，张为机要局局长，其原有府秘書事，由夏寿田等分任之。夏按时到公，奉命惟謹，博得項城信任。項城有时命其与克定传話，彼即利用机会交欢克定，日益亲暱。夏并能揣摩楊士琦、段芝費諸旧派之心理，深相結納，帝制机密，无所不知。自是夏日亲而张日疏，个中事张異常隔膜，故有人詢及帝制，彼答以絕无其事。府秘書后改內史，如沈兆祉等多不贊成帝制，軍政執法处乃拘沈兆祉等以威吓其余諸人，余为說情，始获开释。

夏为江西巡撫夏时之子，項城在北洋，夏时执贊門下。宣統三年端方运动兩湖，曾到彰德，夏与端之秘書同往。袁重夏之科名（榜眼），并以其为故人子，頗賞識之。后端督办川粵鐵路，夏亦隨之入川。民国元年項城曾詢夏在何处，二年楊度介其入府（楊、夏均湘人），以后輩礼謁余，固一絕好幕僚也。帝制揭晓，

夏參預機要，其氣焰已不可一世。夏為內史，而內史長阮忠樞及北洋幕中舊人均為之下。統率辦事處唐在禮言：滇軍進川，所有川西叙、瀘一帶，何地能攻、何地能守，夏撫拾往日陳迹，為之指畫。項城亦常將彼之條陳，交由統率處電致前方，其所指陳，極為可笑。項城對統率處人言，夏嫻輜略，即老軍事家亦不能及，不解項城何以見信如此！籌安會初發動時，周學熙密呈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語，即指夏而言。帝制失敗後，夏尚自認為參加最力者。然較之今日趨附、後日推諉之流固自不同，是夏亦有過人處。

民國初年德皇威廉第二與梁敦彥談及國體問題，謂共和不適中國國情，當建立強有力之君主制度。時克定正在德養病，三年偕梁回國，以此意陳袁（梁本主張君主，但意在旧君而不在袁），袁頗重視之。逾數月，中國駐英、日兩國公使均來密電，大意謂英、日政府願與中國聯盟，惟英、日均君主，中國民主，聯盟恐不能長期巩固，聯盟後彼等願幫助中國建立強有力之政府（隱指君主）。袁令顧鰲送政治會議議長李經羲閱，李不置可否，又送余閱。余揣想英使朱爾典在北洋時即為袁幫忙，當辛亥革命，朱爾典與美使嘉樂恒皆主張君憲，朱尤始終擁袁，此次或由英日同盟進而為中英、中日同盟，以達君主之目的，上項提議，當是英使主張。後來袁恐國際上發生波瀾，遂擱置不提。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亦欲以君主餌袁，袁不允其要求，由外交部交涉，至五月二十五日雙方始簽字。不久（約八月初間），總統府顧問美國人古德諾自美來華，道經日本，曾向新聞記者發表對於中國之意見。古到中國謁袁，由參事林步隨翻譯，古即陳述其意見。有人言古系受中國政府指使，似不尽然。

其所著《共和与君主論》，倡言中国宜于君主立宪，指陈民主政体不及君主。彼即筹安会宣言所認為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諾博士是也。日本顧問有賀长雄，亦撰論鼓吹帝制，吾国法律家凡奉有賀为导师。而日政府方面，以严酷之条件要挟帝制，另一方面以秘密之方式接济民党，此是日本一貫作风。日人素畏袁，袁即便如何迁就，終难饜其慾望，故忽而贊成（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談話，有日本为君主国体，中国若行帝制，則与日本为同一之国体，日本当然乐为贊助，且袁世凱氏事实上已总攬中国之統治权，改行帝制，尤与事实相合等語，見日本某报），忽而反对（日本曾单独或联同英、法、俄、意各国，对于袁变更国体事一再警告）。袁虽挟英为后援，而欧战未了，英无力顧及东方，終不可恃。帝制失败，就国际方面論，不可謂非日本之作祟也。

国淦按：以上徐世昌所云，事非一时，論非一次，均徐平时与余談話中夹杂言之者。洪宪失败后，曾为綜記大略，送徐审阅。徐将其关于本身事刪去甚多，又更改若干字，笑曰：可作洪宪小史讀，但不可发表。此即其审阅稿也。

二、朱啓鈐談德皇威廉与洪憲帝制

項城自一九一三年以后，深感国会政党政治之不可行于中国，浸寻而思求帝制。帝制之兴，盖造端于德国。威廉以一世之雄，求其与国于东亚，不能不属意項城，然其意絕不愿中国为共和国也。項城練兵小站，皆德国教官，段祺瑞等所受軍事教育，即出于此。中国陸軍多有就学日本者，其渊源仍在德国。故欧战将起，袁既不欲助英攻德，段祺瑞亦不主中立，尤不愿与德为敌也。段之参与欧战在袁死后，盖外交又有变化矣。梁敦彥尝为外

交大臣，其詆譏共和亦与使德有关。袁克定自德归而言帝制，其亦有所受于威廉矣。德国承認中华民国，包尔（？）为使，即小站練兵时教官也。铁路借款初无德国，繼而德国加入，为五国（日、德、英、美、法）借款；其后盐务借款亦有德国。盖德国之与帝制，其相首尾如此。英日同盟，皆不愿东亚有共和国。日本甚袁不为所用，乃以二十一条相报耳。

国淦按：此段系朱口述，朱学洁筆記。

三、夏寿田談袁世凱与段祺瑞、馮国璋

段祺瑞素性刚愎，有主見，平时对項城不事趋承。长陆军时，关于軍官进退，恒以陆军总长名义行之，不請示；其所識拔者，多半为其学生部属，隱然成一势力，在北洋旧部与段比肩者，此时且将順不遑。于是項城漸漸感觉段之专擅，而大公子尤忌之，以其快快非少主臣也。政事堂成立，总统府軍事处改为陆海軍統率办事处，段祺瑞（陆军总长）、刘冠雄（海軍总长）、陈宝（參謀次长，代总长）、薩鎮冰、王士珍、蔡鍔为办事員，唐在札为总务厅长，张士鈺为副厅长，姚宝来、蔣方震、陈仪、程璧光、张一爵、姚鴻法、覃师范、唐宝潮为參議，张厚琬、刘邦驥、龔光明为行走。表面上匯聚陆、海、參謀三部，統籌軍事，实则減削陆军部之权。至三年十月又有模范团之事。

組織模范团之动机，系本于蔣方震之条陈。蔣以北洋軍隊暮气太重，思另行編練，作为模范，建議在統率办事处之下，設立模范师筹备处，先練两师，中級軍官用留学生，下級參用軍官生及速成生。盖一变历来重用速成、屏除留学生之宗旨。克定与北洋旧軍隊素无深切关系，尤其对于宿将不能指揮，早有步武小站練

兵、建立一新势力、以对抗旧势力之意。陈光远、陆锦等趋附克定門下，余（夏自称）亦参与之一人。在項城本人，一方面以北洋軍隊暮气太重，認為当編練新軍，一如淮軍繼湘軍、小站繼淮軍故事；另一方面又欲为其子培养新势力，故藉蔣之条陈，即成立一类似軍官教导团之模范团。团长項城自兼，陈光远为团副（克定所保）。筹备員有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团址在西城旂檀寺，团本部設在北海。兵士由各师下級軍官中抽派，以各师中上級軍官为該团下級軍官。以訓練十师軍官为目的，分五期訓練，每半年一期，每期可产生四旅新軍軍官。第二期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克定所保），挑选一批中学以上学生与各师下級軍官配合訓練。如此一步紧一步，皆以制段。故段不得不辞职，至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免职。

于此，有当与段联累及之者惟馮国璋。馮平易近人，有內心，袁、馮关系与段等。是年帝制运动，六月二十二日馮往北京（梁启超自广东过南京同行）謁袁，談及帝制問題，袁坚决否認。馮据以告梁，作为袁馮談話，刊登亚西报。次日总统府亦有同样文字发表，录如左：

馮言：“帝制运动，南方謠言頗盛。”袁言：“华甫（馮之字），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謠言之来，不外两种原因：第一、許多人都說我国驟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負点責任。第二、新約法規定大总统有頒賞爵位之权，遂有人認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滿、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豈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議論。”稍停，袁又言：“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說：我現有地位与皇帝有何

分別，所貴乎為皇帝者，無非為子孫計耳。我的大兒身有殘疾，二兒想做名士，三兒不達財務，其餘則都年幼，豈能付以天下之重？何況帝王家從無善果，我即為子孫計，亦不能貽害他們。”馮言：“是啊，南方人言嘖嘖，都是不明了總統的心跡，不過中國將來轉弱為強，則天與人歸的時候，大總統雖謙讓為懷，恐怕推也推不掉。”袁勃然變色言：“什麼話？我有一個孩子在倫敦求學，我已叫他在那里購置薄產，倘有人再逼我，我就把那里做我的菟裘，從此不問國事。”

馮自與袁談話後，即相信帝制不會發生。此次馮在京，袁優禮備至，姑舉一二：某日，本人（夏白稱）同袁早餐，有牛奶酪，袁令差官電問馮上將軍早起否，將這碗牛奶酪送去，說是馮上將軍愛吃的，總統今早上正吃，便想起上將軍，特地送来。又一日，同袁午餐，有大碗紅燒豬膀，袁言：“這是華甫愛吃的”，又令差官電告馮上將軍等等吃飯，總統就送菜來，佐以大饅首四個，說今日午飯，知道這菜上將軍愛吃，所以送来。又贈送周夫人（周砥字道如，馮國璋夫人）禮物甚多。馮覺得總統當作自家人，故體貼如此。

七月九日馮回南京，八月十四日籌安會發起，相距不到兩月。馮尚以為不確，密電詢機要局局長張一馨，張初亦不信，至此以“事出有因”復之。府中如段芝貴、張鎮芳等，又紛紛派人到寧游說。馮乃恍然受袁之欺騙，自是對袁態度驟變，自予帝制以最大阻力。

四、黎元洪堅拒冊封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凱接受帝位後，其第一道命

令，即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在册封之前夕，消息传出，黎电余往商。余毅然进言：“以副总统立场，万无接受王位之理。”饶汉祥言：“就名义上着想，自不能接受；就安全上着想，又不能不迁就。似不妨容忍一时，再行从长计议。”余言：“袁固枭雄，但在此时期决不敢危害副总统，以冒天下之不韪。如果有心危害，即令今日接受，将来仍难避免。副总统果能保存约法上名义，中外观瞻所系，比较上还能达到安全地步。况且事变尚未可知，容有转危为安之一日；即不幸危险发生，副总统为创造共和之人，与共和始终，亦自足以千古。”黎频点头。饶言：“如君所言，直是牺牲副总统。我并非赞成王位，但不愿副总统牺牲个人耳。”彼此辩论甚久，其左右在座者亦先后发言。黎颇不悻于饶，大声言：“你们不要多说，我志已定，决不接受，即牺牲个人，亦所甘心”云云。

据黎之秘书刘锺秀纪事云：自筹安会产生后，一般趋炎附势者，虽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而项城及其党羽，均深知非利用黄陂不足以资号召。在项城自以其帝制确有把握后，屡次派员示意黄陂赞成，而黄陂则坚持反对，终不为动。民国四年底，项城登基在即，遂于颁布洪宪年号之前，明令黄陂为武义亲王，并令在京文武简任以上官员赴东厂胡同黎邸致贺。是日晨七时许，百官涌赴东厂胡同，东至隆福寺，西抵皇城根，南过东安市场，北达安定门大街，拥挤不堪，路为之塞。及八时半，人员到齐，由国务卿陆征祥率领请见。黄陂便装出，陆征祥致贺辞，略谓：“大总统以阁下创造民国，推翻满清，功在国家，故明令晋封为武义亲王以酬庸，特率领在京文武首领，恭谨致贺，恳即日就封，以慰全国之望。”黄陂当答云：“大总统虽明令发表，

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辞毕遂入。各员亦默然离去。下午，项城又派永增军衣庄成衣匠至黎邸，为黄陂量做亲王制服。黄陂坚拒不允，并谓：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辞呈内容与向陆征祥等所述略同。越日，政事堂以公文送武义亲王府官制至黎邸，封面大书“武义亲王开拆”字样，被收文者误剪，盖收文者仅阅及政事堂封面，未及见背面有“武义亲王”字样也。及呈阅时，黄陂震怒，谓：“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武义亲王之公文”，飭令退还。收文者大窘，多方设法换封，方得退回。自后，项城派驻黎邸之旗牌内卫等，无不深恨黄陂，终日大声痛骂，故使黄陂闻之，黄陂亦置若罔闻。前此，民元二年间，国人多谓项城野心极大，将来必帝制自为，劝黄陂加入反袁。黄陂谓：“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项城如有野心，予志自雄，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云云。故袁氏称帝时，黄陂誓死反对，亦为遵守元二年间之约言也。

据余所知，黎、袁儿女姻亲，向例年节双方均有年礼馈赠。是年终袁送黎礼，用红帖书“赏武义亲王”字样。黎甚怒，拒绝不收。越日，袁改用“姻愚弟”字样，黎始受之。人每言黎泥菩萨、好好先生，而于大处绝不糊涂，其倔强如此。

（石荣璋录）

附 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辦法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日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一、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的任務是計劃、組織和推動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和有關人士對於我國的近代史資料進行搜集、撰寫和研究的工作。

二、本會為達成上述任務，應與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北京各大學歷史系、中央文史研究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國務院參事室、政協各省、市、自治區委員會等有關方面，密切合作，共同進行。

三、本會征集和研究的資料，以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前這一時期為主，其內容如下：

1. 主要是軍事、政治和外交的資料；
2. 有關經濟、文化、社會和華僑的資料；
3. 其他有關的歷史資料和文物。

四、本會對撰寫資料的要求：

1. 由親身參加或與聞有關歷史事件的人撰述，用回憶錄的形式或其他形式皆可。
2. 撰寫的事實和內容必須真實、具體。

3. 撰写材料可以不拘观点，不限体裁。

4. 資料可以是有系統的长篇著作，也可以是短篇的叙述。

五、工作的方法可以个人单独进行，也可以几个人合作。撰写資料主要是自己执笔，自己不能执笔的，可由本会派人帮助撰写。

六、本会的工作，除征集一般資料外，还可以組織若干专题，进行調查研究。

七、本会对于經過整理、研究的資料，按其內容，采取公开出版、内部印发、原件保管等等办法，分別处理。

八、本会对資料提供人給以适当的报酬和工作上必要的帮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 資料研究委員會征集文史資料參考題目

一九五九年七月

一、历史事件

1. 立宪活动
2. 皇族內閣
3. 武昌起义
4. 武昌起义后各省的独立
5. 南北議和
6. 宗社党
7. 袁世凱帝制活动
8. 护国运动
9. 張勳复辟
10. 护法运动
11. 直皖战争
12. 湘鄂战争
13. 第一次直奉战争
14. 粵桂战争
15. 曹錕贿选
16. 江浙战争

17. 第二次直奉战争
18. 馮玉祥北京政变
19. 段祺瑞的善后会议
20. 胡(景翼)憨(玉珪)战争
21. 北伐前統一广东根据地的战争
22. 中山艦事件
23. 三一八惨案
24. 奉直軍与国民軍的战争
25. 北伐战争各战役
26. 四一二政变
27. 一九二七年李宗仁和唐生智的战争
28. 东三省易帜前后
29. 編遣会议与軍閥混战
30. 蔣(介石)桂(李宗仁)爭夺武汉的战争
31. 蔣介石的国民党三中全会
32. 粵桂陈济棠和李宗仁张发奎的战争
33. 西北軍反蔣战争
34. 蔣(介石)唐(生智)战争
35. 扩大会议与蔣閻馮李大混战
36.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37. 四川省的各次战争
38. 貴州省的各次战争
39. 云南省的各次战争
40. 张学良与石友三的战争
41. 九一八事变

42. 从大革命到九一八蒋介石的起落
43. 十九路军上海抗战与淞沪协定
44. 宁粤合作与所谓国难会议
45. 长城抗战
46. 塘沽协定
47. 张家口抗日同盟军
48. 孙殿英与馬鴻逵的战争
49. 盛世才与馬仲英的战争
50. 蒋介石的法西斯运动
51. 福建人民政府
52. 何梅协定
53. 冀察政委会
54. 一九三六年两广事变
55. 西安事变
56. 抗日战争
57. 汪精卫在投降日本以前的活动
58.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阴谋
59. 蒋介石的国民代表大会
60.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61. 台湾人民起义

二、政治派系和反动组织

1. 民国初年国民党的各派系
2. 共和党
3. 进步党与研究系

4. 政学系
5. 新旧交通系
6. 安福系
7. 直系
8. 西山會議派
9. 孙文主义学会
10. 改組派（汪精卫）
11. 复兴派（胡汉民）
12. 再造派（孙科）
13. 政学系（新政学系）
14. CC团
15. 复兴社
16. 三青团
17. 社会民主党（陈銘枢）
18. 国家社会党（张学良）
19. 同志会（閻錫山）
20. 民社党
21. 青年党
22. 中統局
23. 軍統局

三、各民主党派

1.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包括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小民革）
2. 中国民主同盟

3. 中国民主建国会
4. 中国民主促进会
5. 中国农工民主党
6. 中国致公党
7. 九三学社
8.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9. 中国人民救国会

四、軍事学校和軍閥派系

1. 北洋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
2. 保定軍官学校
3. 云南講武堂
4. 东北講武堂
5. 陸軍大学
6. 黃埔軍官学校
7. 中央陸軍軍官学校
8. 其他軍事学校
9. 清末新軍
10. 袁世凱北洋軍
11. 西北边防軍
12. 直軍
13. 孙传芳五省联軍
14. 东北軍
15. 张宗昌直魯联軍
16. 西北軍

17. 陝軍
18. 晉軍
19. 桂軍
20. 粵軍
21. 滇軍
22. 川軍
23. 湘軍
24. 黔軍
25. 豫軍
26. 蔣介石的中央軍（包括黃埔、保定、士官等系）
27. 西北五馬
28. 从楊增新到盛世才

五、历史人物

- | | | | | |
|---------|---------|---------|---------|---------|
| 1. 黃 興 | 2. 蔡 鐸 | 3. 陈其美 | 4. 李烈鈞 | 5. 陈炯明 |
| 6. 唐繼堯 | 7. 胡漢民 | 8. 宋教仁 | 9. 朱執信 | 10. 袁世凱 |
| 11. 黎元洪 | 12. 戴 澂 | 13. 奕 劻 | 14. 良 弼 | 15. 鉄 良 |
| 16. 端 方 | 17. 赵尔丰 | 18. 馮国璋 | 19. 段祺瑞 | 20. 王士珍 |
| 21. 岑春煊 | 22. 陆荣廷 | 23. 湯化龙 | 24. 熊希齡 | 25. 徐世昌 |
| 26. 曹 錕 | 27. 唐紹儀 | 28. 譚延闓 | 29. 顏惠庆 | 30. 曹汝霖 |
| 31. 陆征祥 | 32. 許崇智 | 33. 徐樹錚 | 34. 卢永祥 | 35. 齐燮元 |
| 36. 梁士詒 | 37. 吳佩孚 | 38. 张 勳 | 39. 馮玉祥 | 40. 胡景翼 |
| 41. 孙 岳 | 42. 孙传芳 | 43. 张作霖 | 44. 张宗昌 | 45. 閻錫山 |
| 46. 馬福祥 | 47. 刘 湘 | 48. 张学良 | 49. 李宗仁 | 50. 陈濟棠 |
| 51. 宋哲元 | 52. 楊虎城 | 53. 盛世才 | 54. 黃 郛 | 55. 楊永泰 |

56. 吳鼎昌 57. 張 群 58. 孔祥熙 59. 宋子文 60. 陳立夫
61. 陳果夫

六、外 交

1. 北伐以前的兩廣外交
2. 皖系外交活動
3. 直系外交活動
4. 奉系外交活動
5. 九一八到抗戰前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外交
6. 抗戰前國民黨對德國的外交
7. 抗戰時期日本的誘降和蔣介石的秘密投降活動
8. 閻錫山的外交活動
9. 兩廣的外交活動
10. 冀察的外交活動
11. 國民黨政府對英外交
12. 國民黨政府對美外交
13. 北洋政府歷次對外借款的內幕
14. 國民黨政府歷次對外借款的內幕

七、其 他

1. 北洋政府軍閥官僚的企業活動
2. 國民黨政府軍閥官僚的企業活動
3. 有關文化問題
4. 有關華僑問題
5. 清末貴族生活

6. 青帮
7. 紅帮
8. 哥老会
9. 一贯道
10. 紅枪会（包括大刀会等）

附記：这份参考題目所列項目，仅供資料提供人撰写資料时参考之用，还不能詳尽地表达征稿范围；因此，在这些項目以外，如有关于从清末到全国解放以前各个历史时期中的各种亲身經歷的、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資料，亦在征集之列。